

悼念本刊顾问

费孝通教授



① 1947年2月，费孝通重访英伦归国途中，经过新加坡时在南侨日报报馆前留影。

② 1957年4月，费孝通回到阔别21年的江村，这是他抵达江村后和乡亲们一起讨论、研究时的情景。

③ 费孝通在江村调查

④ 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在一起

⑤ 费孝通在苏州老宅的庭院里

⑥ 费孝通(右二)与民盟中央智力支边小组的同志在内蒙古草原

⑦ 费孝通在胡耀邦墓前

⑧ 费孝通一生与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从1924年在《少年》杂志上发表《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开始算起，至今已经写了整整八十年头，写下了六七百万言的著作。1999年，群言出版社出版了《费孝通文集》。

炎黄春秋

目 录

专 稿

2 悼念我们的会长费孝通老师..... 鲁 諄

求 实 篇

5 建国后山东最大的冤案“向明事件”..... 任全胜
11 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 曾彦修
13 究竟谁出卖了瞿秋白..... 耿 法

亲 历 记

16 结缘南斯拉夫..... 阎明复
24 我们在文革中掩护林县县委书记..... 方 徨
29 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 陈大斌

建 言 篇

35 现行土地经营体制调查与建言..... 张根生

沉 思 录

39 顾准和李贽..... 吴远鹏

人 物 志

46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 马京生 王建蒙
48 我和“洋特务”李敦白..... 杨兆麟

品 书 斋

55 《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引出的思考..... 李 锐
59 沈容大姐和她的《红色记忆》..... 苏仲湘

往 事 录

62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防空大演习..... 王作化
65 抗战劲旅税警总团..... 范国平

一 家 言

68 民主监督和监督民主..... 徐迅雷
69 一阁满江红 说破岳飞冤..... 李凯源

怀 人 篇

70 深情怀念毕列爵老师..... 林 晰

古 镜 台

73 黄宗羲民主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与启示... 泰 栋
76 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 张友鸾

文 配 画

79 “礼”的延续——精神现象零拾..... 陈四益文 丁聪画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一鑫
李学勤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凌云 龚育之
曾彦修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竟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庄其环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271606)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010)68522852(办公室)

(010)68534879(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 真:(010)68532569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0296 号

定 价:4.80 元

悼念我们的会长费孝通老师

● 鲁 淳

2005年4月25日,噩耗传来,我们尊敬的费孝通会长,于前一天晚间仙逝,享年95岁。我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几位同事来到费老家中,向他面带微笑的遗像,献上花篮,鞠躬默哀,往事一一浮现眼前。

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发起会上指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挑战”

费老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1991年成立后不久,即受聘为顾问。在1998年6月第二届理事会全体会议上,以88岁高龄当选会长。晚年的费老,仍风尘仆仆于各地调查,不知疲倦地思考写作,同时以极大热忱关怀着研究会的发展。这六七年来,研究会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学术活动,步入一个新台阶,与费老是密不可分的。我因在会里担负日常工作,感受甚深。

就在这年12月,费老热情地出席了我会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共同在香港主办的“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宣读题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学术论文。费老谦虚质朴的开场白,至今言犹在耳:“我自从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以来,一直觉得自己对我们常说的中华炎黄文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炎黄文化,缺乏深刻的认识,一直想找机会向学者专家们请教学习。”

费老在这篇论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在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的关口,世界日新月异,各种文化都历经着和面临着不断的挑战,中华文化也面临一个推陈出新、继续发展的课题。他认为这

个问题“事关存亡续绝”。为此,费老再一次呼吁要有“文化自觉”,并给以严谨的定义:“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发起成立“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得到与会海内外学者的热烈响应。费老对“论坛”始终寄予厚望,给以大力支持和及时指导。“论坛”一年一度的小型暑期学术座谈会他都参加,谈他新近调查的亲身体会和所作的文化思考;每两年一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前,他都紧密结合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观察,从文化视角上加以分析,认真准备自己的学术论文。费老的学术谈话和学术报告,为“论坛”和研究会指明了方向,他在海内外的崇高声誉,为“论坛”和研究会扩大了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于中国“三级两跳”的文化思考:“要顺应潮流,一边补课,一边起跳。”“我们缺了‘文艺复兴’这一段。这个方面,我们也要补课。”

1999年夏天,我会一年一度的暑期学术座谈会在大连举行,在费老亲自指导下,与会者共商即将举行论坛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事宜。一致同意明年的会议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为主题,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2000年10月,论坛首次

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海内外 100 余位学者与会。

正值新世纪来临、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之际,费老把握时代的脉搏,做了题为《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学术报告。他说:“我这一生经历了 20 世纪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就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里边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我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两大变化,并把它比做‘三级两跳’”。

费老说,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属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并且后来而暂未居上,现代化进程一再被延误。改革开放以来,急起直追,现在出现了我们在第一跳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已经不能不进行第二跳的局面。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同时更须深入思考,盲目地进入潮流是不行的,要“顺应潮流,一边补课,一边起跳。”他深切地说:“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

在这个报告中,费老还强调中国文化的许多优秀传统,今天在上世界上仍有其重要价值。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大特征,是讲平衡和谐,讲人己关系,提倡天人合一。”中国古老的“和而不同”观念仍有强大的活力,现代人类提出的一些准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一向坚持的。因此他认为,我们应当“树立起应有的文化自信”。他指出:“文化自信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把这个话放在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年会上讲,我觉得应该有更充分的理由表达一种愿望,就是希望中国文化在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中能够继往开来,



1998 年 8 月 27 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宝光、冯征、杜导正、吴塘、鲁淳、宋文茂、于友先前往费老寓所汇报工作。图为汇报后合影

大有作为。”

“历史是出戏,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炎黄春秋》批判地记载了历史,希望办得更好。”

《炎黄春秋》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当年就创办起来的纪实性期刊,作为研究会的三大任务之一,费老继萧克会长之后对这份期刊给予极大关怀,他是杂志社顾问,频频过问,有困难就帮助解决,杂志社同志说,费老对我们可说有求必应。

2001 年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及其主办的《炎黄春秋》成立 10 周年,5 月 26 日在研究会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费老致词说:“这个研究会的成立,不仅表示我们大家对自己的悠久文化更加关注和重视,而且愿意通过组织起来对它进行研究,这就是我一向所说的文化自信。”7 月 21 日,他参加了《炎黄春秋》杂志社庆祝 10 周年座谈会。他结合这个杂志的宗旨和风格,对杂志坚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秉笔直书的办刊方针,给予高度赞扬和热情鼓励。费老当场说:“历史是出戏,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我们都走过了几十年,参与了时代的变化。《炎黄春秋》批判地记载了历史,它是一面镜子,它说了真话,反映了真

实情况。我们通过《炎黄春秋》再次认识了过去的人和事。大家都爱看《炎黄春秋》，认为它办得不错，希望继续办下去，办得更好。”

在“从实求知”的学术道路上毕生探索的结论：“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

2002年12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共同主办的论坛第二次会议，以“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为主题，在香港举行。这是我会以费孝通会长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为主题，在境外开的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我和会里的同志都为此感到高兴、欣慰和自豪。

遗憾的是，费老出席了8月举行的八达岭暑期座谈会后，却因病未能出席12月香港论坛会议。他事先认真准备的学术论文《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只能请人代为宣读。在这篇论文中，他回顾了自己提出“文化自觉”理念的背景和经过，实际上也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学术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费老说，“文化自觉”这个名词，是他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他的闭幕发言中“冒出来的”，但是它的思想来源很早。“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内。”他回顾了19世纪中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到五四运动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随后是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到了抗日战争，国难当头，暂时使争论停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然而历次政治运动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起来，“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使人以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

都没有用了。直到改革开放后，开始有所反思。据此，他强调我们要搞清楚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

“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费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文化自觉”就是在中国这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经过一生努力，从实际中求得的真知灼见。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要了解 and 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2003年8月中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太原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03暑期太原论坛暨晋阳文化座谈会”。令人惊喜的是，93岁高龄的费老，又兴致勃勃地到会了。在第二天讨论将于2004年举行的第三次论坛会议的筹备工作时，费老对下届论坛我会与澳门大学等单位共同在澳门主办，以“中西会通与文化创新”为主题，予以首肯。他说，我们真心地希望中西文化的交汇、融通，既要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也要批判地对待自己的文化。并且指出，近数百年来，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个地点就是澳门。他还高兴地谈到，改革开放以后，他开始第二次学术生命后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正是澳门大学授予的。所以，他希望明年能去澳门参加论坛会议。

然而，费老没能像大家期待和他自己希望的出现在澳门论坛会议上，因病又住进了医院。尽管半年多前，他的家人就对我们说，由于年事已高，病情严重，这回怕是难出院了，大家还是期待着奇迹发生，能有机会再次聆听他那带着吴江乡音的学术演讲和亲切谈话。不幸的是，这一切都永远不可能了。

费老走了！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全体同事，将永远怀念他，以他为楷模，把他未尽的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建国后山东最大的冤案

“向明事件”

● 任全胜

1981年4月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报道：《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原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追悼会对向明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向明同志平反昭雪，推倒过去强加给向明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向明何许人

向明原名巨同璞，山东临朐县人，1909年出生。1929年夏参加共青团，同年8月转为共产党员。入党后，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努力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在敌人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里，他领导学生运动和组织工人罢工，同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历任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1933年，向明被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下，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没有出卖任何同志和组织，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并且多次参加和领导了狱中的绝食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向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当即奔赴陕甘宁边区，参加了抗日斗争。1938年向明曾任刘少奇的秘书，1939年上半年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当年下半年，随刘少奇到豫皖苏区任新四军游击支队二总队政委、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苏中四地区书记、军分区政委、苏北盐阜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新四军三师八旅政委。他转战江淮敌后，正确地执行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党的组织，粉碎了日寇大规模的扫荡和分片“清乡”，出生入死，不畏艰难，为苏中、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和巩固，做出显著成绩。

解放战争时期，向明曾担任鲁中区党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华东野战军八纵队政委、胶东区党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地方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带领部队英勇作战，粉碎了蒋介石向鲁中南解放区的多次进犯。向明在陈毅、粟裕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1947年的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等，后又参加了陇海路两侧的阻击战，消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

1950年到1954年向明先后任山东省政府副主席、省军区副政委、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第二书记、代理书记等职。他坚决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领导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组织农村互助合作，恢复生产，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山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然而，1954年向明突然被错误地认定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被撤销职务并隔离审查；1955年山东省委又错定“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在全省范围内肃清向明影响大抓所谓“小向明”，致使相当数量的同志受到株连，在山东省内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山东史称这一案

件为“向明事件”。

“向明事件”的起因

“向明事件”起因于向明被错误地认定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

“高饶反党联盟”是指高岗、饶漱石在建国初期结成反党同盟,企图反党夺权的案件。建国之初,高岗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还兼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952年8月高岗调中央工作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着重讨论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毛主席此前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预算、增薪、县区乡财政统一,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税收、五年计划、军费等问题。

会议进行时,参加会议的不少人出于对新税



向 明

制的不理解和对本地区利益的保护,对新税制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会议主持人薄一波按毛主席的指示,在会议上就新税制中的不完善方面做出公开检讨。而高岗、饶漱石等人则抓住薄的检讨大做文章,并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同志的一些言论统统算到薄一波的账上,采取“批薄射刘”的办法,明批薄一波,暗攻刘少奇。

在这次会议上,山东的同志也和其他一些同志一样受高岗、饶漱石的蒙骗,对薄一波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此前,早在1952年新税制刚开始试点时,向明同志便将新税制推行时遇到的困难以书面形式向毛主席做过报告,毛主席就报告做过批示,对向明等同志反映的意见基本肯定,但一年之后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向明反映的意见和所谈山东执行新税制的困难被中央认为是向高、饶“提供了石头打中央”。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并提出了过渡时期党的组织工作的任务。饶漱石却在会议上再次挑起了批判安子文同志的斗争,且借口批判安子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在这次会上代表山东分局出席会议的分局书记赖可可也受饶漱石的欺骗和蒙蔽,发言批判了安子文同志。这也被认为是向明配合高、饶向中央发难的一条“罪状”。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即高岗的住所)车水马龙。高、饶的问题被揭开了盖子。

1954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对高岗、饶漱石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作了严肃的批评。并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对证和揭发高岗、饶漱石搞阴谋活动的事实。

向明参加了七届四中全会,但在揭批高、饶的反党罪行时,被认为态度暧昧、发言空泛,没有如会议对他预期的那样揭出更为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时曾讲:“向明我支持他,他不支持我。”

1954年初,中央酝酿加强高岗为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饶漱石曾向中央建议抽调向明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也被认为是饶漱石想用向明作为同高岗搭桥建立联盟关系的工具。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建国后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二人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作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以高岗和饶漱石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中共全国代表会后,中央派周恩来、罗瑞卿到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的反党活动,并处理了东北局的有关问题。4月初,华东局也在陈毅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饶漱石的反党活动。但当时在华东局机关及上海市的干部中,主要是进行了正面教育,并未把任何人作为高、饶联盟的党羽来处理。这对稳定上海和华东的局面是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的。

然而,中共全国代表会一个月后,中央派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中纪委副书记钱瑛到山东检查向明同高岗、饶漱石的关系以及向明在山东的工作表现情况,于是揭开了“向明事件”的序幕。

“向明事件”的处理过程

陈毅离京前曾向毛主席请示如何处理向明问题,毛泽东对山东问题看得很严重,对陈毅说:“我每次坐火车从济南路过时,都不敢下车呢!”但又说:当然“你到山东检查向明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受我的影响。”

1954年4月29日至6月7日,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采用会内与会外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个别谈话与查看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检查向明的错误和山东分局领导的问题”。

陈毅对向明问题的处理一开始是比较慎重的,他提出了几种可能请大家分析考虑:一是向明基本上是个好同志,但有缺点毛病;二是向明基本上不好,但还有许多优点;三是向明闹独立

王国,参加高、饶反党联盟。分局委员们均表示向明基本上是个好同志,但有问题,特别是进城后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陈毅还给分局的委员们交代:要多同向明同志联系,你们和他一起共事,要劝劝他做自我批评。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关键是检讨。

陈毅还要求他带来的助手们在山东工作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调阅了山东分局的大量文件,并找了许多有关的同志谈话,调查了解情况,比较系统地检查了向明主持山东分局时期的工作。在深入检查的基础上,召开分局扩大会议,集中力量搞清向明问题。在检查向明问题快要结束时,陈毅提出向明问题已基本弄清,并在干部大会上讲:过去我们华东局是支持向明同志的。这次检查向明问题与其说检查山东分局,不如说是检查华东局的工作。

会后向中央汇报前,陈毅又找向明谈话,指出向明的问题查清了,要向中央汇报,询问了向明个人的意见,一并带到中央汇报。

陈毅等人6月下旬回北京向中央汇报,7月中旬回上海路过济南时,无奈地对山东分局副书记们打招呼说:中央认为向明问题很严重,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分局书记不能再干了。你们和他一起工作,也要受点轻微处分,不然向明也不会服气。我先回上海,然后再来山东解决山东的问题。

由于中央定了调子,8月初,陈毅回山东按中央指示召开了中共山东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解决向明的问题。会议最后做出决议,认定向明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在山东大搞独立王国,在农村执行了富农路线,在城市执行了资产阶级路线,对上顶抗,对下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排斥异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并因此而对向明及山东分局的若干负责人进行了严肃的组织处理。

1954年8月13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中明确地说:“党代表会议认为向明同志的错误是异常严重的,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党纲领,积极参加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为了严正党的纪律,特建议中央和华东局给予严格的处分,考虑他的党籍问题。”

《决议》还建议对分局副书记赖可可、分局

委员兼秘书长张辑五、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王建国、分局副书记高克亭、任质斌、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吴若岩、宣传部副部长王众音、副秘书长段林等同志给予不同处分。

对前已调离山东的郭石、苏继光、柳运光等同志“在山东工作期间所犯的若干严重性的错误”，《决议》“请中央转告其所属党委，责成他们检讨自己的错误。”

至此，除远在北京“养病”的山东分局书记康生外，以向明为代理书记的山东分局几乎全军覆没，中央批准撤销山东分局，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在中共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舒同任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任省委第二书记，李广文、董琰、彭嘉庆为副书记。原中共山东分局的几个副书记统统下放锻炼。

“向明事件”的株连

在山东省第一次党代会将要结束时，陈毅在总结发言时讲了对向明问题的处理到此为止，不要再株连更多的同志了。但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的山东省委却没有接受陈毅同志的正确意见。

会议结束后不久，1955年2月至1956年夏，山东省委以检查各级党组织的形式，有计划、

有步骤、有领导地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肃清向明影响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青岛市委继续揭发向明、王少庸、吴若岩、曲及先、华岗、王绍洛等人在青岛工作期间结成反党宗派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宗派活动，以及包庇、放纵反革命分子等行为。”省委认定了所谓“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的问题，“对向明、王少庸、吴若岩、华岗进行了隔离反省（向明、葛申分别由河北省委和中央公安部进行审查）；逮捕了曲及先、王绍洛。为了这项工作抽调了90余名干部，分别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审查。一年多来，各专案组曾反复进行了1162次查证，重点地查对了华东局、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和青岛市军管会等部门的有关档案、电报，并阅读了个别同志当时的笔录等材料，多次审问了反党分子本人。”

与此同时，抓住向明在解放初期主持青岛军管会工作时，曾经按照党的政策释放过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在反特斗争中曾经运用了某些策略方法，进一步把向明的问题上升为是“里通外国”，下令逮捕了一些与此有关的负责干部。此后又制造了多起重大冤假错案。其中有王少庸（青岛市委书记）、葛申（青岛市公安局副局长）等人的从“反党宗派集团”案到后来的“反革命内奸嫌疑”案；孙汉卿（省委委员、青岛



向明（前排右）与华岗（前排左）、高克亭（自右向左）、彭嘉庆、田海山、赵笃生合影

市第二书记）、矫枫（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崔介（青岛市副市长）、孙扑风（青岛市委宣传部长）等人的“右派反党集团”案；李广文（省委书记处书记、原青岛市第一书记）的“右派反党集团”案；郭宏毅（省公安厅副厅长）等人的“通敌叛国”案；王华、韩洁石（均是省公安厅副厅长）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案。

这里特别要指

出的是，自1949年11月青岛市委建立后至1956年6月，历任的青岛市委书记向明、赖可可、任质斌、王少庸、李广文，副书记薛尚实、孙尚卿、王建明、于明、刘特夫，秘书长曲及先、王卓青，除薛尚实、刘特夫、王卓青三人外，其余无一例外的全部被打成“向明事件”、“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的成员和骨干分子。似乎青岛市自解放以来一直是被反党分子所控制的一块基地。

在这些错案中，前后无辜株连了一百余人，其中许多人受到错误处分，有些人被关押入狱，个别人被刑讯逼供折磨致死，使党在政治上受到了很大损失。

1955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央写出报告，认定“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提议开除向明的党籍，10月10日中央批复同意开除向明的党籍。山东继续在全省肃清向明影响。

就这样，从1954年4月至1959年2月，从中央认定“向明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到肃清“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肃清向明影响”、挖掘“漏网的向明残余”，山东处理省一级的领导干部十数人，省直各级机关部门负责人近百人，全省范围内的各级领导干部上千人。

数十年后，当年曾经经手这一专案的原山东省长赵健民说：“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究竟是怎样组成的，成员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他们又为什么反党？所有这些重大问题，即使是提出有一个‘反党集团’的人，也根本举不出一件有力的事实来。”

“向明事件”的疑点

在回顾“向明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几乎所有受“向明事件”牵连和影响的干部以及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的人都会提出一个最大的疑点，即：饶漱石是华东局书记，华东局应当揭露和检查饶漱石在华东工作期间存在的问题，揭批饶漱石的死党也应该华东局和上海是重点，但华东局却集中精力揭批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的向明，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揪住不放，难道真有足够的材料证明向明是参加了高、饶联盟吗？看看前面所列举的认定向明参加高饶联盟的根据并不充分，

而且向明从1954年开始被审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再也未发现他和高岗、饶漱石有任何其他联系的材料。华东局常驻上海，上海无问题，华东其他省区均无问题，唯独山东出了问题，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是毛泽东所说的他路过济南时不敢下火车的说法起了重要作用。为什么毛泽东会说这番话呢？史料至今未曾公开过。但是50年过去了，在这漫长岁月里，山东党的领导已经换过多次，却一直未听说曾经发现过向明时代的党政军机关或党政军负责人有图谋不轨的材料。历史证明，毛泽东对当时山东问题的性质看错了，而根据毛泽东对山东问题的判断和指示把向明定为高、饶联盟的成员也是错了。

至于说向明在主持山东分局工作时犯有大搞独立王国、在农村搞富农路线、在城市搞资本主义等严重政治错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建国初期，如果不稳定中产阶级，积极发展生产，迅速恢复和医治战争创伤，提高群众生活，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很难建立和巩固的。应当承认，向明在主持山东分局工作期间是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的。但是，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向明问题如此看重？而且会说：“我每次坐火车从济南路过时，都不敢下车呢！”这就需要山东建国后的情况做一番认真的分析了。

1949年青岛解放后，中央为了统一山东各解放区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接受党中央和华东局的双重领导，并指定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傅秋涛、向明分别任副书记。

康生此时还是七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对中央任命他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一直是极为不满的。在他看来，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原来的职务上，他都比担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要高。解放后，他估计中央会派他担任华东局书记，不料却让他担任华东局副书记、山东分局书记。在他前面还有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第三书记谭震林、第四书记张鼎丞。他曾说：“过去长期在上海工作，比较熟，哪怕在上海当一个区委书记，也比在山东好。”他曾提出要求张鼎丞或魏文伯同志留在山东工作，又被饶漱石拒绝，于是他便泡病号“罢工”。当年秋，康生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便去青岛“养病”，分局书记由傅秋涛代理。

1950年底,中央调傅秋涛任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调身兼青岛市委书记的向明回济南代理山东分局书记职务,主持山东分局的工作。

而此时挂名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主席职务的康生却一直未在山东任上,而是在青岛、杭州、北京三地长期“养病”、看“病”和休养。虽在“养病”,康生却一直没有闲着,他一直要求分局有重大事情要及时向他汇报。他的老婆曹轶欧(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经常奔忙于济南、青岛、杭州和北京之间,电话联系也经常不断。山东分局的各级领导到上海华东局开会和汇报工作时都要到杭州去“看望”他(实际上是向他汇报工作情况)。后来他到北京“养病”,山东各级领导到北京开会,也要向他汇报山东工作的情况。

山东出了“向明事件”和“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而身为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政府主席的康生却既没有做任何检查,也没有受任何冲击,连领导责任也一点没有承担。山东分局撤销、山东省委建立后不久,1955年春,康生便宣布“病愈”,身体康健地在北京参与了中央的一些工作,这岂非咄咄怪事?

康生是如何能够不但不受“向明事件”、



邓小平悼念向明的花圈

“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的牵连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扶摇直上,我们不得而知。但康生当时是在北京最了解、最熟悉山东情况的人,是最能在毛泽东身边影响毛泽东同志对山东看法的人,这确是历史上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还知道康生在文革期间,也就是在“向明事件”十多年之后,仍对当年曾在山东工作过的刘贯一、任质斌等同志耿耿于怀,不忘要算旧账。

毛泽东建国后曾多次到过山东。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曾到山东视察过,在济南、曲阜等地住了两天,参观了文物古迹,当毛泽东视察到徐州时,向明由上海赶到徐州向毛汇报工作。因当时刚开始搞义务兵役制试点,毛对向明汇报的山东的试点工作很重视,要向明写一个报告给中央,并亲自打电话告诉中央有关部委要重视山东义务兵役制试点经验。后来,中央还转发了山东的试点经验。

然而事过不到一年半,毛泽东对山东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并说:“我每次坐火车从济南路过时,都不敢下车呢!”这不恰恰说明是有人在毛泽东面前告了山东的黑状,而且告状的人肯定是非常了解山东的情况又能使毛信以为真的人。

当然,历史是要凭事实来说话的,我们不能说肯定是康生说了什么谗言,那还要中央有关档案解密后才能证实。但纵观康生其一生的历史以及他在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我们不难看出一些端倪。正如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陈伯达一样,我们也可以借用同一段话来形容康生:“貌似‘忠心’一片,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人们已很清楚。忠奸之分,正邪之别,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向明事件”至今过去50年了,向明本人以及在“向明事件”中受株连的同志都已经平反多年了,不少人都已作古,活着的同志也都已入耄耋之年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认真地吸取了过去党内斗争的痛苦经验,大大改进了自己的工作。现在重温这段历史,是为了加深对已有的经验教训的认识,并用以说明党的现行路线的正确。让我们丢掉一切包袱,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吧。

(责任编辑 李 晨)

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

● 曾彦修

今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载左双文《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一文,我是相信作者的材料和考证的。作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得档案五件,均注有“密”字,系有关国民党官方以朱家骅个人名义,在1940年、41、42年三年向陈独秀分别赠款一千元、五千元、八千元,并有陈独秀1942年1月29日致朱家骅信,表示“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1942年1月一次赠款八千元,有陈布雷致朱家骅信(档案一件),是陈布雷“呈奉谕示”即经蒋介石批准的。1942年重庆物价已大涨,此八千元已不可与抗日战争爆发前,即1937年上半年时的物价同日而语了。

近二十年来,大陆考证陈独秀的书籍文章,说陈从未接受过国民党官方赠款一事,均源于郑学稼对陈的回忆文章及郑写的《陈独秀传》。郑且说明他本人是陈独秀退还此项赠款的直接经手人。因此,在未获此事的直接档案之前,大陆诸家二十年来的说法,也是有根据的。

现在比较之后,我以为似以台湾档案为可靠,因为其中有陈独秀复朱家骅一函,可以证明此点。因此,我以为陈独秀确曾接受了此项赠款。

但我认为即使如此,也无伤于陈独秀晚年的日月之明。蒋政权及蒋本人对已不干预政治更无伤于他的统治的各方大名人,都是要设法维持他们的生活的,以便减少一点社会责难。此点各地方军阀也大都能办到。对陈独秀这个大名人,在当时还找不出堪与之对应、匹敌的人物。如果陈出狱入川后,不久即贫病而死,在国民党内部也会闹得纷纷然,对蒋也会有激烈抨击。

陈独秀的学生们,不居官而在社会纯以任职、任教为生者,其时生活水平均已大降,事实上已无力长期担负对陈独秀的资助了。此时,由国民党官方以私人或半私人名义赠给陈独秀生活费用是最为适宜的。

陈独秀在四川江津时期,国民党内可以私人出面,资助陈者,其实,冯玉祥、孙科也很相宜,但他们见不及此,未做。同盟会元老级人物,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覃振、居正,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也均可以出面干此事。且陈独秀同戴季陶、于右任、居正还是老相识,甚至是“战友”,但没有由他们出面。如由戴季陶出面,陈独秀决不会接受,因戴名声太臭。由陈立夫(教育部长)出面更不行,陈独秀不但不接受,且可能大骂人。最合适者,莫过于北大的先后同事与学生,此是自然之理。这时期的人物,最为适于出面的是北大学生,又是“五四”时北京学生领袖的傅斯年、罗家伦,与后于陈独秀在北大任过教授、系主任等职的朱家骅了。朱家骅身兼国民党党务与学术界两要职,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与蔡元培1939年逝世后所任的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政学两栖。且朱家骅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与鲁迅南下厦门任厦门大学教授的时间相差无几,二人南下之前,又均同被列入北洋军阀驱捕的名单之列(鲁迅在一书的后记中

详列了一连串名单(朱、鲁均在其中)。反之,如由教育部长(原国民党组织部长)、CC系头领、蒋介石的头号心腹、政治顾问陈立夫出面,陈独秀自然不可能接受。

至于傅斯年,此时期似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即原来杨杏佛的一职,似仍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家伦此时仍稳坐在中央大学校长位置上。因此由傅斯年、罗家伦出面赠款,更为合理,因为傅、罗二人均为“五四”运动产儿,是陈独秀的学生。但如由此二人出面,则又显得私人气太重,纯粹成为学生孝敬师长了,国民党恐又心有不甘。

朱家骅确是相对最为适当的人物,邵力子当然更适当,但邵此时期正任驻苏大使。而朱是1922年到北大当教授的,时陈离开北大已约两三年,朱在北大也任过教授、系主任等,与陈独秀的职务差可相当,属先后同事之列。而朱家骅兼党学二要职,表明他是官学两栖人物,可从侧面说明他的赠款正是以私人名义致送的官方款项。朱致陈三信中,有二信称张国焘为“同志”,一信称张国焘为“先生”,似也有意表明此项赠款系为官方所赠也。

左文发表后,我收到几个电话,询问我对此事的看法,并道及有的读者以此颇不直陈独秀先生。我的认识已如上述,国民党当时以私人名义对陈有所赠送是自然的,陈在得不到其他足够最低生活补助后,无任何条件地接受此项纯属维持简单农村清贫生活的赠款,也无伤于陈独秀的日月之明。陈独秀此时等于一件国宝,收存之责,人人有

之。

因此,我以为,二十年来曾大大歌颂过陈独秀从未接受过国民党官方分文赠款的书籍与文章作者,都不必为此感到不安。再者,此项档案既全部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之史语所,足证当日朱家骅赠款及去信,均是以中研院代院长或院长的身份做的。

至于郑学稼为什么要那么说,倒是一个问题。是否由于死无对证,郑为了自高身份而这么说呢?总之,看来郑学稼说的并不可靠。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都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大后方的情况知之甚少,故上文也许有失误之处,烦请识者指正。

末了,还要补充几句:当时救济陈独秀这一区区小事,却是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苏联正一直在大杀“托匪”,因此,中共及左翼人民均不能出面干此事,这是正面与斯大林为敌。甚且冯玉祥、孙科也不便出面做此事,因冯、孙在抗战时期,均必须对苏联保持十分友好,不能得罪苏联。对陈的一点点生活困难补助,在当时竟然微妙如此。因此,朱家骅、陈布雷等处理此事,应该说还是对内对外都比较说的过去的,并无可责之处。看着陈独秀饿死不管,对国民党只有坏处而毫无好处。我以为这就是在当时具体环境下发生这件事的原因,不能简单化地看成陈独秀有气节问题。

国民党绝非对陈有所钟爱,而是在当时不得不出此。

(2005年3月30日)

体外净,即生活要有一个干净的外部环境,包括你的居室、用物、衣服等等,以保证不会有病菌、病毒及各种有害物玷污你的身体,保持体表干净。

体内净,即不让烟、酒、毒品、病菌等一切不利健康的东西通过口、鼻、血管等通道进入体内。你的血液和器官都应该是纯洁的。你绝对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去接受输液、输血等方式的治疗。

心里净,这便是古人所说的“仁”和今人所指的“好”了。你不仅应当是一个不有损别人的人,而且更应该是一个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好人。人到了这种境界,心里就舒坦,就会感到社会是一个广阔的幸福之源。这个幸福之源,绝对比财富更能增进你的健康,更能延长你的寿命。

欲得长寿者,请干干净净做人吧!

“三净”者寿

● 文 伯

古人说,“仁者寿”,今人说,“好人长寿”,“仁者”和“好人”,都是有德之人。有德之人,光明磊落,其精神状态多良好,这对人体健康自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人仅靠一个“德”字,还是难保长寿的,世界上不是有很多好人都是英年早逝的吗?科学的说,人能做到“三净”,才可基本满足长寿的要求。这三净就是:体外净,体内净,心里净。

究竟谁出卖了瞿秋白

● 耿 法

我面前放着《文人瞿秋白》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书中写到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被留在江西,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准备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项英的妻子张亮以及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四天后在长汀县水口镇一个小山村被敌人包围,队伍被打散,邓子恢率少数几人突围,瞿秋白、张亮、周月林躲在灌木丛中被敌人发现俘获。瞿秋白化名林琪祥,只说自己是个医生、文化教员,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他以化名给鲁迅写了信,告知自己被捕的事,鲁迅得知消息后积极设法营救。然而这时突然发生两个情况,使瞿秋白的身份暴露了:一是4月10日国民党第八师俘获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供出瞿秋白等人已在濯田地区被俘,敌人正抓紧在俘获人员中寻查;第二更直接的是和瞿秋白一起被捕的张亮、周月林叛变,供出了瞿秋白的身份。书中这样写道:“4月25日左右,张亮、周月林两人又重新收押,由钟绍葵带同副官张友民押送,有轿子供她们乘坐,解送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龙岩途中。吃午饭时,张亮忽然无耻地对钟绍葵说:‘我怀孕不能走,你们给我轿坐,我很感激。我现在报告你们:那个医生林琪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周月林也同声附和,并供出何叔衡被打死,邓子恢已突围等情况。”这样,敌人才得知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后经蒋介石下令,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杀害。从书中叙述看来,张亮、周月林是货真价实的叛徒已确认无疑。这一情节我在其它一些书刊资料中也曾读到过,文字虽略有不同,但都明确地指认项英的

妻子张亮和周月林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

但我的书桌上同时还摆着《瞿秋白自传》一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版),书中附录部分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的《忆秋白》一文(原载《红旗飘飘》第8集)和《宋希濂谈瞿秋白》一文(原载《文汇报》1995年9月16日、23日),也写到了瞿秋白被人出卖的情况,其情节却与《文人瞿秋白》一书的说法完全不同。

杨之华《忆秋白》一文中说:“秋白被解到长汀后,曾被敌人讯问用刑多次,都没有暴露。后来,匪徒发觉在被囚押的人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陈姓青年,曾在中央苏区人民教育委员会当过收发,因而想出一条诡计,设法使陈姓青年与瞿秋白骤然相遇,以观察他们的表情,辨别到底是不是秋白。这天,匪徒把秋白带到一间房子里,又秘密使人把陈姓青年带来。陈姓青年迈出门坎,突然看见了秋白,脚步骤然停住,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匪徒奸猾地说:‘原来你们彼此都认识么?’秋白马上从椅子上立起来,哈哈笑着说:‘这算是演了一幕很滑稽的戏!’随又说:‘我的事你们都知道了,不必再问。’”

《宋希濂谈瞿秋白》一文中,宋希濂(时任直接审讯瞿秋白的国民党军第36师师长)在“文革”前夕说:“我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琪祥,三十六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

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吴说,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十六年(1927)我在武汉见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据吴说,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但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

无论杨之华还是宋希濂的叙述,都指明是一个男性叛徒通过直接指认出卖了瞿秋白,和项英的妻子张亮及周月林(苏区中央政府妇女部长)毫无关系。但长期以来不少报刊媒体却以讹传讹,如同《文人瞿秋白》一书一样,一口咬定是张亮和周月林出卖了瞿秋白,使她们背上叛徒的恶名不得翻身。更有甚者,有的报刊还登载文章说张亮叛变革命后被释放出狱,后来又回到项英身边,还没放下行李,项英就严厉责问她:“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是不是你将他出卖的?”见妻子张亮神色紧张,说话有些结巴,项英拔出手枪,一枪就打死了她。这一编造的充满小说色彩的故事情节绘声绘色,流传甚广。

近读《项英女儿项苏云追述父辈革命传奇》一文(见《中华读书报》2004年7月28日),项苏云对其母亲张亮蒙受的不白之冤十分气愤,她说:“这是一段十足的谣言,并且至今仍在报刊、网络上以讹传讹。事实上,见到母亲的父亲听她谈了很久事情的经过,当时曾山也在场,后来母亲还把弟弟送到延安,但就在她返回

皖南找父亲时,不幸在乱世中失踪,再也没有她的下落。”项苏云还在文中披露说:“周月林解放后也被关了12年,直到1979年,在瞿秋白被害的那年国民党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投诚’的人供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的报道,才发现真正的叛徒是谁。而母亲与周月林都是无辜的。周月林被平反了,妈妈张亮却因为父亲的关系,至今仍含冤九泉,没人给她一个正确的说法。”

项苏云说的那张终于查找到的当年国民党的报纸上,明白无误地登载着“赤共闽省委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还应该补充说明一点的是,万永诚同志指挥战士和敌人战斗,坚持两天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是革命烈士;万妻被俘,因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的情况)。有关党史部门也已查清,那个指认林琪祥为瞿秋白的人系曾在苏区教育委员会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杨之华同志文中说那人姓陈,陈与郑在南方口音中很接近)。至此真相已经大白。当时,张亮、周月林被国民党当局判处10年徒刑,张亮在监狱中生下一男孩。她们在铁窗里关了整整三年,直到1938年5月,抗日战争已爆发,国共业已实现第二次合作,经周月林丈夫的一个故人(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任职)疏通关系,保释出狱。张亮出狱后,经过艰难跋涉,辗转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见到了时任新四军副军长的丈夫项英。然而万万没想到历史如此曲折,张亮后来会被诬陷成出卖瞿秋白的叛徒,竟然还冒出她被自己丈夫击毙的谣言。

这真是天大的冤案!“文革”中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都早已平反了,而一个从上世纪30年代延续到今天的对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妻子的冤案仍没有昭雪,这是为什么?历史真相的披露真的就那么艰难吗?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其中涉及的不只是一个女共产党员的个人名誉及遭遇问题,而且是党内高层斗争的曲折反映。

项英1922年入党,长期从事工运工作,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是著名的“二七”大罢工领导人之一。他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

他留下领导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功勋卓著。抗日战争爆发后，项英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现在历史真相已经清楚，皖南事变中他由于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因此没有及时带领新四军转移。项英自己当然也有指挥失误之处，对事变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把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到重大损失的全部责任统统推到项英个人身上，显然是不公正的。解放后的历史教科书中都把皖南事变作为项英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结果来总结“经验教训”，项英的名字也从众多史书、纪念文章、电视片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待项英的妻子张亮的不白之冤迟迟得不到重视与昭雪，就不难理解了。这实际上是封建的“株连”政策的反映。这里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不容怀疑、不容触动的“神话”与禁区，即：遵义会议后确立的党中央领导是一贯正确的，是不会犯错误的，凡是重大错误，都是没有执行中央指示的结果。其实

任何政党都会犯错误，从来就没有“一贯正确”的政党，关键是吸取教训，及时纠正错误，并且以后不犯同样性质的错误，这就是智者。

长期以来，我们倡导革命传统教育，但是如何真实地告诉下一代历史真相，真正对历史负责，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用虚假的历史来教育下一代，那种教育的基础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不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而且有极大的副作用。历史的谜团应该得到澄清，真相应该披露，冤案应该平反。即使张亮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其所谓出卖瞿秋白同志的冤案也应予以平反昭雪，谣言必须澄清，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同志的人格、荣誉和尊严。今后，出版物中凡是涉及项英和张亮的诬陷不实之词均应纠正，我们不能听任谣言再在报刊、网络上畅通无阻，继续往一个命运多舛历经磨难死不瞑目的母亲、妻子、女共产党员的心灵上捅刀子了。

(责任编辑 李 晨)

北京蓝航书店

文史类精品套装图书特惠直销

凡购图书即可免费加入蓝航书友会

即可享受 1.成为终身会员

2.免费定期赠送最新文史类书目

3.购书享受 2-9 折优惠。

C01《史记》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125.00 元	C18《中国书法全集 - 楷书全集》4册 16开	售价 :170.00 元
C02《智囊》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130.00 元	另有《行、草、篆全集	每种售价 :160.00 元
C03《三希堂法帖》4册仿线装大 16开	售价 :165.00 元	C19《毛泽东手书真迹》2册大 16开	售价 :170.00 元
C04《三言二拍》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125.00 元	C20《中华成语典故》4册大 16开	售价 :120.00 元
C05《四库全书精华》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195.00 元	C21《中华典故》4册仿线装大 16开	售价 :120.00 元
C06《康熙字典》4册精装	售价 :180.00 元	C22《古文观止》4册大 16开	售价 :120.00 元
C07《曾国藩全书》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225.00 元	C23《三十六计全书》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1250.00 元
C08《辞海》4册精装 大 16开	售价 :75.00 元	C24《中国古代禁书》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1150.00 元
C09《四书五经》4册仿线装 大 16开	售价 :130.00 元	C25《中国古代野史》4册 16开	售价 :99.00 元
C10《资治通鉴》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145.00 元	C26《三国演义》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1150.00 元
C11《阅微草堂笔记》5册线装 16开	售价 :230.00 元	另有《西游记》、《水浒传》	每种售价 :1150.00 元
C12《唐诗宋词元曲》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125.00 元	C27《胡雪岩绝学》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1150.00 元
C13《中国对联故事总集》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120.00 元	C28《芥子园画传》4册 16开	售价 :125.00 元
C14《中国书法全鉴》4册仿线装大 16开	售价 :152.00 元	C29《中华名人百传》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125.00 元
C15《菜根谭全书》4册仿线装 16开	售价 :130.00 元	C30《唐宋八大家》4册大 16开	售价 :120.00 元
C16《中国公案小说》4册 16开	售价 :135.00 元	C31《世纪藏书集锦》电子图书类 10CD	超低售价 289.00 元
C17《中国通史》4册 16开	售价 :135.00 元	汇款请注明所购书名及册数 每册图书另加 8 元邮费	

咨询电话 : (010) 66248729 投诉电话 : 13240172529

汇款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 100076-22 信箱北京蓝航书店 苏玉梅 邮编 :100076

结缘南斯拉夫

● 阎明复

1955年4月下旬，我参加了接待南斯拉夫工会访华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团长是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斯达门科维奇，团员有南斯拉夫战斗报社社长、南共联盟中央委员贝戈维奇等。贝戈维奇是南共的老党员，参加过西班牙战争，是铁托总统的战友。全总领导派我同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的副秘书长俞志英负责接待。在陪同客人们活动中逐渐发现，在各种正式场合出面讲话的是团长，但是整个日程安排都要听贝戈维奇的意见，他对中国的情况十分关心，所提问题的针对性很强，显然是有备而来，实际上他才是代表团的核心人物。

1948年6月，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做出了决议，把南共开除出兄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同南斯拉夫断绝了一切关系和往来。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新领导主动承认苏联过去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是错误的，并着手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而1948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做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定时，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刘少奇署名的“共产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章，对南共进行了批评。后来苏共中央承认并改正对南斯拉夫的错误以后，中国政府决定同南斯拉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决定派伍修权同志（外交部副部长）为我国首任驻南大使。当时中共和南共之间没有任何接触。这就是为什么南共中央派出中央委员贝戈维奇以南工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中国进行

访问，以便同中共领导进行接触的原因。

在北京期间，南斯拉夫客人们参加了“五一”劳动节的各项庆祝活动。对在北京和外地的参观、同工会朋友的会见，他们都表示满意，最后只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会见。

但有一件事情引起客人们的严重不满。五一节期间的一天下午，我和俞志英陪同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参观劳动人民文化宫时，在大殿的围墙门口，看见大幅的招贴画，上面写着“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展览”。大殿里陈列着各种揭露美国称霸世界的大幅的照片、图表、实物，还有大幅的标语牌。其中有一张美国军事基地的分布图，是一张放大的世界地图，哪个地方有美国军事基地，就在那里插一面三角形的小旗。贝戈维奇发现在南斯拉夫的地图上也插了一面小旗，十分恼火，严肃地说：“这不对呀，我们南斯拉夫从来没有美国军事基地。”我当场把他的话翻译过来，旁边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现在是预展，这些展品要经过领导审查才能最后确定是否正式展出。走出展厅后，贝戈维奇通过俞志英向我们提出了正式意见。回去后俞志英马上赶到全总机关，向刘宁一等领导口头汇报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全总领导又给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后来俞大姐对我说，她专门写了检讨，宁一批评她，说你是一个老外事啦，还那样冒充！我说，我也有责任，想让外宾多看看，好心办了蠢事。

5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5月27日消息说，“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应被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的请求，在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接见了代表团，并进行长时间谈话，对若干重大

问题交换意见,并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同客人们谈了什么。直到1991年伍修权伍老的回忆录《回忆与怀念》出版后,我才了解了当时的情况。现将有关段落摘录如下:

“1955年4月,南斯拉夫派来以贝戈维奇为首的工会代表团,一面参加我国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一面就中南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进一步商谈。我国由邓小平同志与他接谈。当时虽然两国都有了改善关系的愿望,但是毕竟还处于‘解冻’的初期,加之本来就缺少互相了解,所以会谈时双方的态度都比较严肃。贝戈维奇认真地向我们介绍了南斯拉夫的情况和南共的立场,特别对1948年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做了大量的解释。我们过去对许多事情确实不太知道底细,对贝戈维奇的话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他们还就‘五一’节里游园中的一幅世界地图上将南斯拉夫划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并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向我们表示了不满。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让有关部门把那幅地图取掉了。”

中央领导同志会见后,代表团长斯达门科维奇和团员叶哥罗提亚乘飞机经莫斯科回国。贝戈维奇则取道香港回国,我送他到广州,然后经深圳出境。

二

不久,全总收到了南斯拉夫总工会发来的邀请函,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进行回访,为期二十天。全总决定派刘宁一率团,团员有全总书记处书记张修竹、全国重工业工会副主席石磊,以及两名翻译:英文翻译是全总国际部副部长蔡英平,我是俄文翻译。

出发前我们看了一些有关南斯拉夫的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西斯德国占领了东欧各国,包括南斯拉夫。1941年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山区发动抗德起义。当时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后来都被称为“首批战士”(即老战士)。他们与德国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依靠人民,英勇奋战,终于在1945年解放了大部分南斯拉夫的国土。

铁托在南斯拉夫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强的凝聚力,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多民族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当时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很好。二战结束后,苏联以及东欧其他国家给予南斯拉夫极大的援助。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南斯拉夫也得到了英国、美国的援助,同英美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开始是军事联系,后来发展到外贸方面,并接受美国的一些经济援助。

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反法西斯联盟也就解体了,昔日的盟国形成了两个尖锐对立的营垒:大西洋公约集团和华沙条约集团。在两个营垒对立的情况下,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继续保持与英美的联系极为不满,要求他断绝与英美的联系。但是铁托没有听从斯大林的指示,于是就发生了上述把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阵营开除出去的事情。

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南斯拉夫并没有向斯大林屈服,也没有向西方国家出卖自己的国家主权,而采取了符合南斯拉夫实际的自己的发展道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新的领导,特别是赫鲁晓夫掌权后,重新审查了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铁托与南斯拉夫人民



中国代表团在烈士纪念碑前留影。左四为刘宁一，右一为作者

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所犯的错误。中国也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访问南斯拉夫的。

9月16日，我们一行五人乘飞机从北京经莫斯科飞往南斯拉夫。9月21日飞抵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德拉·涅门科维奇等人到机场迎接。当天，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萨伊拉等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中国工会代表团。

在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处书记维沃达等人陪同下，我们在贝尔格莱德逗留两天后，乘汽车周游了南斯拉夫所有的共和国，参观了各类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项目，同各行各业的代表们举行了会见和座谈，以“车上观花”的方式初步了解了南斯拉夫现行体制的方方面面。

二十多天来，早出晚归，日夜兼程，风尘仆仆。每到一处，市政领导、工会干部热情接待，主动介绍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对我们关心的事，如管理体制、工人自治等等，有问必答。特别

是参观工厂、农庄时，主人们都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实行工人自治的经验。所到之处，南斯拉夫朋友对中国同志都很亲切，一谈到中国红军的长征，他们津津乐道，什么爬雪山，过草地，他们都知道，还讲给我们听。

同南斯拉夫朋友朝夕相处的二十多天，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十分融洽。无论是市长、工会主席或是普通工作人员，都很随和很朴素，没有什么“等级之分”，我们的司机就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吃饭。各地的宴请也很随便，从未刻意安排主次座位，菜肴也很简单。大家坐在餐桌旁自由交谈，毫不拘束，彼此坦诚地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询问关心的问题，往往聊到深夜。

南斯拉夫同志十分尊重南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光荣历史。他们自我介绍时，总是先说我是“首批战士（即老战士）”，并自豪地指着胸前佩带的“首批战士”纪念章给我们看。我们所到之处都看到庄严肃穆的烈士墓、纪念碑。特别是，主人们专门安排我们访问了遭到法西斯占领军大屠杀的克拉古耶瓦茨镇，在这里德国法西斯用机关枪屠杀了敢于反抗他们的全镇居民，连母亲怀抱中的婴儿也没放过。在耸立在山岗上的烈士纪念碑前，刘宁一团长带领我们全团向死难的烈士默哀致敬，并献了花圈。至今我还保存着主人们在纪念碑前给我们拍的照片。

二十多天来，我们在周游南斯拉夫各地的过程中，虽然看到有些地区仍欠发达，但总体上讲，他们比东欧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繁荣兴旺，人民安居乐业。城市街道整齐干净，绿树成荫，商店里的货物琳琅满目，各种食品、日用品应有尽有。大街上的路灯、商店的橱窗，整夜灯火通明。我们也访问了一些普通工人的家庭，虽然谈不上豪华，住的都是两三居室，但很整洁舒适。南斯拉夫的城镇居民有一个良好习惯，每天傍晚要到中心广场或步行街散步，有的小镇一半以上的居民都走出家门，无拘无束、悠哉悠哉地在街上漫步闲逛。看着这些围绕广场悠然自得地漫步的人群，不禁感慨万千。南斯拉夫真是多灾多难，千辛万苦，抗战四年，好不容易赶走了希特勒。刚过上二三年和平日子，又陷于斯大林的巨大压力

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自己的勤劳和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繁荣昌盛,我们感到由衷的敬佩。

在代表团结束访问前,南斯拉夫总工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刘宁一团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代表团在南访问期间,所到之处,未发现美国军事基地。10月20日我们代表团动身回国。以后,翻译的职业使我一再地接触、认识这个“标新立异”的国家,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的好奇心,决心去留意有关它的一切信息,摸清它的“底细”。

三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我还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被借调到大会翻译处,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接待工作。代表团团长维塞林诺夫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共和国塞尔维亚的党中央的书记、南共中央主席团委员,20世纪40年代当希特勒法西斯占领南斯拉夫以后,他参加了铁托领导的抗德起义,是南斯拉夫的“老战士”之一、深受铁托的信任。维塞林诺夫是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塞文同俄文同属斯拉夫语系,他能用俄文交流。

当时八大秘书处为每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团派了一位联络员和一个翻译。南共代表团的联络员是丘金,他是全国海员工会的主席。为了接待外国兄弟党的代表团,在西郊万寿路修了一个宾馆,一共有十八幢主楼、礼堂、服务楼等设施,叫“十八所”。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代表团都住在这里。南共代表团也住在这里。

在八大的全体会议上,维塞林诺夫代表南共对大会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说,南斯拉夫的党和人民以及铁托本人,一直非常敬佩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斗争业绩和现在的建设经验,认为两党两国所走过的道路有许多共同点,这都是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从各国具体情况出发的结果,这是对马列主义学说的发展和新贡献。他们希望这种创造和南中两国两党之间的友谊能够得到发展。

九月的一天,大会秘书处通知我,说明天下午三时毛主席要接见南共代表团,让我通知客人们。我马上告诉了维塞林诺夫。得悉这个消息后,

我自己又高兴又不安,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机会这样近距离的见到毛主席。

“八大”是在现在的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毛主席会见外宾就在大礼堂东侧的会客室。第二天下午,我陪同南斯拉夫客人准时到达政协礼堂的会客室,毛主席、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站在会客室的门口迎接客人。毛主席和客人握手后,突然说,“翻译同志,我们也握握手吧。”我急忙走到毛主席身旁,紧紧地握着他的大手,对我来讲实在是太突然了。

毛主席首先谈到情报局1948年和1949年的两个决议。他说,“1949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有表示什么。1948年那一次,我们写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和你们商量。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运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毛主席接着向客人解释1949年中国没有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他说,“1949年你们表示愿意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那时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朋友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当然没有作出决议说毛泽东就是铁托。从何时起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援朝打击美帝以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

然后,毛主席着重谈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以及王明路线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他说,“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批评斯大林。我们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那时共产国际做了许多错事。共产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的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损失最大。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王

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有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语，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后来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大林和罗斯福、邱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一些。这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评王明路线。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我们一字未提。不久的将来也许要提。过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谁让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倾、右倾的错误呢？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听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种中国人就不听那一套，并且批评教条主义者。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

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

接着，毛主席着重谈到中共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情况。

然后，毛主席再次谈到过去写文章批评南共的事。他说，“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杀人偿命，欠账还钱’。我们写过文章批评

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要沉默呢？在批评斯大林以前，有些问题不能说得这样清楚。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苏联不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我们也不好和你们建交。现在就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四条错误，我就和苏联朋友讲过。你们是同志，所以也和你们讲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登报，不能让帝国主义知道。以后也许有一两条错误要公开讲的。”

毛主席又谈到对斯大林的看法。他说，“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斯基的一篇长文章（指《托洛斯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及《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毛主席还谈到对苏联要支持、对斯大林的批评、对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

他说，“苏联一般来说，总是好的。他们有四个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他们的错误是会纠正的。

我们支持苏联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这一点你们也许不同意。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不同，我们人民不满意。”

他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间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

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

毛主席谈到中共领导正在考虑如何建立一种又有集中统一、又有民主、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的局面。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正在考虑这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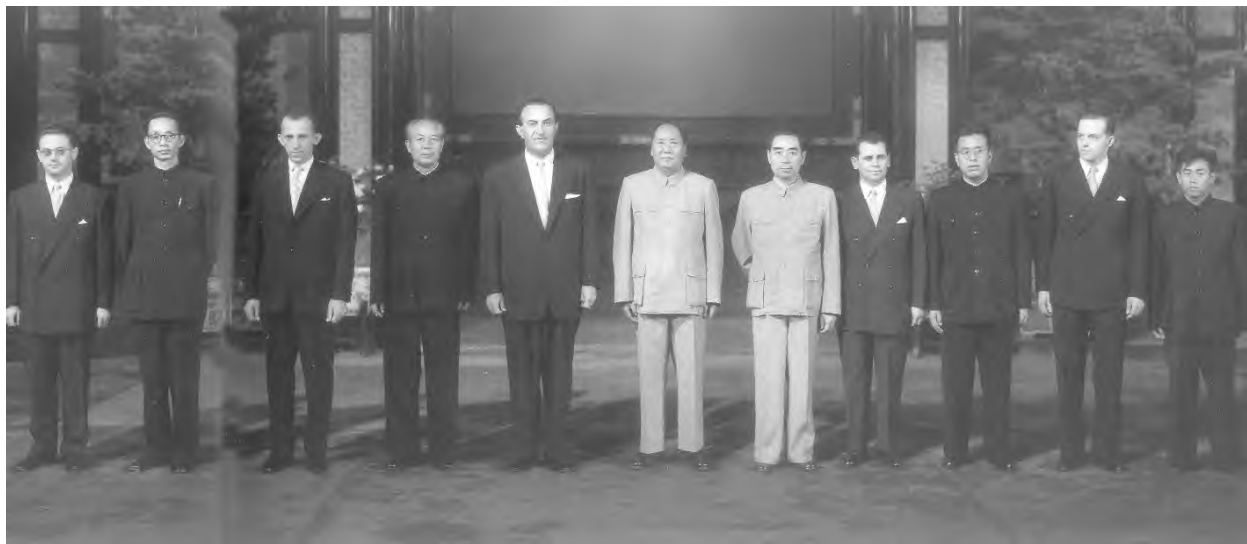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

最后,南斯拉夫客人请毛主席谈谈他不久前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毛主席说,“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位部长进行了一个半月座谈的结

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得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经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

毛主席同南斯拉夫客人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这次谈话已收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毛主席谈的许多内容我闻所未闻,再加上他浓重的湘音,听起来十分吃力,个别词如主席讲的“盲动主义”,我一下子找不到对应的俄文词,原想译成“冒险主义(авантиуризм)”,多亏了稼祥同志,他几次用普通话重复主席讲的话,而在“盲动主义”一词上他看出我“卡壳”了,轻声地用俄文提醒我“путтqизм”(在我摘录毛主席这次谈话记录时,发现《毛泽东外交文选》刊登的记录中删去了“盲动主义”一词)。我打心眼里感激稼祥同志,他帮我摆脱困境,勉强地完成了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的任务。九月的北京气候仍然炎热,政协礼堂当时尚未装空调,两个小时翻译下来,汗流浃背,浑身都湿透了。谈话结束后,维塞林诺夫代表南共中央送给毛主席一件纪念品,手工制作的银质瓶。多谢新华社的摄影记者,照下了主席接受这件纪念品的场面,我正站在毛主席和维塞林诺夫的中间,在翻译客人对这



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南斯拉夫首任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左五)

件工艺品的介绍。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就不禁回想起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的种种情景。

四

1956年11月15日到1957年2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同志率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六国。我参加了代表团的翻译工作。

先谈谈这次代表团出访的背景。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前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同年九月、十月期间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共插手处理了波兰事件,在中共中央的建议下,苏共出兵用武力解决了匈牙利事件。中国人大代表团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访问是在波匈事件发生之前确定的,当时提出的出访宗旨是:了解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考察各国议会在立法和监督方面的工作,向这些国家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特别是向东欧国家介绍有关统一战线政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情况。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中国人大代表团相应地增加了一项任务,即多做团结工作,推动东欧局势进一步稳定。



彭真(前排左六)率团访南斯拉夫

全国人大代表团到达南斯拉夫进行访问,是在《人民日报》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之后。苏联出兵平息匈牙利事件,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当时,南共联盟领导人,特别是铁托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抨击苏联。他们认为匈牙利事件是“人民群众反抗斯大林主义统治的革命”,说“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毕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正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行事的。”他们认为,匈牙利事件中产生的纳吉政府宣布国家生活民主化、要求苏军撤退、要求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实行中立,是表达了匈牙利人民的愿望。他们表示无保留地支持纳吉政府。他们说,“党是官僚制度的化身,无需恢复”,建议匈牙利“根本改变政治制度,把政权交给工人委员会”。他们认为,苏联政府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间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受到斯大林主义的损害,比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的总和还来得严重。”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铁托11月11日在普拉的讲话,他第一次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分子,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分子赶下台。

针对上述情况,在毛主席主持下,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讨论,通过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阐明了中国党对当前国际局势、国际共运中的原则问题的看法。

至于南共领导人的言论,据吴冷西回忆写道:“对于铁托作了批评,而且很严肃,但还是留有余地,采取同志之间商量问题的态度,肯定他正确的,批评他错误的,说得比较委婉,但原则性的意见都提出来了。”全国人大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时获悉“再论”的发表,中国驻阿使馆给彭真同志送来了他们收到的文章摘要。彭真说,文章针对性强,理论性强,说服力强,高屋建瓴,气势恢

弘,对铁托的批评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团里估计,对南的访问不会那样轻松。

1957年1月17日全国人大代表团在结束了对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访问后抵达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斯洛文尼亚四个共和国。同南共各级党政负责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这次访问中,南斯拉夫方面派了我们的老朋友南共中央委员、战斗报社社长贝戈维奇全程陪同代表团。

彭真同志和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议会的体制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一次,彭真同志笑着对我们说,战斗报社社长战斗力不减当年,从车上争论到车下。彭真知道贝戈维奇当年在西班牙打过仗,所以说他战斗力“不减当年”。当时李越然给彭真当翻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陪同彭真访问的是南共战斗报社社长贝戈维奇,他与彭真走一路辩论一路。辩论的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大林。贝戈维奇对斯大林非常恼火,说他大国主义,整南斯拉夫整得厉害。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对的,但赫鲁晓夫在处理兄弟党关系上仍然是大国主义。彭真坚持对斯大林要全面地、历史地、公正地给予评价,还是要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不过,在辩论中也有一致之处。彭真说,九国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是错误的。贝戈维奇听了很满意,说铁托坚持独立自主,深受南斯拉夫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我们不能听命于苏联的指挥棒。”代表团访问的几个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对斯大林评价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彭真同志正面地介绍了我们党对斯大林评价的观点看法。辩论归辩论,友好归友好,同志之间的辩论没有影响访问的友好气氛。

在贝尔格莱德,铁托总统接见了彭真同志和以他为首的代表团全体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在谈话结束时,铁托说,我有一些重要的话要单独同彭真同志谈,请他转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要这些年轻人翻译。这样,翻译换成了伍修权大使。多年后,伍修权同志的回忆录提到这次会谈的一些情况时写道:“1957年1月,彭真同志率领全国人大常委和北京市人委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从莫斯科

打来电话,通过我们大使馆找到彭真同志。周总理指示他利用这次访问单独会见铁托一次,向他转达我党的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由于这时苏共的名声很不好,没有几个党肯听他们的话,所以由中共和南共发起较好。彭真和铁托的这次会谈,是周总理指定我亲自担任翻译。会谈中铁托表示,关于召开各国党代表会议问题很重要,要在他们中央讨论一下。他个人意见是进行双边以至多边的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世界各国党的会议。后来他们中央经过讨论以后,答复我们的就是这个意见。于是,这次会谈除了‘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双方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外,这个问题就算结束了。事后,彭真同志专门向周总理报告过。”

2月1日,人大代表团结束了历时七十九天的对六个国家访问,回到了北京。3月31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四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彭真同志作了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六国的报告。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有关国家的使节应邀出席了会议。在会场上,南斯拉夫波波维奇大使的夫人问我,为什么你们代表团最后访问南斯拉夫?我的确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这样安排一定有所考虑,因为对保加利亚的访问结束后可以直接到南斯拉夫,保、南是邻国,从索非亚乘汽车到贝尔格莱德只需几个小时。而我们代表团是先乘飞机到阿尔巴尼亚访问的,之后才到南斯拉夫。我对大使夫人回答说,因为你们是最后发出邀请的。事后,我向代表团秘书长刘贯一汇报了此事,他说,也只能这样回答。

彭真同志的报告结束后,波波维奇大使说,报告中只有对南斯拉夫有所保留,让时间来解决问题吧。原来,报告中写到,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如何把企业的计划和国家的总计划(社会计划)结合起来,以防止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问题,我们访问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研究。”回想起来,南斯拉夫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虽然处于转型初期,但已显示出别的东欧国家所没有的活力。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角度去观察,必然得出叛经背道、不可理喻的结论。(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们在文革中掩护林县县委书记

● 方 徨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华大地。挥舞着“造反有理”旗号的造反派们，疯狂地在全国各地自上而下地揪斗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把大批对党的事业、对建设新中国有功的领导人纷纷打翻在地，有的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原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开始不久，以修建“红旗渠”闻名全国的林县就受到造反派冲击，他们砸烂了县委机关，揪出了以杨贵为首的一大批干部，而且狠狠批斗，对杨贵尤甚。造反派罗列了杨贵的许多罪名，说在杨贵领导下的林县根本不是“红旗县”（因林县在河南省改造贫困山区成绩突出并修建红旗渠，在六十年代被评为全省红旗县），而是“黑旗县”。“红旗渠”也不是“红旗渠”应叫“黑旗渠”。杨贵的罪名更多，什么“走资派”、“黑帮”、“坏人”等等。随着两派斗争的升级，要彻底打倒杨贵的一派人天天狠斗杨贵，企图要置杨贵于死地。在林县两派斗争的严重关头，恰好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和地质学院的几位大学生到林县串连。他们了解到两派对杨贵和林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经过到当地群众中实地调查，全县绝大多数群众和干部都肯定杨贵的功绩和林县各方面的成就，就坚决站在保杨贵的一边。

1967年初春，这几位大学生在一次杨贵被恶斗的批斗大会之后，趁机在群众的掩护下把被关在小屋里的杨贵抢出来。先是把他送往山西平顺县全国劳模李顺达家中藏身，后因山西形势也不好，李顺达自身难保，又把杨贵转移到襄垣县岭后村一户姓王的农民家里。林县造反派在山西查找杨贵，这几位学生又把杨贵送到北京，找到曾经在林县采访过，对林县和杨贵的情况比较熟悉知情，包括我在内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秘密地把杨贵保护起来，在北京躲藏了近三个月。最后在周总理的干预下，杨贵才逃过了这一关，重新恢复了工作。

杨贵是怎样逃过这一劫难，我们在当年“文革”天下大乱的形势下又是为什么敢于承担了保护杨贵的责任呢？从我个人来说，这还得追溯到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三面红旗”那段年月。那些年也是个荒诞而疯狂的年代，当时我在新华社河南分社当记者，亲身经历了那些年在极左思潮泛滥下出现的许多荒诞的事，有些我也是亲历其中。但即使在那样的形势下，有些人却不随波逐流，而是头脑比较冷静、实事求是，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杨贵和在他领导下的林县就是这样，因而对我教育极深。

河南是全国粮食生产大省，小麦种植面积占全国首位。1958年“大跃进”浪潮在全国涌动，河南是推动“大跃进”的源头之一。这一年从自然条件来说，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全国大多数地区，确实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成。河南省的几千万亩小麦，从淮河之滨直铺展到黄河两岸，碧浪无边，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若不是被无端掀起的那场批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保守”运动，和狂喊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急躁冒进口号的煽动，这一年和

随后的1959年,都应该算是大好年成和比较好的年成,也许以后被说成是“三年困难”的时期就不会出现。在当时天时地利而人不和的情况下,人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于是不切合实际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都冒了头。随着政治风浪的迭起和人们对当年小麦产量的冒进估计,人们头脑发热,从小麦产量带头放“卫星”开始,逐步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杨贵(前)带领林县干部、群众修建红旗渠

出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卫星”效应。现在看起来是荒诞无稽、不可思议的神话,而当年却是实实在在的主持了人们的头脑。这期间,我就报道了遂平县嵒山卫星高级农业社小麦亩产3200多斤的“卫星”消息,经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在全国带动起大放“卫星”的高潮。

经过狂热的“大跃进”引起的种种负面结果,尤其是发生了河南信阳地区丰年饿死人的“信阳事件”之后,使不少人头脑慢慢冷静下来。我随着采访接触面的扩大,结合现实开始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就在这时我去了林县。

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境内山高岩陡,土地瘠薄且严重缺水,是河南省有名的山区穷县之一。但县委领导班子作风踏实,杨贵从二十六岁起在这个县当了十八年县委书记,对全县情况非常熟悉,他领导群众战穷山恶水,改变生态环境,农业生产稳定,多年不仅不要国家救济,而且还有余粮支援穷困地区,是河南省改造山区穷县的先进典型之一。我第一次去林县采访是1958年秋季,认识杨贵也是这时。我初到林县的印象是这里没有外面的浮躁风气,同干部、群众谈话没有听到那些不切合实际的夸大言辞,县城和村庄里也少见蛊惑人心的战天斗地的口号。林县人显得特别朴实憨厚。那年秋季,平原各县已酝酿成

立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大办食堂的事,而林县动作却不大。当年还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极深,也加深了我对杨贵的了解。每年夏粮收场以后,河南从省到地区都要召开一次夏粮会议。这个会议很重要,因为小麦是河南省的主产,全年粮食征购任务主要靠小麦,要在夏粮会议上定下来。这年夏季新乡地委召开夏粮会议,各县第一把手都来了,我也与会采访作报道。由于受当时“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会上的气氛还是热烈而紧张的,各县报的产量也比较高,杨贵却迟迟不发言。直到主持会议的地委领导点了他的名,杨贵才站起来报了个比较低的数字,会上反应比较沉默。谁知杨贵在讲话中还加了一句“我报的产量数字包括水分在内”(即指是未经晒干的粮食),顿时会场哗然。领导当场就批评他是有意瞒报,右倾思想严重。散会后我问杨贵:“你真大胆,不怕戴右倾保守分子的帽子吗?”他答我:“方徨哇,我不能说瞎话呀!林县是山区穷县,解放前能有百十斤产量就不错了,现在生产条件有改善,可是放‘卫星’的产量不敢吹呀。我要是报多了,完不成征购任务,既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老百姓。我要对老百姓负责任啊!”

听了他的话,令我对他肃然起敬。果然第二年河南发生“信阳事件”,就是因为浮夸风造成

的说假话高估产，征购了过头粮，侵占了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半年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恶性悲剧，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在那段“三年困难”时期，我多次去林县采访，就没有听说过他们那里有饿死人的事。1961年他们还从多年积蓄的库存粮中调出1000万斤支援灾区，表现出林县人民和杨贵等县委领导班子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

我在林县采访的所见所闻，如一股清凉的山风吹进我发热的头脑，此后我遇事就冷静多了。1960年以后，林县在杨贵及县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决心彻底改变穷困山区的农业生产面貌，解决严重缺水问题。经过慎重的勘察调查，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太行山腰修建一条从山西平顺县引入漳河水的大型水利工程，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气壮山河的大胆设想。这项工程开始称为“引漳入林”工程，后来影响越来越大，外地慕名来参观的人不少，遂改名为“红旗渠”。参加修建“红旗渠”的农民工在太行山坚硬的岩石上，硬是用一锤一炮钻出了、炸出了几百里渠道，如天上悬河，将滔滔漳河水引入林县。又通过无数条支、斗、农、毛渠，形成密如蛛网的灌溉网，灌溉着56万亩农田，真是人间奇迹。“红旗渠”的修建引起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多次召见杨贵到中南海汇报工作，在国内外也引起巨大反响，因而林县在60年代初，就获得“红旗县”的称号。

正因为“大跃进”时期我在河南采访的经历，目睹了河南省在农村政策方面的得失起落，使我从对比中受到深刻的教益。其中对我教育最多的是在林县采访的那几年，因而我绝对不能接受“文革”中造反派给林县和杨贵罗织的罪名和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在杨贵遇到困难时决心帮助他。我想当时和我一起承担保护杨贵的同行和大学生们，也都是和我一样基于对林县和杨贵的了解而承担了这个责任的吧。

1967年3月的一天，有人到办公室通知我，说接待室有外调人员找我，要我去接待一下。我去了接待室，见里面坐着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彼此通报了姓名，才知道他们是中国科技大学和地质学院的大学生。男同学叫陈亦庆，两位

女同学一个叫白兰香、一个叫魏改莲。他们说他们到林县串连，了解到当地造反派对杨贵和林县认识上的分歧，经过和当地群众的接触，他们坚决站在保杨贵的一边，但因为两派对立形势越来越严峻，杨贵处境非常危险。他们不久前已将杨贵送到山西，可是山西现在也呆不下去了。因在林县串连时，多次听说过我们的名字，这才想到到北京来找我们，希望能和我们一起找到保护杨贵的办法，帮助他躲过这场劫难。我听了陈亦庆的介绍后，鲜明地表态支持他们的观点，支持他们的行动。我建议他们赶快把杨贵送来北京，我们总会找到办法来保证他的安全的。陈亦庆他们还带来一个过去在林县采访过的记者名单，其中就有《人民日报》的宋铮同志。他们想多找一些人，那样办法就会多点。事后，我把和陈亦庆见面的事首先告诉了我的好友程竞明。她是新华社国内部的老编辑，曾去过林县和杨贵夫妇很熟，也了解杨贵和林县的许多情况。她听说杨贵被打成反革命，当然非常义愤，表示坚决保护好杨贵的安全。

转眼到了5月份。一天我接到陈亦庆的电话，说他们已将杨贵送到北京。为了安全起见，约定好第二天上午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见面。八宝山在北京西郊，当时这一带还比较荒僻，平时去的人不多，只有一条公路通往首都钢铁厂，来往的公交车在八宝山有一站。当天一早我和程竞明乘公共汽车赶往八宝山，进入公墓大门，只见本来应是十分庄严肃穆的地方，眼前却是一片寂寞凄凉景象。大门外没有警卫，两旁原本整洁的墓园，到处散落着红卫兵来造反时遗留下的标语口号残片，随风四散飘零。早已无人修整的墓道上已是荒草萋萋。按照约好的联络暗号，我们在骨灰堂前的广场上喊了几声，拍拍巴掌，只见从东面一溜长着小松树的山岗上出来几个人，是陈亦庆、白兰香他们领着杨贵等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县委副书记秦志华，他也是被逼出来躲难的。多年不见杨贵，此次见面只觉得才近四十岁的人却苍老多了。5月的北京天气已比较燥热，可杨贵身上还穿着一件旧棉大衣，握手时他的手抬不起来，说是被批斗时打坏的。此地不便久留，和陈亦庆等简单交谈几句，陈亦庆郑重地说：“这就把老杨交给你们了。”以后，我们就分手了。

那时我家住在军事博物馆对面的皇亭子新华社宿舍大院内。原有三室一厅住房，“文革”开始不久机关造反派以“资产阶级特权”为名，将我们的房子挤出一间让给另一户住，就显得挤了。好在我和老伴早已安排好，杨贵就先在我家安顿下来。我们还和孩子们讲好不要带同学回家，更不要说家里来了客人。所以，老杨在我家



毛泽东接见杨贵

住的几天，周围没有一个人知道。不几天，程竞明就来把杨贵接到她家去住了。程竞明家住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里，房子比较宽敞，老杨在她家住的时间比较长。老杨被大学生送到北京以后，林县两派斗争仍非常激烈，尤其是杨贵失踪后，要打倒他的一派到处派人打听他的消息，扬言要把他抓回去，又限制杨贵妻子、儿女的自由，使他们一家互相音讯断绝。后来北京高校“红卫兵”组织几次要冲击国务院宿舍抄家抓人，看来她家也不安全，程竞明又把杨贵转移到朝阳区纺织部宿舍她姨母家去住。她姨父吴本藩是纺织部顾问，两位老人正直慈祥，对杨贵的遭遇极为同情，照顾得很好。可是不久纺织部宿舍里也掀起揪斗高潮，老专家更难幸免，只好匆忙又将杨贵转到别处。杨贵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北京住了近三个月，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住，几天就要换一个地方。一般转移都是在晚上，有时由我和程竞明护送，有时由陈亦庆他们负责，真有点像当年打游击和敌人周旋的战斗生活一样。

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一段时间，可是老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当时大家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多久、发展趋势如何都心中无底，总希望杨贵和林县的问题能早点解决才好。怎么

办？这时我们想到周总理。周总理对杨贵和林县的工作是了解的，特别是修建红旗渠时，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是支持的，还几次要杨贵到中央来汇报工作，杨贵受到过赞扬。因此，我们想要解决杨贵和林县问题，只有靠党中央、周总理，把林县和杨贵的现状，直接捅到周总理那里去，也许能促成问题的早日解决。我们和杨贵及大学生们商量取得一致的认识后，决定由我执笔起草一封写给周总理的信，希望总理出面干预。我在这封信中，主要用事实驳斥了林县要打倒杨贵的那一派人的观点和对杨贵莫须有的罪名。认为在杨贵主持下过去的林县工作成就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修建“红旗渠”更是为民造福的英雄业绩，不能随便诬蔑否定。信中还介绍了林县目前的情况及杨贵所处的危险境遇，希望总理能出面干预，以求早日解决杨贵和林县的问题。信写好后我和程竞明签了名交给陈亦庆，由他送到人民日报社请宋铮签名，然后经人民日报社和中央联系的渠道，信很快就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这是1967年7月间的事。

信送上没几天，一天我刚进办公室，同室的老编辑杨居人突然小声问我：“方徨，你们把杨

贵藏起来了？”我大吃一惊，保护杨贵的事若被机关造反派们知道了，那是不得了的事。我们非常注意保密，机关里谁都不知道。我听杨居人问我，当然吃惊了。杨居人看我紧张的样子，连声说：“别紧张，别紧张，你们是做了件好事嘛！”然后告诉我他知道此事的经过，说还看到了我们写给总理的信，上面有总理的批示。这时我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文革初期，河南造反派冲击省委时，把时任省委领导人之一的纪登奎揪出来批斗，保纪的一派中有人认识杨居人。在纪登奎被批斗激烈时，也是偷偷地把他送到北京住在杨居人家里。因此，杨居人和纪登奎相识了。纪登奎比较早的就得到解放回河南工作，1967年中央正着手解决各地区两派大联合的事，河南两大造反派到北京开会，河南省委派纪登奎来主持。他临走前，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刘建勋，把总理交给他的这封信又转交纪登奎，要他到北京找到写信的几个人，查明杨贵下落，并要和他联系上。纪登奎又转托杨居人，才找到了我。杨居人说，信上总理的批示，大意是说“杨贵和林县的工作过去是有成绩的，说林县是‘黑旗县’，‘红旗渠’是‘黑旗渠’是不对的。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杨贵，早日把他解脱出来。”听了杨居人的话，我当然高兴极了，总理亲自过问，杨贵的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了。随即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杨贵本人和陈亦庆他们，大家的心情当然都和我一样，深深为周总理、刘建勋对解决林县和杨贵问题的关切和重视而感动。

没有几天，纪登奎派来和杨贵见面的同志来了电话，要我们通知杨贵并把见面的地点和时间告诉他。为了安全起见，见面地点定在我家，我请了一天假在家负责招待他们，并在前一天把杨贵接到我家住。和杨贵见面的张成国同志第二天一早就来了，他们整整谈了一天，晚上才走。此次见面之后，听杨贵说他们又曾多次见面，并有林县派来的同志参加，不过杨贵仍然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只是心境好多了。

这年8月份的某一天，我又突然接到北京市委一位同志的电话，说杨贵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要接他回郑州去，让我通知老杨做好准备。因为电话来得仓促，我们过去从未同市委的人打过交道，心中不免疑惑，是真的接杨贵回郑

州，还是要打倒他的那一派要揪他回林县呢？因为当时的派性还是很严重的。为了稳妥起见，我和程竞明商量还是亲自到市委摸清情况。于是我们以新华社记者名义第二天就去了市委。那时机关秩序还未恢复正常，警备又不像现在这样森严，何况我们手上有新华社的工作证。到了市委顺利地找到主持工作的吴德同志。吴德对打电话的事做了肯定答复，还表扬了我们保护杨贵的事做得对。他当即找来一位秘书，说电话就是我要他打的，安排杨贵回河南的事以后就由他和你们联系。这一下我们真放心了。

第二天傍晚，市委派车从程竞明家把杨贵接走，那位市委秘书也随车来了。从此，杨贵同志结束了几个月的不正常“逃难”生活，我们也完成了“保护任务”。

此后不久，传来杨贵已参加省里三结合领导班子，并兼任林县革委会主任，开始处理两大派大联合的艰难任务，这期间我们联系就不多了。多年后，经周总理点名调杨贵到中央工作，后又到公安部任职，我们才又见到他。“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有一段时期他又蒙受不白之冤，出于对他人的了解，我们始终支持他、帮助他。后来在当时中央许多老同志的关心指示下，他的这些不白之冤也都搞清楚了。由于杨贵同志这些年的坎坷经历，我们曾与他一度患难与共，到晚年，我们倒真成了“莫逆之交”了。

（责任编辑 叶方）

敬告读者

2004年合订本已装订成册，请速汇款邮购。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3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2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1年精装 75元； 简装 无

2000年精装 无； 简装 70元

1999年精装 75元； 简装 无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

● 陈大斌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的初冬,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幼年时起就崇敬劳动模范。直到退休之时,仍然如此。看看他们那憨厚、淳朴的笑脸,听听他们充满泥土芳香的庄稼话,就感到亲近。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劳模,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长辈。而陈永贵,我还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是什么样儿。从1972年夏天开始,十几年间,我多次采访他,1974年在大寨、昔阳住过一年时间,与他有一些交往。可惜,那时,他已经不是一般农民,政治上正处在节节上升的时候。他的身上有农民的某些特点,却也沾上了许多官气,特别是随着地位的攀升,与我们这些记者越来越难平等交谈了。

在山西省,我还认识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他憨厚淳朴,总保持着忠厚农民的本色。有一次在太原的大街上,远远地看见一辆银灰色的伏尔加轿车开来了,有位记者朋友招手拦车,说,“让老李带上我们一段路。”身材高大的老李不仅让司机停车,而且笑哈哈地招呼我们:“快上来!咱们有车同坐。”这种事在陈永贵身上便绝无可能。所以,我们对陈永贵,可以尊重他,甚至敬畏他,但不大可能亲近他。

1972年7月我采访他时,那天他情绪特别好,一口气谈了五个多小时,话里有些闪光的思想和语言,给我启发。中午请我们吃饭,他喝了整整一瓶汾酒。饭后我们请他合影,他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一起站在昔阳二招大楼门前照相,院里不少外来参观者围观,也有不少人凑上来跟他握手搭话。陈永贵乘着酒兴,很兴奋,也很得意,向

大伙招着手,同时大着嗓门问我们:“有人说,来大寨、昔阳参观,要见我陈永贵,比上北京见毛主席还难!你们给说说,难不难?”听了这话,我的心猛一缩,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涌上心头。

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潮的不断低落并最终止息,他失去了一切高位和权力,又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当他正走红,官气十足时,我们对他是敬而远之,有工作才去找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也从不去跟他拉扯;而当他失势之后,倒又看到他的若干好处,很想去看看他。毕竟他是一个太行山里的老农民嘛,是个辛劳多年,也做了不少好事的农村基层干部。后来他升了这么高的官,也绝不是他自己想当就当的,做了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这样的大起大落,恐怕够这老汉受的。

1984年11月底,我已调到新创办的《瞭望》周刊工作。周刊英文版有位女记者,家与陈永贵住得很近,有机会见到他,并有采访他的打算。她来向我了解老陈的情况,我便托她去问候老陈,并表示要去看他。

第二天她就带来了回话:老陈说,欢迎去他家玩儿玩儿。

那天清晨,我早早来到他的住处。这是部长级干部才有资格住的高级公寓楼。

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给“农业学大寨”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十多年的运动,就此终止。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



1964年12月，朱德、周恩来和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陈永贵在一起

构。这时，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就再没有任何职务了。党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据说，是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13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

陈永贵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直到这时，他和家人才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了北京市市民。这位操劳了大半生的人，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

开始时，他仍然住在北京交道口附近的那座四合院里。日子非常清闲，他也不急于把老伴、儿子搬来。但没有任何工作了，心情苦闷，整天坐在家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过去一闲下来就回昔阳、大寨看看，现在山西省正在搞“清查”，他不便再回到他熟悉的太行山里去。这时，中央还是很关心他的。邓小平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胡耀邦也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劝他宽心，不要背思想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很快就到了1980年年底。陈永贵心上的火气慢慢地散发了，他冷静地想了想，愿意接受中央的善意安排，把老伴接来，在北京安家，把心爱的幼子接进京来上学。他一辈子没有完全摘下文盲帽子，他希望儿辈能在北京上个好学校，将来上大学。此时秘书已经离去，他让警卫员张良昌帮他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部的，让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

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大寨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待。另外，也对老战友们说了自己的家庭安排，老伴、儿子进京，在北京落户，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等物的大砂缸都交公归队。这封信算是他对大寨的乡亲和战友们的告别。

另一封信给他老伴宋玉林，让她料理一下，赶在春节前把家搬来北京，让小儿子陈明亮转到北京的学校上学。

他还交待老伴，把那块自己用过的羊毛毡送给老伙计贾进才。贾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大寨德高望重的老模范。几十年来，他们之间恩怨颇多。不知为什么，陈永贵似乎总爱拿这个只知道苦干，不善言语的老实疙瘩开刀。六十年代否定了“贾进才三让贤”的事，狠狠地贬了老贾，七十年代要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竟把这位老伙计闹成了从五十年代就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走资派”，编排了他许多不是。老贾干生气没办法，为了维护大寨红旗，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任凭陈永贵对他头上泼脏水。人都说老贾这人心特别宽，只有他才忍得下，从来没有为此跟陈永贵闹过。现在，陈永贵自己要离开大寨了，他又想起老贾，把心爱的毛毡送给他。这时，陈永贵的心绪一

定是非常复杂的。他要向这位老伙计说的话一定很多很多。一条羊毛毡,道得尽满心的话吗?表达得了那么复杂的情感、思绪吗?

安排了这一切之后,他就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搬家的要求。不担任领导职务了,就不再住这个大院了。国管局先是回了话:此事已请示了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不要搬了。急急地搬家,影响不好。

可陈永贵坚决要搬,“不在其位,不享其禄”。他把这句老话时常挂在嘴上,三天两头打电话去催,让警卫员去讲。最后国管局分配给他这座部级高干公寓楼的一套居室。1981年春节刚过,陈永贵举家搬出交道口那座院落,住进了木樨地这座公寓楼的一套房子。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着,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见我进来,一手端着碗,一手拉着我进了客厅,让我在沙发上落座。我仔细看了看他,外表没有多少变化,还是穿着黑色对襟的夹袄,宽大的黑裤子,家做的黑布鞋。脸上还是满满地刀子刻出来似的皱纹,又密又深。精神仍然十分健旺,年过七十的老人了,可并不见老。抬手动脚都十分利落,说话声音宏亮,吃起糊糊来呼呼有声。再环视一下厅里的陈设,一看便知道,沙发、桌凳、书柜这全套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书柜里摆着不少书。我过去看了看,多是文革中出版的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有翻译过来的古代印度史、埃及史等,还有“四书”“五经”等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这些显然也是公家发的,摆在那里,主人是不会去翻看的。我正看着,老陈吃完饭丢下饭碗走过来,使劲跟我握了握手,喊着:“大斌同志,谢谢你来看看我。现在也不用谈工作了。我是个平民百姓了,咱们这见面是老朋友交往,不讲别的事儿,也不用说工作上的事了。”

我忙上前问候:“这些年不见,挺想念你的。早就想来看看你。身体好不好?”

他高兴地哈哈大笑,抬抬胳膊伸伸腿,说,“你看,壮着哩!一说这我就高兴啊!从我往上数三代(再往上数我就知道了),老先人们都没

有我的年岁大,在旧社会,老一辈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七十,算长寿啦!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幸福啊!”

前些日子,听人说陈永贵下台后满腹牢骚,整日愁眉苦脸。可是,今天坐在我面前的陈永贵,却是另一个形象。他精神健旺,性格开朗,看不出有什么苦恼,也没有前些年的逼人官气,又是一个慈祥、热情、善良的老农民模样了。我们对面坐着,平等地、自由自在地说着家常话。十多年来,我多次见到陈永贵。说句实在话,只有这时才对他有了几分亲近的感觉。

正说着闲话,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这几年新闻界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写文章骂我。你写过没有?”

这一问倒是有点意外,我说:“这话看怎么说了。恐怕也不能说你的记者朋友都写文章骂了你。人家是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嘛!至于我,你也知道,那几年我在新华社管农村报道,我虽没有写过‘骂’你的文章,可那几年的报道,没少批评‘学大寨’运动,那些报道是我组织的,文章、报道都登在报上,你一定都看过,那是我的工作。还有,去年秋天,我参加了对大寨、昔阳的调查,调查报告里说了你们的好话,也说了坏话。不过,不管好话坏话过头话,都是调查组那个时候的认识,不代表哪一个人。”

陈永贵仔细地、耐心地听我说长篇大论,等我说完了,他一摆手,哈哈大笑,说:“你倒说的仔细。我也就是这么一问。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好哩,坏哩,批哩,骂哩,都过去了。不想它了!也不说它了!”他又笑了起来。

我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风风雨雨,你过的也不容易。你上了年纪了,还是平平静静、高高兴兴养老,过几年好日子吧!我们希望你健康长寿!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幸福!”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去看看去!现在我只这么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

汤师傅名叫汤占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为老陈开车的汽车司机。过去陈永贵当副总

理时是他开车,那时开的是“大红旗”,现在仍然是他开车,开的是一辆苏联产的“伏尔加”。

我们刚要出门,老陈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喊他老伴:“快把咱借人家农场的涮锅拿来,我带回去还人家。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帮他提上铜火锅,他说:“前几天昔阳来了几个老乡,非得要吃涮羊肉,我就借来锅子让他们在家里涮了一顿,又亲热又省钱。”

当时已是冬天,我已穿上了薄大衣,可老陈却只穿件黑夹袄,出门时也不加衣服。我说“天冷了,多穿点衣服。”他说,“不怕,我穿着毛衣呢。”他掀开黑夹袄,里面确实穿了件家织的黑毛衣。司机老汤说,“老汉身体壮着哩,大冬天早起逛农贸市场,也就是穿这一身。”

上了车,我问他:“有空了,还去自由市场哩?”

他说,“现在是天天有空闲了,去买点菜,去跟人家说说话,了解点社会嘛!可就是不敢多去。北京人都认得我这张脸,认得我这‘永贵大叔’!买点啥人家非得照顾咱,有的还硬不收钱,给咱闹开了特殊化啦!”

我们就坐上汤占兴师傅开的伏尔加轿车奔东郊农场。一路上汤师傅对我讲了许多“永贵大叔”下台后的故事。

汤占兴说,老陈对自己要求严,就说这部车吧,除了他上农场办公事,私事一律不许用,老伴、儿子都不许用这车。平时,老陈自己也很少用车,常是一个人去挤公共汽车,更喜欢乘地铁。

有一次,陈永贵提上篮子上一家国有菜场去买菜,售货员抬头一看,不禁喊了声“是永贵大叔!”忙跑进店里找出经理来。那位经理一看,果真是陈永贵,就拉上他进店里坐坐。陈永贵也乐意跟老百姓聊聊,就随他进了店里坐下来,喝茶闲聊。售货员从后院里捡出一篮子十分新鲜的蔬菜送上来,经理说:“这算我们店送给

你老的,分文不收。”陈永贵说:“给了好菜,再不给钱,可就太特殊化了!”他忙撂下钱,转身就走。经理和售货员送到门外,喊着:“往后多来!”可陈永贵再也不敢进那家菜店。他说:“卖菜的是好人啊!可太客气了。咱不能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哩!”

下了台的陈永贵,在北京普通市民中间,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贵大叔”。陈永贵深情地说:“北京人待咱不薄,没有谁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说这话时,他恢复了以前那宽厚的、知足常乐的淳朴农民形象。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中午,我们在农场机关食堂就餐。正巧有位港商来农场谈生意,慕名求见陈永贵,非得邀请他共进午餐不可。陈永贵乐哈哈地答应,“好,好!请吃饭还不好?”饭桌上拿出酒来,是京郊产的“二锅头”。陈永贵像孩子一样高兴,说,“那

咱就跟香港朋友干一盅!”他高兴地连喝了几盅酒,满面红光,说话声笑声更加响亮了。

送走那位香港客人,陈永贵和我们一起在农场大院里散步,闲聊。几杯烧酒下肚,他的话也更多了。有些话我本来想问又不好问,他都主动对我们说起来了。

我听说陈永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直不理解,对“包产到户”心怀不满。

有人说,在公开场合他不多说,而在私下里,他却直言不讳地攻击包产到户。他说,“大包干”的确可以暂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那调动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人的私心,不合社会主义的



老石匠贾进才(左)是大寨最老的共产党员

方向。

这次见了他之后，我便很想问问他怎样看待当前农村形势，了解他对“包产到户”的真实想法。但又因为我了解他七十年代末时的态度，怕提起这些事又触到他的心病，破坏了他今天的好心情，所以一直没好开口。可是饭后散步时，他却拉住我，主动说了起来。他问我：“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管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样，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个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听到这里，我挺受感动，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这时，他确没有必要再向我说大话空话假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段时间，他曾有一段时间想不通，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发过不少牢骚，甚至还扬言要“抗到底”。这些情况在一些书籍及报道里多有披露。但人的思想是可以变化的。下台后，他冷静下来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改革巨大成果面前，他思想上的弯子慢慢转过来了！他终于走过了不通、顶牛的痛苦阶段。

“对现在的形势我也有意见，”陈永贵毫不隐讳地继续说道，“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怎么回事哩！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陈永贵下台后，尤其是搬到木樨地的公寓楼上后，没有森严的警卫了，见人方便了，昔阳、大



1974年冬，作者与陈永贵在大寨村里合影

寨的亲友故旧，进京来都要来看他，使他更多地了解下情，了解了民意。他那12层楼上的房子就成了昔阳、大寨人进京的落脚站。凡是因公来京的，路费住宿费可以报销的，就去住旅馆；因私的，或看病，或办点私事的，没有人给报住宿费，乡亲们也不大富裕，统统留在家里住下来，床不够好办，好在客厅里有公家配的地毯，毛绒绒的，比羊毛毡还舒服。来人也都不讲客气，就在地毯上打铺睡了。那间客厅里，哪个月也得接待几批客人。除了安排住宿之外，乡亲进了家门，陈永贵便要陪着喝上几盅，席间他也向来人问问家乡的人和事。家乡人带来的消息，有的让他高兴，也有的让他叹惜，如有些老伙伴下世了，谁得了重病，等等。

来北京看病的人总爱来找他，希望他帮助联系一下好医院，找个好医生看看，拿些好药吃。老陈都热情接待，打电话联系医院医生。

他热情地帮助家乡来人，也寄托了他的思乡情怀。他一直思念着大寨，思念着乡亲们，也曾几次想回乡看看，可都没能成行。回去一趟只一夜

火车就到了阳泉，再坐几十里汽车就到了大寨。可这趟路对于他也是很不容易走哩。回去了，有些人见不见？有些话说不说？反过来倒过去地考虑，最后还是咬咬牙算了，不回去了！

不回去的决心下了，可思念是无法丢掉的。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长叹一声：“白天没处动弹，黑夜叫我回村干活去了。”

除了看病之外，家乡人也有托陈永贵走后门办事的。能办的他尽量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熟人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妥当的，只要了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看着陈永贵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他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直跺脚，求老陈别打电话，别退车皮，可陈永贵理也不理。把车皮退了之后，陈永贵仍然十分生气：“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大概就是这些事，使陈永贵了解了如今老百姓的难处，了解到有些部门和国家干部以权谋私。他切齿痛恨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

我们与陈永贵在东郊农场待了大半天。他担任这个农场的顾问，每周只来一次，却很尽力。农场的干部说，老陈可帮了大忙了！他帮我们办了一些我们办不成的事，买到一些我们买不到的生产资料。全场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干部、职工都欢迎他，尊敬他。大伙都说，这还是个好老汉！

傍黑时，我们离开农场往回赶。一路上老陈讲了许多他个人和其他几位工农中央委员的一些轶事。那天，他情绪很好，一直把我送到新华社

大门前。我说，要不要进去坐坐？熟人们想你哩！他摆了摆手说，不了，不了！以后有空就到我这儿玩儿玩儿，说说话。别看我不识多少字，没看过多少书，可我经过的事多着哩！从办互助合作到办人民公社，从大队支部书记一直当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有几个？我经过的事多着哩，心里想的事多着哩！听我说说，对你们能没有好处？

我点头称是。

可惜，后来因为工作繁忙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没能再登门拜访，听他说话。1986年3月26日他在北京医院去世。听到这消息，我的心上涌起一阵悲凉！一年多前，他身体还那么健康，精神还那么健旺，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我更后悔这一年多的日子里，没有再去看看他……

“永贵大叔”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创业时的风采我没见过，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和最后最潦倒的日子，我都看见了。使我难忘的是他晚年的平民形象，是农家老汉的风采。一个人，不管他个人多么出众，都不能离开人民群众，不能脱离实际。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与实际生活隔膜了，他的脑子里就会被那些超出常理的怪念头迷住，就会办出蠢事。

陈永贵是从农村长大，一直到年过半百之时，还没有真正离开农村。但他使用手中的权力推行的那场运动，使他脱离人民，脱离中国农村的实际，使他与人民群众的心想不到一起去了。一些人别有用心地鼓吹“一大二公”的所谓理想，使他头脑发昏，一心“兴无灭资”，要在太行山里培养起“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新农民”，建起一个只有“公”没有私的理想社会！十多年间，他不遗余力地推行一整套“左”的做法。有几年，我看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有人说他是“农民政治家”，其实，那时的他既失去了农民的淳朴，又没有政治家的胸怀和韬略、理论水平和治国济世的经验，真是一个“四不像”。而下台之后，他又回到了人民中间，改革开放的现实教育了他，使他头脑清醒起来，又恢复了正常的农民的思维，丢掉了那些怪诞、奇幻的空想，恢复了农民的淳朴和实在。

晚年陈永贵的农家老汉形象，使人感到亲切难忘！
(责任编辑 李 晨)

现行土地经营体制调查与建言

● 张根生

土地是大自然给予人们的最珍贵、最稀缺和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尤其显得金贵。广大农民以土地尤其是耕地为衣食之源、生产之基和生存之本。正因为如此,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历来为当政者所重视。

但是,现在有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来招商引资或搞政绩工程,不仅浪费了民族子孙永续发展的资源,还埋下了社会动乱的根源。为此我组织了几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对我国现行的土地经营体制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深化改革土地经营体制的建议。

中国人均耕地十分有限。2003年前,短短七年间竟减少了一亿亩多。这幅度太可怕了!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人均可耕地是十分有限的。1996年,全国开展土地普查,实测耕地为19.5亿亩,到2003年,下降为18.5亿亩,短短7年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减少了1亿亩耕地,年均锐减1400多万亩。速度十分惊人。已超过了1999年国家土地总体规划中规定的到2010年全国耕地面积总量应保持19.2亿亩的底线。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非农建设用地集中在本来比较富庶的城郊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灌溉高产田。每占一亩耕地就使1.4个农民失地,一些本已小康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后,由于就业困难,往往又变为城市贫民和无地农民,常引发出尖锐的社会矛盾。

党中央、国务院近几年来高度重视土地问题,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整顿目前国内肆意乱圈、乱占农村土地的错误行为。关闭了70%的各种开发区,清退复耕土地2000万亩,取得了重大成绩。

在近10年里,国内在“经营城市”的错误思想引导下,各省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量占用农村耕地用于开发房地产和建设开发区等情况,据中国社科院调查统计,近几年全国就占用了农村土地4736万亩。这种情况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省和江苏省则更为严重。以广东省为例,这里改革开放最早,经济发展很快,耕地的变化也很大。1980年有耕地4126万亩,到1995年降为3475万亩,到2004年又降为3200万亩,一共减少了926万亩,其中2003年一年就剧减了334万亩,如果以1996年的土地普查数为基准,耕地可能减少达1500万亩。全省粮食生产已低于1978年,比1990年最高产量下降30%左右。广东省在中央正确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指导下,为全国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广东在占用耕地上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减少的耕地绝大部分是高产的水田,从而使粮食生产能力大幅度下降了。

沿海发达的江苏省原是农业强省,情况类似广东。80年代,



城市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

该省有耕地 8800 万亩,现在只剩下 6600 余万亩。粮食产量从 80 年代 670 亿斤下降到 2003 年的不足 500 亿斤,棉花产量从 1380 万担下降到 750 万担。代价也是巨大的。

国民经济在迅猛发展,占用耕地在所难免,但占地太多,太浪费,又监管不力,这种趋势如不制止,就难以为继。我国是 13 亿人口的大国,年均需粮 1 万亿斤左右。90 年代连续四年曾达到过这一水平,但 2003 年降为 8610 亿斤,这个底线敲响了警钟。我们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须保证全国人均有一亩常用基本农田(目前全国已有 8 个省低于这一水平,有 666 个县已低于人均 0.8 亩)。到 2020 年,按年均增加 1000 万人口计,总人口将达到或超过 14.5 亿,而目前常用基本农田已只有 15.78 亿亩,接近临界线。虽然还有 2 亿多亩易旱易涝的低产田,但多在西南、西北偏僻地区,增产很难。在保障环境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可以垦复和开垦一定数量的农田,以提高粮食生产综合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央的要求是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并落实到地块和农户。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在今后二十年大发展机遇期中,我国经济要再翻两番,当然还要再占用一些耕地,这是必然的。但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一定要加强耕地的严格管理,同时要对土地经营体制进行深化改革,才能缓解人地矛盾,达到既保障粮食生产基本自给,又使城乡建设、工农业生产协调发

展,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造成现在中国土地问题如此严重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经营体制不合理,管理混乱,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遭到严重损害

我国大规模建设占地始于广东珠海、深圳特区。当时为了建立特区,由政府出面、出资,将开发区内农民承包的土地收购。当时由于尚未开展房地产业,土地市场还没有形成,地价很低。政府同时将失去土地的农民转为

城市户口,并安排就业,农民基本同意。全国后来搞的很多特区、开发区,大体上也都是采用这个办法。但这个办法的实质是计划经济手段,由政府包下来。

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再靠转户口、安排就业等计划经济手段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城市经济发展占地规模越来越大,不仅公用设施要占地,房地产业和其它工商业也要大量占地,土地迅速升值,占地同农民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相继设立了土地管理部门,加强土地管理。土地管理部门的职能本是负责执行和监督、监察国家土地政策,但后来却逐渐演变为直接经营土地。不仅国家建设用地由政府出面征收,商业用地也由政府先征收再转卖。从圈地、定价到交易,都交国土管理部门一家经手完成,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政企不分,垄断经营,也就是人民群众称之为的“官倒”。各级政府通过本级土地管理部门,将农民的土地低价拿来,转手经营,高价出售,谋取暴利,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恶化了党与农民的关系。

现在政府有关部门征用农民土地,说征就征,公益占地,政府出面征,商业用地,也是政府出面征,而且是强制性的

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应该受到法律

保护的。我国的《宪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此都有明确规定。但现在说征就征，不仅公益性建设用地由国土部门出面征用，企业的商业用地也由政府国土部门出面征收。而且，完全是强制性的。在征用土地的全过程中，农民没有参与权、要价权、谈判权，全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甚至动用专政工具强征强占，失地农民的权利遭到践踏，意见很大。失地农民对征地的满意率江苏调查为 5.7%，四川成都武侯区为 7.5%，很多人还是被迫接受的。广东省政府 2003 年和 2004 年接待的为土地问题群体上访 1959 批、19917 人次，平均每天 2.7 批计 27 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提供的一份材料表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专栏组 2004 年上半年收到观众反映土地问题的声讯 15312 次，占声讯总量的 24.5%。课题组接触到的 172 封农民告状信中，涉及土地问题的占 63.4%，130 起农村群体突发事件中有 87 起由土地问题引发，并酿成了“警农”冲突，造成数百农民受伤、3 人死亡、160 多人被拘留。从中央台群众来信中随机抽取的 837 封农民告状信中，有 277 封是状告非法占地的，占三分之一。状告对象 68.2% 为乡、县、市政府和土地部门。这说明土地问题已成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领导的土地部门已成侵犯农民利益和农民争夺土地的主体。因此，一些地方集体上访农民直接要求罢免市委书记、市长的人民代表的资格（如河北唐山市、秦皇岛市，福建福州市、宁德市）。全国各地上访案件中，土地问题也一直占很大比例。农民对乱占土地的不满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或群体事件的爆发点。

征用土地定价低、补偿少。补偿金分配极不合理。造成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甚至十分贫困。

确定补偿按三年产出平均值加上一定倍数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还应该考虑土地的类别、级别、区位、稀缺程度、供求关系、预期价值、潜在收益等多种因素。按现在的补贴标准，失地农民生活水平

都会下降，且没有再创业能力，未来生计会更难。国家统计局对 16 个省（区、市）调查证明，46% 的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连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也有 33% 的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调查，失地农民中 60% 生活困难，只有 10% 稍有改善。

实践证明现行补偿标准不足以补偿失地农民的损失，更不能保证失地农民有可持续生计。

由于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一直处于无权地位，连标准很低的补偿金也很难拿到。据多部门多渠道调查，土地补偿金分配结果一般是各级政府拿走 50—60%，村组拿走 30—45%，农民只得到 5—10%。江苏昆山、海门等地调查，被征土地补偿费农民得到的每亩只有 5000 元到 10000 元。

垄断的土地经营体制和高利润的诱惑使各级政府越来越倾心于打土地的主意。全国查出的大贪官也几乎都有插手经营土地的问题。

滥占土地之风之所以屡禁不止，与现行经营体制有直接关系。全国查出了那么多没有经过批准的开发区、大学城、高尔夫球场，没有一个不是经过当地政府和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或默许的。去年全国清理开发区虽有成效，但切不可估计过高。一是当时有些地方就是采取应付对策（如将几个开发区合并为一个，改为东区西区），



深圳拍卖土地使用权

二是过后又私自重搞。决定核减的1.7万平方公里土地,只复耕1100平方公里,仅占十五分之一。

在上一轮圈地风尚未完全刹住,新一轮圈地风又开始了。新一轮圈地风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开发商拼命储备土地。经过去年宏观调控,房地产开发商倍感土地重要,加之房地产开发平均利润高达50—60%的诱惑,境外资本和国内其它产业资本纷纷进入房地产业。他们一进来第一步就是抢占土地。《广州日报》2005年1月14日报道,广州市周围已有3万多亩土地被多家开发商圈占;二是建新城占地,有些乡镇、县和大中城市纷纷撇开老城建新城,还将建新城作为发展城市化的一条经验推广。

这里举几个利用土地谋得暴利的例子,这在全国是有代表性的,但例子中谋得的利益并不是最高的。

1、南方某市市政府国土部门征用农民土地每平方米10—30元,卖给开发商每平方米150—300元。

2、中部大省某市征用农民承包地每亩3万元,而农民实得不过1万元;市政府国土局卖给房地产商每亩10—30万元。

3、某城市2000年征地13平方公里,每亩给农民补偿3万元,卖出挂牌价每亩135万元,当地政府通过卖地已赚65亿元,正建四套班子的办公大楼。

改革现行土地经营体制和经营方法弊端的九条建议

实行市场化经营应是根本取向。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市场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加入WTO已经3年,应逐步全面开放土地市场。

1,照《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和国土部门可以作土地买卖经营,而现在实行的这种土地管理体制不仅对于严格管理土地的目标背道而驰,实际上是鼓励他们占用农地,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现在自买自卖土地的作法是违法的。因

此,国家各级政府土地管理部门都应退出土地经营市场,认真执行土地政策并对各方面涉及土地问题的行为进行检察监督,一律不准参与土地买卖。

2,建立土地拍卖公司等中介机构,土地供求双方通过中介机构沟通、协商。允许集体所有权的土地进入一级市场。

3,所有土地均通过土地市场挂牌、招标、投标,杜绝暗箱操作。

4,公益性用地和工业、交通、城建等其它用地同质同价。不能因为是公益性用地而让农民承担损失。

至于购置公益性用地的资金来源是主办单位的事。无非是没有资金就少建或暂时不建大广场、大马路、机关办公大楼和没有效益的工厂、饭店、风景名胜等政绩工程。

5,地价必须提高,要让土地资本化,并将安置失地农民作为前置原则,还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

6,占用土地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土地管理法规定,办理批准手续,不允许任何部门和个人越权批地。

7,让农民坐到谈判桌上,这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实现公平交易的关键。参与谈判的必须是真正的被征土地的农民代表。

8,为失地农民办理城镇户口和帮助安排就业,仍是必要条件,但不能以此降低补偿标准。允许失地农民以土地换户口、换就业、换社保。

9,补偿金分配应该透明。补偿金分配应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应大部分直接分给失地农民;二是各级扣留部分也应主要用于为失地农民服务的项目,如社会保障基金。要做到取之于被征土地,用之于失地农民,而不能挪作他用。

全国累计低价强制征用征收农民土地已达5000万亩,使农民损失3—4万亿元(对失地农民的损失专家学者有多种计算,最低估算为2万亿元,最高估算为7万亿元),失去土地农民达到了4000万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沦为困难群体。过去公社化时夺走农民土地的教训太深刻了,后果非常严重,我们应该永远记取。

(作者系原吉林省长、广东省委书记)

(责任编辑 杜晋)

顾准和李贽

● 吴远鹏



1965年，顾准摄于青龙桥至八达岭的崎岖山路上

想到要写“顾准和李贽”，是缘于我在读《顾准文稿》时发现里面有两篇文章写到李贽。曾有友人对于我想把顾准和李贽联系在一起感到不理解。确实，李贽是福建泉州人，顾准是上海人，两人生活的地域相距上千公里；李贽（1527—1602年）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生活的年代是16世纪；顾准（1915—1974年）则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自由主义者”，20世纪的中国之子。两人生活的

年代在时间上相差了三百多年，将他们进行比较评说，不免给人以牵强唐突之感。我在互联网上打上“顾准和李贽”进行搜索，却一下子跳出了六千多条搜索结果，随意浏览了一些文字，发现绝大部分是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在中国思想史上，顾准和李贽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说到明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的思想解放思潮就不能不提到李贽，顾准则是在20世纪中国极其严酷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知识分子独立精神进行思想探索的先驱，而能够在思想史上留下踪迹的无疑是属于凤毛麟角的。上海的朱学勤先生曾言：“中国历来有始皇焚书之传统，然而，也有李贽藏书之传统。小儒规规，视后者如畏途，闻之色变。唯有如顾准者，始终不认同官方价值，甚至不认同主流学术界之价值，方能续李贽作藏书之传统。”（《地狱里的思考》，原载《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书店1994版）我把这句话当作我这篇文章的一个极好的题注。

顾准关于李贽的两处记述

在《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这是目前搜集顾准的文章最为丰富的一个版本）中第一次写到李贽的文章是《要确立“科学和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这是顾准和其六弟陈敏之（顾准幼时过继给外家，从母姓）在1973年3月27日通信时写下的，篇名是陈敏之在编文集时加上的。这篇文章比较了作为工商业城邦文化产物的希腊思想和“史官文化”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差异，指出了“中国思想

是贫乏的”，中国文化的渊源和根据决定了“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

在记述了中国“史官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之后，顾准写道——

于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说的描写，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实在不甘心这一套桎梏，晚年入空门，狱中死前留语还自称老衲。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不入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

顾准第二次写到李贽是在《老子的“道”及其他》一文中，该文是顾准1973年12月在阅读了陈敏之的《关于老子的笔记》一文的述评，这篇文章在陈敏之所著的《我与顾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作为附录收录，改题



顾准（右）陈敏之兄弟相聚（摄于1974年）

为：《老子笔记读后感》。文中关于李贽的文字如下：

佛教与老庄合流，到宋以后更加凝固成为士大夫的这样一种传统——不为甄宝玉，就做贾宝玉。不是禄蠹，就去出家。甄士隐去，无非悟透“好了”，愤世嫉俗，只好称老衲（李卓吾）。这当然是个人主义。然而有一种个人主义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却]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的那种个人主义，中国不是没有，可是，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

我看，这件事庄子应该负责，老子也有责任。老庄以前殉道精神是有的，墨家。

当然，起了摧毁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秦始皇。

这一点，以前我的“笔记”中好像说过。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大声疾呼的根本问题。

上述两处记述，关于李贽的部分都是作为例证来征引的，可说是片言只语、零星着墨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准是懂得李贽的，对于李贽不满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思想的桎梏，反对因循守旧的“假道学”，冲破樊篱、遁入空门，顾准是清楚的、认可的、并报以同情的。上述征引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并深入研究的，其一是顾准认为李贽的“愤世嫉俗”、逃避王权专制主义、遁入空门，“这当然是个人主义”，这里的“个人主义”是指学理上的“个人主义”，可参阅刘军宁的《回归个人：重申个人主义》；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都将李贽最后在狱中自刎看作是反抗专制主义迫害的“最后一搏”，是“殉道者”，而顾准却并不这么看，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相隔三百多年的灼见真知

对李贽和顾准思想的了解和比较,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解读顾准对于李贽的评论。

李贽识见高超,著述丰厚,囊括了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宗教等门类,顾准学识渊博,对西方史事娴熟于胸。我愚顽不学,既乏国学根柢,又无西学渊藪,以下这些议论不免狂谬之极。

顾准和李贽都是立足现实、关怀现实的。他们的思索,都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李贽毫不妥协地批判“假道学”,是想让“真道学”大行其道,希望明王朝祛除积弊,恢复真正的纲常名教,针对“存灭”的说教,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的观点,他同情底层人民的苦难,他认为治国方略不可因循守旧,墨守陈规,“治贵适时”。顾准的思索紧紧围绕“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主题,针对中国的现实,如何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如何找到一条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道路,他明言“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的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他以极大的心力研究西方历史、希腊思想,正如有识者指出的,顾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其实所言全在中国”(林贤治:《读顾准》)。

在反对树立“绝对权威”问题上,顾准和李贽是相通的。生活在明王朝的李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崇孔子,但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当时是非的标准,否定千百年来尊孔若神的言论和思想,否定儒家经典,反对把孔学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也应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变化,主张儒、道、释三家兼容并学,广泛吸收,为己所用。顾准也主张打倒孔子这个偶像,严厉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这在20世纪60、70年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看待新的“绝对权威”问题上,顾准在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学说进行了深入缜密的比较和研究后,得出结论:没有什么人、什么方法可以发现绝对的、普遍的规律,真理只能是相对的,人的思维不可能具有至上性,没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李贽主张发展人的个性,提倡“童心说”,提出平等观,顾准推崇科学和民主。李贽主张发展人的个性和才能,认为童心即真心,“若失却童心,即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主张文学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写出表现“童心”的真文学。李贽在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社会里所提出的平等观,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极强的启蒙作用,针对“男尊女卑”的观念,李贽认为见识长短不能以男女而分,他反对“圣人有德,凡人无德”的观点,主张“圣人与凡人一”的圣凡平等思想,在君民关系上,他认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顾准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极端困境中独自在黑暗中掘进,他在详细考察论证了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的发生、发展历史后认为,民主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关于对待西方。李贽晚年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交往被人们看作是明代中外交流的一段佳话。利玛窦侨居中国三十年,曾先后在广东肇庆、江西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他的到来,在明朝上至宫廷、下至地方都引起很大震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在南京,一些儒家传统思想维护者组织文人聚会,与利玛窦进行哲学思想辩论,李贽在出席这些聚会时“始终保持沉默”,不像其他迂儒在会上扰攘不已,他认真倾听利玛窦的讲述,还赠送给他一把纸折扇,上面题有两首赠诗。之后,李贽又在山东济宁遇到利玛窦,两人交游甚笃。李贽尊重、认同并接受利玛窦的一部分西方知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顾准曾经下了“笨功夫”来研究西方思想和西方历史,“打算用十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他遗留下的尚未最后完成的一份笔记《希腊城邦制度》仅仅是他“十年研究计划”的开始,但是这样一份破题之作还没有完成他就病故了。顾准对西方学者著作的涉猎既广且深,他的研究囊括了

西方文明的起源、希腊城邦制度、希腊僭主政治、西方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基督教、海上文明与大陆文明、封建制、骑士精神、民主问题等方面。顾准曾坦言：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以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

“倒霉”的思想家

思想家没有不“倒霉”的，没有不身心深受磨难乃至赍志以殁的，这似乎是思想史上的一条法则。在历史的年轮前进了几百多年的历程中，顾准的思想较之李贽有了时代应有的进步。非常不幸的是，时代所赋予顾准的苦难，却也远远胜过李贽。

李贽明嘉靖六年（1527年）出生于泉州，6岁时就遭遇丧母之痛。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四年之后出任河南共城（今辉县市）教谕，开始为官生涯，时李贽30岁，之后担任过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万历八年（1580年）辞官归隐。在南京刑部任上，李贽就因与因循守旧的“假道学”格格不入，批判礼教，而与上司相抵触。万历九年（1581年）春，李贽到湖北黄安，寄居好友耿定理家中，每日讲书论道，甚为相得。三年之后，耿定理病逝，其兄耿定向与李贽的道学观点不合，将李贽比为异端，并发动门生群而攻之，两人成水火不能相容之势。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贽移居麻城县，后移居龙湖芝佛院并落发，“闭门下键”，每日读书著述。万历十八年（1590年）“假道学”者耿定向指使门人围攻李贽，从此李贽屡遭迫害，曾两度离开龙湖，出游于武昌、沁水、大同、北京、南京、济宁等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冬，“假道学”者勾结地方官吏，造出“僧尼宣淫”的谣言，掀起一股“逐游僧，毁淫寺”的恶浪，地方官以“维持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火烧龙湖芝佛院，拆毁李贽预建为己藏骨的塔屋，并下令搜捕他，李贽避入河南商城县黄檗山中（凑巧的是，整整360年后，顾准也落难到商城县劳改），后往通州，寄寓于好友马经纶处。直到最后被缉、下狱、屈死狱中。

顾准出身卑微，191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大

家庭，共有兄弟姊妹十人，在男孩中排行第五，年过半百的父亲在慈善机构联义善会任管事，每月只有微薄的薪酬，不足以养家糊口和供子女求学。1927年，家庭的贫困迫使年仅12岁、稚气未脱的顾准进入上海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新式学徒），赚钱养家。短短数年间，顾准在“立信”凭借自己的才智，勤奋自学，逐渐掌握会计学这门学科，1934年以后，顾准完成了《银行会计》等多部会计学著作，并在上海几处大学担任会计学兼职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在民族觉醒的推动下，顾准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34年初组织秘密团体“进社”，1935年加入共产党。他以“立信”职业为掩护，在职业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顾准先后担任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上海分会主席、共产党江苏省委职委书记、文委副书记，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苏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埠区财经处副处长，渤海行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长等职务，转战大江南北，经受惊涛骇浪，九死一生，是共产党在职业界的杰出领导人和解放区的理财高手。1949年5月，顾准随军回到解放的上海，担任上海军管会财政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工作繁重。但他竭尽所能，不遗余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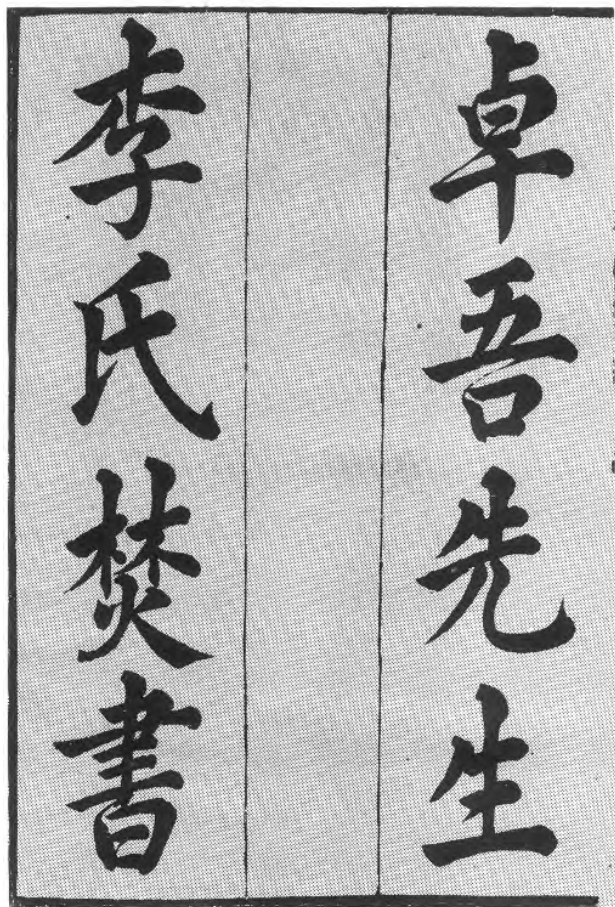
从1952年开始，顾准连遭厄运，先是在“三反”运动中因税收方法之争而戴上“恶劣分子”的帽子并遭撤职，调北京工作。1956年9月由建工部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不到两个月，又调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57年，因随中国科学院组团赴黑龙江勘察水利资源时，为维护我国主权利益而与苏联专家意见相左，第一次戴上“右派”的帽子，受到批判，开除出党，下放河北赞皇、河南商城、北京清河等地农村劳动改造。1959年在河南信阳专区商城县劳改，顾准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在短短数月间饿死了一百万人的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在铁佛寺水库劳动大队期间，顾准坠入了人间地狱，每天进行长达15—16小时、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要下到公共粪窖里去“清底”，要走村串乡四处去拾粪，成为“集中营里最臭、最卑贱的一个

人”还不时要遭受激烈的批斗、恐怖性的惩罚，受尽摧残和凌辱，直到1960年才回到北京，到院属清河饲养场养猪。1962年好不容易“摘掉”帽子并返经济研究所工作后，许多人都开始“夹起尾巴做人”，他却又在1964年经济所“四清”运动中被作为“孙冶方的幕后狗头军师”、“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而遭受批斗，一度曾萌生“自杀”的念头。1965年2月，又被秘密逮捕、“监护审查”了四个多月，9月再次戴上“右派”帽子，成为绝无仅有的二次戴帽的“右派”，又先后在北京周口店、大韩继、经济所劳动改造。

高健国先生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记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飙乍起之初顾准在大韩继曾经遭受的一场毒打——

9月1日，正是夏季的毒日头。红卫兵又把顾准单独抓来，拳腿交加地当众毒打了一顿，打得他满头满身都是伤。然而，他们却还觉得不过瘾，又抓起一块方形的建筑砖头，狠狠地朝顾准的脑门中央砸去，“砰”的一声，他的脑门顿时血流如注。谁知，头部开裂的顾准竟然笑了笑，却一声也不吭！红卫兵见顾准如此强硬，挥起几拳，又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使劲地拖过来，又拖过去，一边拖，一边踢，想尽种种办法进行折磨……仅仅穿着汗衫和单裤的顾准，被拖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渗透了黄土地，黄土又混合着他不断流淌出来的鲜血，在脸上和身上形成一团团杂色的血污……当红卫兵终于折磨够了，顾准已经奄奄一息，他挣扎着，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他用手把头上流淌下来的鲜血抹了一把，而后，仰脸朝天，“哧哧”一阵冷笑，滴着大串的鲜血，蹒跚地向前走去……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顾准所能经受的苦难已非笔墨所能尽述。1966年9月，顾准回到北京经济所，作为“黑帮”的他被造反派勒令打扫楼房通道和公共厕所，三天两头挨斗、陪斗，没完没了的写交待材料和外调材料，多次遭到残酷殴打，人人都可以唾他、骂他、打他，甚至为了解闷而惩罚他，苦不堪言。1969年11月，顾准在获知妻子汪璧于一年半前自杀身亡的消息后下放到河南信阳专区息县东岳人民公社学部“五七干校”，在劳改队每天干苦活，还成为“牛鬼蛇神”典型，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刻本《李氏焚书》封面

遭受残酷批斗，仅仅两个多月之后，顾准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患上可怕的肺炎，高烧不退，从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导致最后患上中心性肺癌。1972年7月，顾准返回北京，他抓紧这次喘息的机会，在断断续续的咯血、肺部疾病不断加重的情况下不停地读书、摘录、笔记、翻译，与同事兼朋友张纯音进行答辩式的学术对话，进行写作，直至1974年12月因患癌症而歿，在临终前才由“工宣队”在病床前宣布“右派摘帽”。

著名学者、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在谈论顾准时说：“思想家历来要倒些霉，但是苦难深重如顾准也真还罕见”，顾准“形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人，也可算达到苦难的极致了”。

李贽一生著作丰富。主要有《焚书》、《续焚书》、《藏书》、《说书》、《史纲评要》、《九正易因》、《续藏书》、《初潭集》、《解老》、《净土诀》等，虽则生前身后多次遭到权势者查禁焚

毁，但他在生前就看到自己的书刊刻流播，《焚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在麻城刊行，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藏书》在南京刊行，一时“海内是非之口纷如”。李贽还评点了许多戏曲，在明代刊行传世的至少就有七种之多。

相较而言，顾准则要不幸得多。顾准早年（20世纪30—40年代）曾经出版过多部会计学著作。进入新时期之后，依据收录顾准文章最为丰富的《顾准文稿》（2002年出版）的内容来看，在第一部分“经济学文稿”中，除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发表于1957年的《经济研究》上之外，其余7篇（含论文、发言稿、笔记等）均为首次发表；第二部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部分最早成书是1992年在香港以该名出版，1994年收入《顾准文集》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这些文稿是顾准在1973年至1974年应其弟陈敏之先生的要求而写下的一些笔记，并不是专为出版而写作的著作，这在当时如被他人看到，无疑会让他们兄弟俩罪加一等，身首异处的。当我现在认真研读这部分文稿时，仍时常感觉脊背上凉飕飕的，而这时离开顾准赍志以殁已经30年了，离开他的这些文稿在大陆首次面世也已经10年了；第三部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文笔记”则是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笔记，想必顾准生前也不敢指望它能够出版刊行。所幸的是，天心未泯。顾准这些用鲜血作墨水，不为出版而写、和尚未写完的笔记，终于能够“变成铅字”。1958年“下放”农村劳动之后，顾准结合读书写了大量的笔记和调查资料，在“文革”到来前夕的1965年，面对严酷的现实，为了避免给家庭带来新的不安和不幸，顾准忍痛自行“清理”了积存多年的手稿和笔记，他担心用火烧浓烟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只得用水沏的方法，将字纸浸泡在浴缸里，然后揉烂，最后再用抽水马桶一批批冲掉，好几次将抽水马桶的下水道堵塞，那些凝聚着他的思索和智慧的文字，就这样化为乌有、销毁殆尽了。在那个“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的历史时刻，顾准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写“交代材料”，这些“交代材料”数量繁多，以至2002年陈敏之和顾南九（顾准之子）将其收集起来编为《顾准自述》这部书，作为四卷本《顾准文存》的其中一

卷，这部《顾准自述》共收录了顾准所写的“交代材料”38篇，总字数竟达到33万字。

家庭的不幸，无疑加重了思想家的苦难

李贽早年（6岁时）丧母，备尝人生之一大不幸。成年之后，李贽与妻黄氏共生四男三女，却只有长女存活下来，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北京国子监博士任上，次男夭逝，不久祖父去世，李贽将妻黄氏与两个女儿安置在共城县，买数亩田让她们耕作自食，自己一身回泉州奔丧，适逢共城大荒，其次女、三女相断病逝，李贽连遭丧儿之痛。万历十五年（1587年），为了与假道学抗争到底，李贽令女儿、女婿送妻黄氏回泉州，他只身留在黄安县。翌年，妻子病逝，他不返泉州，只嘱咐女婿料理丧事。至此，李贽于家庭已是了无牵挂。

顾准幼时家境贫寒，1933年，与顾准感情甚笃的二姐（年仅20岁）因肺病久治不愈而去世，顾准觉得二姐是因家庭窘困劳累过度而早逝的，十分悲伤，他初尝丧亲之痛。1934年，顾准和立信会计夜校的女学生、之后成为“进社”第一个女社员的汪璧结婚，1937年的前后两三年中，顾准曾经有过两个男孩子，都在不满两周岁时夭折了。之后一直到解放初，顾准和汪璧一共生养了5个孩子，二女三男。1952年之后，厄运接踵而至。1965年顾准第二次戴上“右派”的帽子后，不得不做出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决定：同意与结婚三十多年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且两情相笃的妻子“协议离婚”（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从家中搬了出来，几个孩子也宣布和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并将其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转到经济所。此后顾准就再也没有能够踏进家门一步，有几次回家取东西都是家里人事先把东西放在门外，坚不开门，而妻子汪璧最后又在1968年自杀身亡，几个孩子到1974年他病重、病危、病殁都不愿来看他一眼（即便如此，他却一直对家庭和子女怀有歉疚心情，认为自己害了他们，在临终前“不惜牺牲自己最珍贵、甚至曾以生命捍卫的名誉和尊严”，内心万分痛苦地做了一个他自称是“奇耻大辱”的举动：在一份摘帽认错书上签字，以

期能够最后见到子女及改善子女的处境)，“恩断义绝，一至于此”！而顾准年近九旬的老母亲此时住在顾准的妹妹家中，与顾准同处一城，知道爱子垂危，坚欲和他相见，顾准的妹夫此时身处公安部代部长的“要职”，为避免给他带来“麻烦”，又因母亲年高，深恐此时相见发生意外，顾准因而不得不忍受着咫尺天涯不得一见的极端痛楚的折磨，最后抱恨终天，真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作为一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要想让他停止思想，除非从肉体上消灭他，对于李贽和顾准，当时的权势者都做到了这一点。

万历三十年(1602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疏劾李贽“惑乱人心”，明神宗朱翊钧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令厂卫王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列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李贽在狱中得知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感叹道：“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愤而以剃刀自刎，时在夏历三月十五日，两天气绝。李贽这落幕的一出极其独特，就像他不落凡俗的精神世界，与其作为“思想家”的身份极其相称。两天刚好，一日不异于常人，三日则有悖于常理。

1973年七八月间，孑然一身的顾准肺病陡然加重了，连续多日一直咯血，以至不能正常起卧，到医院检查时，对这样一个打入另册的“阶级敌人”，医院只是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说是支气管扩张，开了点止血药就打发他回去了。这实际上是顾准癌症进入晚期的明显症状，但他却只能像过去一样希望能在无奈中挨过灾难。随着病情的日益加重，顾准决心与病魔抢夺时间、抗争到底，他每天一大早便揣着几个冷馒头、一个装开水的旧酱菜瓶，独自前往北京图书馆，全身心地投入阅读和写作中，一坐就是一整天，中午就以自带的冷食充饥，每当癌症病痛发作时，他使用桌角顶住病灶，虽然浑身大汗淋漓，也手不释卷、笔不离纸。在这期间，因持续性的咯血和低烧，身体极度虚弱，他不得不去医院输血、补液，

并强迫自己戒烟，但并没有将手头的工作停下来。1974年10月中下旬，顾准的晚期肺癌总爆发了，出现了可怕的大吐血，他要求医院对他进一步检查，个别“阶级觉悟很高”的医生反而板起脸来训斥他罗嗦。顾准卧床不起后，患难与共的朋友骆耕漠、张纯音、林里夫、吴敬琏、赵人伟、陈易等不避嫌疑对他进行照料、护理和陪夜。11月2日，在顾准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所在单位经济所的组织 and 领导才出面将顾准送进反帝医院(协和医院)，但因他是“牛鬼蛇神”，住不进病房，只能在走廊上的临时观察室苦熬，后经好友骆耕漠多方求援，院方才于11月7日破例收顾准住院治疗，但为时晚矣，仅仅二十多天后，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历尽劫难的思想家顾准含冤而逝。

写在最后

三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对于李贽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在经历了“时而目为悖逆，时而赞为英雄，时而寂然无闻，时而声名啧啧”后，开始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应该充分认识李贽思想对君主社会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的重大挑战和内在冲击，但也不宜有“过分夸大李贽反传统的说法”，毕竟以现在看来，李贽的思想“并没有超出传统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边界”(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三十年过去了，人们对于顾准价值的认识正在不断广泛和深化，虽然这种广度和深度还远远没有达到我认为应该达到的程度。已故的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先生认为：“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且不说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因此，顾准更需要人们深入研究和认识。

每想起顾准和李贽，我总是痛心不已。他们如果能安乐和美地过完他们的一生，那该多好，哪怕他们没有什么思想遗存后世。什么时候，在我们这片国土上，思想家不再受磨难，不惟思想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发展”，而不再经受磨难？！这一天会到来的！

(责任编辑 李晨)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

● 马京生 王建蒙



孙家栋夫妇

孙家栋小传：

中国航天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他曾担任过东方红卫星等多种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并担任过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曾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中青年科学家，荣获一等功、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

在第五届珠海航展上，耸立着探月工程雕塑和“嫦娥一号”卫星模型，引起了众人的关注，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中华民族在把航天员送上太空之后，又拉开了探月的序幕。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孙家栋比谁心里都清楚这副担子的重量。2004年2月探月工程正式由国家批准立项，“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将在未来两年内，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如何让“嫦娥一号”进入月球轨道，接受地面控制指令，回馈资讯，是中国航天领域的新课题。6套24件有效载荷一年内将完成四大科学任务，月球探测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和地面应用等五大系统工程目前进展顺利。可孙家栋深知，嫦娥舒袖神话浪漫，卫星探月道路艰辛。这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75岁高龄的孙家栋，焕发了青春，像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每天忙得不着家。他深邃的目光已经瞄准了两年内中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绕月飞行和之后发射月球车的远大目标。

挂上斯大林金质奖章

1951年9月，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年后，在学院大门最显眼的“状元榜”上出现了孙家栋的照片。原来，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每年把年终考试获得全优5分的学生照片放入金字塔形的“状元榜”，如果年年都能连续保持，他的照片便会一年比一年大，一年往上挪一次。然而，随着照片越来越大，数量也将越来越少，等到顶尖级的照片所剩无几之时，也就到了学生毕业的时候。此时，与众不同的是名列榜首的“状元”，将会获得一枚纯金质的斯大林头像奖章。这枚奖章对苏联学生来讲可以说是梦寐以求，因为毕业时获得这种奖章的毕业生，不仅可以比普通学生的军衔高套一级，而且还可以优先选择自己满意的工作，并带双份工资享受3个月的休假。五年后，孙家栋获得

了那枚人人羡慕的纯金奖章，这在当时中国留学生中屈指可数。

钱学森点将搞起了卫星

1958年4月，孙家栋在隆隆的火车轰鸣声中，谢绝了众多的挽留，归心似箭地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征途。因为就在这一年，苏联送给中国两枚P-2近程导弹。历史的戏剧性在于200年前，康熙皇帝送给俄国沙皇两箱中国的古代火箭，200年后，苏联又回赠了两枚“现代火箭”，而留苏学生孙家栋的命运，就和这两枚导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回国后，孙家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即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孙家栋学的是飞行器发动机技术，他被安排到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他因思路敏捷的才智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程战略导弹的总体主任设计师，并且挑起了导弹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研究室主任的重任。之后，孙家栋又升任为总体设计部副主任。

孙家栋从毕业后就搞导弹研制，心想这辈子就情结导弹了。可是人生之路冷不丁来了个急转弯，他的智慧和能力引起钱学森的注意，钱老亲自点将，由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他没想到自己搞了近10年的导弹，又与卫星结下了不解之缘。

周总理说：“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很好嘛！”

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设计师。此时正是“文革”期间，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孙家栋，从水火不容的两派中智挑“航天卫星十八勇士”，这18个人专业技术特长搭配合理，名单报给钱学森，钱学森点头赞同。两派群众高举彩旗，敲锣打鼓，共同欢送他们走马上任。孙家栋作为卫星技术总体负责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进展情况时，周总理夸他说：“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就是卫星专家，很好嘛！”

此时，孙家栋的大脑正困扰着一个难题，卫星许多仪器上镶嵌着毛主席金属像章。这在当时可不是一般的小问题，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三忠于、四无限”的个人崇拜把人们的情绪推向了极端，稍有不慎便会被造反派无限上纲。发表不同意见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孙家栋看到周总理和蔼可亲的笑容，下定决心把萦绕在

心头多时而又无法解决的难题吐露了出来：“总理，目前卫星的初样试验已经基本完成，可是正样卫星的许多仪器上都镶嵌有毛主席的金属像章，我们非常理解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但安装紧凑的卫星仪器会由于毛主席像章而导致局部发热，还会涉及重量分配使卫星在空中运行的姿态受到影响，另外也将使卫星的整星重量增加，使火箭的运载余量变小。”

周总理认真地听完了孙家栋条理清晰的汇报，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大家都是搞科学的，搞科学首先应当尊重科学。比如说人民大会堂也不是到处都挂有毛主席像。所以，卫星仪器上的毛主席像章应该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来处理，只要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就不会有问题。”周总理的话使孙家栋豁然开朗，悬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为了卫星和老伴巧遇医院

1994年11月24日，作为我国第一颗大容量通信卫星总工程师的孙家栋，已经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忙了很长一段时间。此时火箭、卫星都已测试完毕，发射场的各项工作都已就绪，卫星发射恰好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

偏偏这时，夫人魏素萍患了脑血栓，病情严重，医院立即对她进行了全力以赴的紧张抢救和治疗。消息当天便传到了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西昌发射场，几乎试验队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唯独孙家栋不知道，同事们向他保密是一个方面，而此时他的脑子里装的全是卫星，他要在发射前夕把所有技术问题再回顾一遍，一定要保证对卫星火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上天前都能清零，做到万无一失。一周后，卫星被成功地送入太空。

这时的孙家栋马不停蹄，立即赶回北京主持与美国航天代表团的谈判，会谈文件签字后他便累倒了，同志们用担架把他直接抬进了附近的医院。

巧的是，老伴魏素萍就和他住在同一所医院里，只是两个互相思念的人谁也不知道对方在住院。后来，医生把老两口安排到了同一间病房，直到这时繁忙的孙家栋和老伴魏素萍才彼此有了照应，共同享受病房的温馨。

弹指一挥间，这对老夫妻从一见钟情到相伴变老，爱情不仅使他们战胜疾病，而且促使他们事业有成。魏素萍是个好医生，也是家里的好后勤，她无怨无悔地支持着孙家栋。孙家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要亲手将中国“嫦娥奔月”的神话变成美好的现实。

（责任编辑 李 晨）

我和“洋特务”李敦白

● 杨兆麟

有一位美国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时期，热情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35年。期间，两次蒙冤入狱，在铁窗中苦苦煎熬了16年多，只享受了19年的自由。获释回到美国之后，由于他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深刻了解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因而致力于发展中美贸易，耄耋之年仍不辞辛苦，万里之遥，飞来飞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尽心尽力。他坦诚地对朋友说：“回顾过去，当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不过，我对那些年代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直到今天，我依然能从那可怖的逆境中汲取内在的力量。再说啦，后悔又有什么用啊！”

这位美国人，取了个中国名字，一度加入中国国籍，并且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和一位中国姑娘结为终生伴侣，生儿育女，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名叫李敦白，夫人名叫王玉琳，他们俩都是我多年的好友。

1947年3月初，我随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由于我原来在新华社南京分社工作，因而被接到清凉山上的新华社总社当编辑。我时常看到一个“大鼻子”，年龄比我也就大两三岁，中等个儿，戴一副近视眼镜，和所有的人一样，穿一身灰色的棉布军装。有人告诉我，他是个美国人，名叫李敦白，是新华社总社的英语专家。

不久，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新华社全体人员撤退。先到瓦窑堡（即子长县），然后东渡黄河，攀越层峦叠嶂的高山，踏过一望无际的平原，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在长途行军当中，大家

迈开双腿，日夜兼程。我经常和李敦白结伴而行，并肩前进，和他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成为风雨同舟的战友。他为人随和，性格开朗，谈吐幽默，爱开玩笑。他不仅中国话说得好，比有些一嘴“广东官话”的中国人还标准，而且说起《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一套又一套的，使我非常惊讶和叹服。我怀着好奇心问他：在哪里学的中国话，怎么到延安来的？他打开“话匣子”，说起了有趣而又不平凡的经历。

原来，李敦白到中国来有很大的偶然性。他的家乡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英文姓名是Sidney Rittenberg到中国以后，有一位朋友给他译成李敦白。前后两个字是中国的“诗仙”李白，中间一个字的意思是“敦厚”。不仅符合发音，而且完全“中国化”，熟人都叫他“老李”。青年时期，他从一个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革命者，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40年，21岁的李敦白应征入伍。根据美国的有关规定，他入伍以后脱离了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军队调他去学习日文。他想，将来日本肯定会战败，美军可能长期驻在那里。而中国是美国的盟国，胜利以后，自己可以很快回国，致力于建设美国的新社会。因此，他要求去学习中文，得到同意。他哪里会料到，这“一念之差”，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李敦白被调到斯坦福大学去学习中文，老师中包括张学良的女儿张闾瑛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他努力学习中文，讲中国话，包括不少成语，领悟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看上去像图画一般的优美，简直入了迷。同时，初步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红军长征的可

歌可泣的故事和一些革命领袖的非凡经历。他渴望到中国去,和中国人民交朋友,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1945年夏天,李敦白随美军到达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被分配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这使他有很多机会接触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渐渐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学好中文,他经常在街头购买中国报纸,这位没有了党籍的美共党员,自然喜欢阅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日子一长,那位报童和他熟悉了,悄悄地对他说:“你想不想去见见编这份报的人?”报童大概事前得到了领导的批准。李敦白喜出望外,就随报童去见了一位地下党员。见了几次以后,地下工作者了解了他的经历,就慢慢向他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同时,他利用美军的身份,几次开着美军的吉普车,把上了“黑名单”的地下工作者送到郊外,使他们脱离了险境。

1945年11月,正如他的预料,美军准备复员回国了。可是他改变初衷,想留在中国,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他的申请获得批准,被派到上海的美军司令部去工作。经昆明地下党的介绍,他和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不久又认识了宋庆龄、何香凝、陶行知等人。宋庆龄介绍他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当“观察员”,任务是把粮食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他非常高兴,从此脱离了美国军队。

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粮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救济总署的官员在行前对李敦白说:“你去了以后,要注意收集共产党的情报。”他感到疑惑,默然不语。他到达中原解放区的首府宣化店的时候,中共代表周恩来正在和国民党代表、美军代表在那里进行“和平调处”。他非常尊敬周恩来,想找机会和周恩来谈话,可是周恩来非常忙,在离开宣化店之前对李敦白说:“以后有机会到南京去见面吧。”美国的那位将军把李敦白当成“自己人”,在厕所里毫

不隐讳地警告他,不要在此久留:“政府(指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占有优势,我们让他们把共产党军队消灭。”一句话,让他看透了美国政策的本质。当天,他就把美国军官的话转告给李先念:“我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而且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商量,只能当机立断,向你报告。”李先念感到他是真诚的,向他表示感谢,笑了笑说:“好啊,你算什么美国观察员,把情报泄露给我们。”实际上,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回到上海以后,李敦白辞职回国,不再替美国政府干那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勾当。他去向宋庆龄辞行,宋庆龄建议他回国以前去拜访周恩来。于是,他从上海到了南京的梅园新村。周恩来向他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和解放战争的发展前途,建议他到延安去参观,访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便回到美国以后,正确地宣传中国的情况。周恩来介绍他到北平,由叶剑英安排他去延安,这完全符合他的愿望。到了北平以后,由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叶剑英协助他先到张家口,再转往延安。他在张家口拜访了聂荣臻,看到了当地的新气象。聂荣臻请他协助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他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从此和广播工作结缘。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之前,聂



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李敦白,并为他题词

荣臻派人护送他前往延安。经过一个半月的行军,他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担任新华社总社的英语专家,安下心来,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成为当时唯一的美裔共产党员。

没过几天,斯特朗再次到延安采访。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访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他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个人合作撰写、著述。

二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新华社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在该地工作了大约一年。在此期间,李敦白协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1948年5月间,新华社又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的几个村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9年初,我好几天没有见到李敦白,他神秘地消失了。后来听说,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斯特朗是个“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置了一个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我左思右想,难以置信。在昆明解救地下工作者,在中原解放区向李先念提供情报,又是经过特殊批准的中共党员,怎么会成为“美国间谍”呢?但是当时正处在战争环境,斗争很复杂,谁也不敢议论,更不能探听个究竟。何况,当时我们对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毫不知情呢。

1949年1月31日,我随解放军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工作(后改为北京台和中央台),属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领导。斯大林在1953年逝世以后,苏联平反了斯特朗的冤案,李敦白自然也被释放了。1955年“五一节”以后不久,李敦白出现在电台的办公室。

有一天晚上,李敦白看在老朋友的“面子”,私下告诉了我那些年的经历。1949年1月21日,有人通知李敦白,派他“到北平去执行特殊任务”。他天真地想: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可能是去当翻译,执行有关中美关系的任务。可是,他被带到另外一个村子,有人指控他“接受美帝

国主义的指示,破坏中国的革命”。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仔细回想了到中国以后的全部经历,包括和斯特朗的关系,再三申辩:“我和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间谍。我这么热爱中国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你们为什么把我当成敌人呢?我所说的一切,你们都不信。你们要我承认的,我又没有干过,那怎么办呢?这一定是个可怕的错误。”他先被关押在北平郊区,以后转移到北平第二监狱。他苦恼、困惑、焦躁、失望,每天在牢房里来回踱步,度日如年。允许他读书、看报了,日子才好过一些。他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等等。他当然没有听说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继续蒙在鼓里。

1955年4月4日,有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向他宣布:“你是一个好人,你被监禁是错误的。”并且再三向他道歉。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身体和精神状况有了好转,他就上班了。他第一次身陷囹圄,在监狱里囚禁了六年三个月零两天。

三

李敦白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很特殊,颇有些“卓尔不群”的样子。他上班以后不久,就恢复了党籍,这个“大鼻子”是英语组唯一的党员。他经常向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温济泽汇报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广播事业管理处改为局),到总编室去看文件,和在总编室工作的王玉琳经常接触。有一天,我在走廊里遇到老温,他看看左右无人,小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李敦白正在向王玉琳发动猛烈的进攻。”我告诉他:“我也看出来了,这种事瞒不过人们的耳目。而且他的鼻子大,更会引人注意了。”

温济泽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明朗以后,把李敦白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你是不是对王玉琳有意思呀?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正准备派她出国学习技术。你们美国人爱写情书,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你可别给她写情书。”哪知道,李敦白本来没有这个打算,老温的“警告”倒提醒了他,当天晚上就写了一封向王玉琳求婚

的信,偷偷放到了她的办公桌上。第二天上午,王玉琳走进李敦白的办公室,表情严肃地在桌子上放了一张纸,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李敦白全身凉了半截,连头都不敢抬,仔细看那张纸:“李敦白同志,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所提出的那种相互关系,既然你有了这种想法,我们只好停止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妙在下面还有一句“又启”:“我昨天答应你,今天下班以后,一同去逛中山公园,我当然要遵守诺言。”李敦白满肚子疑惑,又喜出望外,不知道她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那天下班以后,他们二人去逛公园,李敦白的心咚咚地直跳,还是鼓起勇气,再次向王玉琳求婚,好像等待“判决”,而“法官”却宣布他“无罪”,王玉琳竟然同意了。1956年2月,在中国的春节“双喜临门”,他们结婚了。这一段美妙的趣闻,是李敦白在婚后向我“坦白”的。我对他们夫妇说:“王玉琳的那张条子,前半段分明是虚晃一枪,后半段又含而不露,堪称奇文,奇文!”朴实憨厚的王玉琳抿着嘴微笑,默认了。他们把这份“文件”珍藏起来,可惜的是,被无情地毁于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的可悲岁月。

他们婚后的生活是美满幸福的,李敦白勤勤恳恳地工作,王玉琳到第二外国语学院去学习英语。由于李敦白是中共党员,他在北京的各国专家中起着应有的作用,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

1958年9月,斯特朗来到北京,周恩来为她举行欢迎宴会。李敦白、王玉琳应邀作陪。周恩来诚恳地说:“伤害了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错误。”

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在北京的外国朋友,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当你在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轰炸了。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就让你走了。如果你留在延安,就不会当做间谍在莫斯科被捕了。”毛泽东又朝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里,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向他们当面道歉,承认了错误,使他们感到很大安慰。斯特朗在北京住下来以后,采访、编辑、出版了一份《中国通讯》,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毛泽东要求李敦白组织在北京的一些外国朋友,把《中国通讯》译成各国文字,发行到

世界各地。

1965年11月,李敦白、王玉琳和斯特朗、爱泼斯坦、艾德勒、路易·艾黎、万徒勒里、马海德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应毛泽东之邀,乘飞机前往上海,出席在锦江俱乐部举行的午宴,毛泽东为斯特朗祝酒。当天晚上,周恩来又宴请各国朋友,庆祝斯特朗80华诞。席间,一个合唱团演唱《长征组歌》。突然,周恩来站了起来,厉声质问那位指挥:“爬雪山的那一节为什么不唱?”指挥低着头说:“我们不会。”周恩来生气了:“那是萧华同志写的词,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不能指挥,我来指挥。”他走到合唱团的面前,以嘹亮的男中音领唱,指挥合唱团唱完了这一节。所有在场的外国朋友目睹了这一幕情景,都产生了疑问,合唱团的指挥为什么谎称不会?一部完整的大合唱怎么能缺了一节?周恩来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他们无法料到,一场暴风雨即将席卷神州大地,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前奏信号。

四

1966年5月底,正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李敦白和一些外国专家先到河南省兰考县,实地学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然后到了他阔别19年的延安。当天晚上,他们听到了北京的广播,《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批判学校领导的“修正主义”,他感到十分震惊。根据他在中国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的这项报道,大概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表的。他崇敬毛泽东,相信《人民日报》,深思着:“党内有些领导人正在欺骗我们,应该把他们清除出去。”虽然他弄不清楚,中国人民怎么会面临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刘少奇语)斗争呢?这不是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吗?但是,他的头脑开始“发热”,渴望赶快投入这场“大革命”。

回到北京以后,广播局的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李敦白按捺不住胸中的“激情”,贴出大字报,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示要和“造反派”们并肩战斗。于是,“向李敦白学习”、“李敦白是干部的好榜样”等大标语出现在院子里,他成

了广播局的风云人物。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他登台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老家的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中工作,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常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工人的生活是多么痛苦。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的这番“现身说法”,得到在场人们的信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当时还没有被“揪”出来,是在场的听众之一,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也很生动。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李敦白得到一次特殊的荣誉。以前,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上观礼,而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六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李敦白受宠若惊。快到12点的时候,他们六人被邀请分别同毛泽东合影。他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主席”,心中有如“高山仰止”。毛泽东用英语说“Ri-tten-berg”。他掏出了“红宝书”,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接过李敦白递给他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李敦白回到机关以后,人们都拥了过来,说:“老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啦,还和毛主席握手了呢。你洗手了没有?”他说:“没有洗。”于是,“大家抢着和我握手。办公室外面有40多个人排队,一个一个地和我握手。因为毛泽东已经好像一尊神,人人想沾上一点仙气。”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国际主义战士李敦白”的大名传遍了全国。他在走廊上向我描述了前一天的种种细节,口气中充满了兴奋和自豪。我当时属于“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一类人,觉得他的头脑有些膨胀。

此后,除了广播局以外,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人们排着队请他在“红宝书”上签名。但是,他亲眼目睹许多老朋友、老领导都被批判、斗争,甚至受到粗暴、野蛮的虐待,率真、善良的他陷入了迷惑之中。号称“文化”的“大革命”,为什么如此的残酷呢?

当时的广播局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非常激烈和复杂。李敦白主张通过民主讨论,消除分歧,实现大联合、大团结。但是,双方总是谈不拢,“中央文革”要求他们“整风”。

双方还是各持己见,于是,出现了中间状态的“整风派”。1967年2月,广播局成立了一个由“整风派”人员构成的“三人小组”,大家推选有很高声望的李敦白当“一把手”。他有条件地接受了。实际的领导工作由另一个人负责,公开的场合可以由他出面,他说:“不管怎样,广播局不能由一个外国人负责呀。”北京的一些外国朋友也劝他:“你不要太积极,别忘了你的鼻子比中国人的大。”他的脑子多少有些清醒了。

李敦白的这种“风头正健”充满豪情壮志的日子,只维持了六个月。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广播局,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并且通知李敦白,“离开广播局,有特殊任务”。当时,李敦白还抱有幻想,以为会“有什么重要工作”呢。等到9月底,他没有收到国庆节观礼的请柬,他“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不久,他又看到英文的《北京周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会见外宾和群众组织代表的照片,斯特朗等人都赫然在目,而他所在的那个位置却变成了一片黑。他知道,没有“上面”指示,谁也不会斗胆把有“伟大领袖”在场的照片动这种“外科手术”,自己准定“出问题”了。广播局实行军管以后,李敦白和王玉琳的工作证都被收走,并且加以软禁。后来他才知道,江青说:“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可是,当初把他扶到台上加以利用的,也是那个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青。

1968年2月21日那个零下13度的严寒夜晚,李敦白再次锒铛入狱,被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的监牢中。他想:“我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闹革命,稀里糊涂地干了半年,结果闹到牢房里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啊。”“美国特务的老婆”王玉琳对夫妻感情是忠贞不渝的,她对子女们讲述爸爸的经历,必须坚信爸爸是好人,绝对不是“特务”。在秦城,李敦白多次被审问,有一次问他和王光美是什么关系?他说:“我在北京的军调部拜访叶剑英的时候,她也在场。后来在延安重逢,当时她和刘少奇还没有结婚呢。有一天,她请我吃回锅肉。过了几天,我又请她吃回锅肉。当时在延安,吃一碗回锅肉算是丰盛的菜肴了。”那个审问的人说:“你们两个人来回的这么回锅,是什么问题?”李敦白心中暗笑:“你这

小子大概连回锅肉也没吃过。”这分明是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和第一次被捕一样,他每天除了短时间的“放风”以外,在单人牢房里来回踱步,还记着数,以保持体力,毫不怀疑自己一定又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犯人”们可以看《人民日报》,他每天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以消磨难耐的寂寞时光,而特别关注政治动态。1976年是一个令人十分悲痛的年份,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他发现关于“文革”的消息不见了,江青的名字消失了。忽然从高高的狱墙外面传来悠扬的音乐,人群在欢呼、歌唱,完全不是“八亿人只会唱八个样板戏”的气氛和情绪。到了晚上,绚丽的焰火绽放在田野的上空。他有一天忽然听到一个妇女在院子里大喊大骂,声音又高又尖,是他熟悉的江青的声音。他想:“江青进来了,我该出去了。”果不出所料,1977年11月19日,经过9年8个月零1天,李敦白被释放出狱。公安部为他彻底平反,王玉琳和子女也解除了隔离。李敦白回到宿舍,一家大小既喜又悲,珠泪涟涟。由于被长期单人监禁,李敦白连话都说不连贯了,慢慢地学习、锻炼,才恢复正常。

五

1993年,我到美国西雅图市去看儿子。我原来听说,李敦白、王玉琳住在波士顿,准备有机会去看望老友。我向一位朋友打听他们的电话号码,多年不见了,先问候几句。那位朋友告诉我,他们夫妇就住在西雅图市以东的伍丁维尔镇。我打通了电话,是老李接的,还是那么爱开玩笑:“你怎么神出鬼没的,跑到美国来了?”

“美国难道只许你来,不许我来吗?”

“哪里敢啊,非常想和你见面,欢迎到舍下来,令

蓬荜生辉。”

一天晚上,儿子开着车,陪我和老伴杜婉华去他们家。老友们一见面,又是拍肩膀,又是拥抱,互相仔细端详,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落座以后,李敦白说:“我料定你来美国,一定会找我。”

“那当然啦,老朋友嘛。”

“没错儿,可是还有一个原因。”

“你还是我的英语会话老师呢,我以前每次到你们家去,进门就不许说中国话了。”

“对,不过那不是主要的。”

“还有什么?尊夫人王玉琳和杜婉华也是老朋友啊!”“哎呀,想不出来了。”

“你这个人,真成问题,我是美国特务,你是中国特务,能不找我接头吗?”

我开怀大笑,说道:“你有所不知啊,我只是特嫌,比特务的资格低一等。”

李敦白说:“我怎么不知道啊?”

“那时候你已经到你应该去的地方了(‘文革’语言,指被捕入狱)。有一天半夜,造反派们来抄家,命令我老老实实站在旁边。他们把被子、

褥子的棉花心都掏出来;把墙上的镜框摘下来,打碎了玻璃;甚至把柜子里的书都拿出来,一本一本本地翻开,扔得满地都是;还把桌子的抽屉拉开,拿走了所有的笔记本。我又气愤又可笑:我要真是特务,有什么证件、情报能藏在这些地方吗?你们这些人真是太愚蠢了。过了几天,大概是他们查看了所有的笔记本,一无所获,可是又不甘心,只好给我戴上一顶特嫌的帽子。”

我关切地询问李敦白在秦城监狱的情况和他们回美国以后的生活。

李敦白谈起往事,虽然感慨万端,可是像讲故事一样,有说有笑,并没有



李敦白夫妇

流露多少悔恨之情。对于人生的苦难,对于尘世的烦恼,他是顽强、乐观的。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和王玉琳用“补发审查期间的工资”(平反文件的语言),乘机回到美国。到了故乡,借住在他姐姐的家中。王玉琳纺织毛衣出售,还教授中文和中国菜的烹调,李敦白到学校教课,勉强维持生活。不久,三个“千金”和一个儿子也先后到美国,找到了工作,生活有所改善。他们夫妇不想无谓地虚度时光,他们商量好,“要换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

机会终于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到中国去拍电影,找李敦白帮忙当翻译。他在各地为公司办成了不少事,例如在南京,公司要拍一个儿童剧团的节目。剧团要价很高,双方达不成协议。老李对剧团的负责人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美国的三大广播公司之一,他们的《星期天60分钟》节目有大量的观众。他们一播出,你们不是在美国就出名了吗?剧团负责人想明白了。结果,一分钱都没花,就把片子拍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很满意,回国以后,让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在《星期天60分钟》节目中播出。于是,他在美国成为“名人”了。不少美国公司找他们咨询或者当顾问,开展中美贸易。英特尔电脑公司正准备接待一个中国代表团,可是公司里没有人会说中国话,老板来访问他们,王玉琳“出马”,帮助他们谈成了价值20万美元的电脑生意。几次的成功以后,他们想:应该自己成立一个公司,我们做诚实的工作,和诚实的人打交道,免得被腐败分子欺骗。

他们带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几张桌子上摆着打字机、复印机、传真机、电话等,书架上和地上放满了各种文件、资料 and 纸张,房间不大,也显得很零乱。老李拿出两张名片,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印着“李敦白有限公司”。他说:“这里就是我们伟大的公司,不过是有限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是总经理,她是副总经理。”老板娘发话了:“去你的吧,要不是我管财务,只让你自己干,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准是一笔糊涂账。”老李摸着妻子的手,“嘿、嘿、嘿”地笑,承认了“二把手”的功劳。我早就知道老李是位社会活动家,可是在理财方面和“马大哈”差不了多少。

我说:“反正是个夫妻店,谁是一把手,谁是二把手,本来就分不清楚。我赞成你们的人生哲学,我们都是政治运动的幸存者,身体都还不错。尽力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问心无愧就行了。”

为了公司的业务,他们从美国的东部搬到了西部,经常到中国开展业务活动。自从我们在美国见面以后,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每次到了北京,总要约会欢谈。

2003年,我们又到美国去,参加儿子的婚礼。这时候,李敦白、王玉琳的大女儿已经在西雅图远郊的一个名叫“狐狸岛”(Fox Island)的海湾之滨,替他们买了一座别墅,距离她的工作地点只有10分钟的车程,以便就近照顾父母。

我打通了电话,听出是老李的声音,我说:“你这只住在狐狸岛上的老狐狸。”

他说:“你会和狐狸说话吗?欢迎你们到我们的窝里来玩玩。”

我们约定在儿媳的节假日,开车前往。当时只有李敦白一个人在家,坐到沙发上互相询问别后的情况。没过几分钟,王玉琳和大女儿回来了。王玉琳给我们端过几杯热茶,就和女儿去做饭了。她们准备的是一顿“中西合璧”的午餐。先吃炸酱面,后吃甜点。饭后,我们一同参观了他们的“狐狸窝”。他们这个“伟大的公司”真是“鸟枪换炮”了。办公室很宽敞,各种现代化的设备都有条有理。另外有一间健身房,摆着几样健身器材。房间面对着一片不很大的海湾,碧波粼粼。房后是一片花园,他们经常除草、施肥、剪枝,可以修身养性,好像聆听一首田园牧歌。

2004年春天,李敦白、王玉琳再次来到北京,请我们二老吃饭。在座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儿媳,儿子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老李比我大两岁,已是83岁高龄,往返长途飞行,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特地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办事处,顺便“子承父业”。我深深了解他们老两口,性格爽朗,对什么问题都能想得开、放得下,因而,我衷心地祝愿他们夫妇,安享晚年、健康长寿。只要力所能及,就继续为中美两国人民服务。老李学着京剧武生的口气和模样,双手抱拳,顿挫、有力地说了:“得令啊!”

(责任编辑 叶方)

《共和国早期的故事》 引出的思考

● 李 锐

凡是已经过去的事件,都可以归入历史。历史对于我们有用,是因为从过去可以觐知现在,从现在可以推想未来。过去的种种,无论伟大辉煌还是失败苦难,对善于学习的人,都是财富。愚蠢的人尤其别有用心的人,则拒绝接受教训,用思想统制的办法把一切失败都从历史上抹去,结果往往重蹈覆辙。

1949年以后,各种“肃反”、政治运动不断,逐渐发展扩大,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又在更大的范围、更长的时间里重犯了过去的错误,造成了更加惨重的损失,“文革”被我们党称为十年浩劫。所以我一直主张多研究历史,要懂得从历史中接受教训、汲取智慧。

研究历史,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从整体的格局来观察历史。这是我们许多历史学家在做的工作。无论通史还是断代史,都是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材料加以集中、抽象,然后叙述各个历史事件的原因、条件、过程、结局、影响。这样的工作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做得好,对于我们掌握历史规律,接受历史经验,可以获益匪浅,但也常常容易流于枯燥,阉割了历史的丰富性与生动性,缺乏感性体验的历史规律或历史经验是很难深入人心的。另一种模式,是从个体的经历来展示历史。这是许多传记、回忆录、口述历史以及日记、信件等的作者在所做的工作。虽然个人所历的事件有大有小、所知的事情有多有少,但都是历史的一个片段、一个侧面。因为是个人的经历,所以它不仅包含对所历事件的细致、具体的叙述,也更带个人感性的体验。其所长正足以补史书的不足。

中国是一个有修史传统的国家。中国传统的

史书是兼顾抽象与具体两个方面的。司马迁的《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表、书之外,其实都是家族或个人的传记。这些传记写得生动具体、神采飞扬,让人读来丝毫不感乏味,历史事件也就是通过人物的活动——展现出来了。后来历代的史书,大都继承了《史记》的体裁(惜笔力不及),即便是编年体史书,也十分注意人物言行的个性化叙述。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史学传入,开始有了新的史书体裁,纪传体史书几乎无人再作(恐怕也无人能作)。及至苏联修史的框架被我们接受之后,国史成了党史,党史成了领袖人物言论的集纳,史料只是填塞来作为现成结论的映证。修史至此,史书也就越来越枯燥无味,让人提不起兴致来了。苏联的经验已有前鉴,他们的党史是每换一届领导,就要重修一次也!

重新恢复纪传体史书的传统大概很难做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社会活动的多样性,使得历史早已不是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物的经历所能概括。但新史学的体例却也无法反映生动具体的历史。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世,怎样才能使后世真切地理解我们时代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以便他们更好地前行,我以为,不妨来个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一方面,鼓励史学家放出眼光,不是按照现在的结论,而是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写出确有见地的现、当代历史佳作。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著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在他的《八十自寿铭》里这样写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另一方面,鼓励

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真实地而无涂饰地写出自己的遭遇、见闻、思考和情感，不要限定什么标准的框框。有了这两方面的努力，即便我们一时不能产生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需要多种条件的综合机缘，至少也为产生这样的著作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包括材料与思考。

郭维敬同志编著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记录了近六十个人物与事件（工作地区 20 个省市），除少数知名人士外，多是不见于经传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同样都是那一个历史时期的亲历者。他们的悲痛与欢乐、苦难与成就，都系于社会的专制与开明、倒退与进步。许多史书上没有的历史事件的细节，我们只有在这些个性化或个人化的历史记述中才能读到。而缺少了这些细部的真实，历史的画面就无法得到真实地再现。我没有读过书中的全部文字，著者寄来一部分“简介”，虽然这类人物与事件，我知道不少，且为这类书写过序言，但我读到这些“简介”后，仍然震惊不已，尤其是反右前的一些事件。这里摘录几件：

《行军三千里，磨难三部曲》的侯福凯，大学毕业时，在南京参加西南服务团，徒步跋涉到昆明后，在云南广播电台任秘书兼编辑。1955 年肃反突遭捕，被判刑 15 年。刑满后因无家可归，不准离劳改队，又留劳改队 10 年，共 25 年。离劳改队后，在农村与一年 56 岁，比自己长 3 岁的农妇结婚。打工、摆小摊多年，于 1986 年始平反离休，后不久病逝。临终前，诗句中有“死去犹望‘德’先生”，渴望民主不已。

《一封朝奏九重天的传奇故事》，写清华大学南下学生董纪兴，1950 年在“三反五反”时，出于天真热情，向毛泽东上书，汇报领导干部公开向群众检讨可大大提高党的威信，因而建议毛也这样做。结果开除党籍被拘捕，董百般无奈，只得装疯卖傻六年，又装失语症十年。他的传奇故事在广西柳州地区传闻甚广，三十三年后始彻底平反。

《覆巢之下无完卵》叙述信阳师范音乐教师申绳武，肃反中被错捕，复查纠正后，在反右末期却无端与“右派”一道被送去劳改，1959 年饿死。其妻焦玉钧（北京市原副市长焦若愚胞妹）一次游行前，突击抄写小学生手持小旗上的标语时，将“反对美帝霸占黎巴嫩”中的“反对”二字写重了一处，当即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 7 年，亦早死。四

个儿女沦为孤儿，大的 16 岁第二年病死，剩下的三个分别为 10 岁、6 岁、4 岁，讨饭年余，为孤儿院收容。10 岁的儿子健康正常活下来了，6 岁的女儿后来成了疯子，4 岁的儿子长大后，因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与入殴斗，伤人致死被判死缓。

《盲流树起纪念碑》中的重庆白寺驿的王嘉泉，南开中学高中毕业，解放后参加工作，因家庭出身且姐夫跟随蒋介石去台湾，被打成“潜伏特务”。几经劫难，被迫加入“盲流队伍”，逃到新疆石河子。经农 8 师学校收留后教学突出，发表过有关文章。文革中被打成“逃亡地主”，劳改十年。复出后除努力教学外，以自己菲薄的工资，省吃俭用，收养教育了六名特困生，个个送入名牌大学，被这些特困生尊之为“父亲”。他终身未娶，用行为树起了一座纪念碑。

关于河南省反右情况，书中有这样几个统计数字：全省学校教职员中被划右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平均占教职工数的 23%，有的地区达 50% 以上，个别学校达 70% 以上。固始县划右教师占全体教师的 48%，遂平县占 52%。“右派分子”中的悲壮情景与划右的荒唐故事，书中收录不少。

《几度生死遭劫波，半生慷慨唱悲歌》的余士奎，反右时任学习小组长，因带头鸣放，被划为右派。劳改中多次坚持说真话，遭到说不尽的生死磨难。对“信阳事件”，他在座谈会上独持异议，说“全国都刮南风，信阳这个小地方能刮北风吗？信阳事件的发生，地委书记路宪文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是上级”，为此险被打死。文革中他公开演讲说：“历史上有两种官员没有好结局，一种是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者；另一种是功劳卓著，位高权重者……刘少奇和所有被打倒的老革命家都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彭德怀的万言书何罪之有？”结果被捕判死刑，林彪死后，改判死缓。他在捕前及在狱中，都有一些坚持真理的激烈言论。

《权力意志下的悲惨命运》，写信阳地区在“左”书记王某的领导下，反右运动的各种荒诞离奇故事。如在所辖 19 个县市中，开展向地委“报喜”活动，结果划右派数一浪高于一浪。党校副校长董玉宝实在划不出“右派”来，书记厉声斥责说：“你就是右派！”竟真将董划为“右派”。息县划右派比较迟缓，他亲自到息县召开大会，公开说：“难道平时，就没有给支书提过意见的？”经这

一点拨,大家心领神会,当天夜里该县就以400多右派报捷。他到汝南县视察,看教师学习班鸣放大字报时,见有数十名男女教师画一幅漫画,讽刺教育科长随随便溺。于是在大会上说:“这泡尿尿的好,尿出了一群牛鬼蛇神!”结果这一大批无辜教师都一个个沦为“右派”。

《反右何处不荒唐》与上文相似,其中豫东永城县还有所谓“草荒右派”,全县据改正时公布的数字竟为1976人。商丘地委宣传部长谢某,将全系统所有干部几乎全部划成了右派,据传只剩下“两个半”所谓好人。由于谢规定了数额,专署文教科9人必须划8人,该科科长冯德馨无奈,只得将包括副科长在内的全部干部都划上。冯与副科长商量,副科长说:“现剩下咱们两人,只有划我,因我是本地人,划上还可以回家种地。”嗣后,冯每月领工资后总要将一半寄给副科长家,直到这位副科长“摘帽”。此事后来传为“美谈”。

反右结束后,信阳地委为改造“右派”,在所属的大别山区谭家河建立了“万胜山林茶场”。共送去右派二百多人,逾半数去而不归,埋骨荒山;幸存下来的则多因伤残,未得尽天年。至今人们谈起谭家河都感到毛骨悚然!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就是几个负责干部,都把右派当作不可宽恕的重刑犯,对之毒打,任意饿饭,迫使不分昼夜地干超强劳动,达两年以上,以至一批批自杀、饿死、累死。基建大队长徐××与办公室主任贾××同被人称作“活阎王”,一次强令右派在恶劣天气中翻山越岭去扛木料,途中倒毙、滑入山涧及大粪坑、走不动冻死的达8人(另一说17人)之多。当年死了右派还不如死了家禽家畜。其它分散在各县改造及送劳改农场的右派,其处境也同样恶劣,死人亦不在少数。如平舆县共划右派729人,改正时有129人已死去,占右派总数的17%。

现年七十二岁的杨一华,在监狱、劳改场所共度过十九个春秋,先后创作了一千多首旧体诗词,大都作为“罪行”证物被收缴,现仅留下二百多首,书中选刊了五十来首。读后觉得真是“有胆有识,诗如其人”。这于我也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亲切之感,愿为这位特殊诗人多做点介绍。1949年后,他曾在华东军大、南京政治学院等处学习工作,后转业任中学教师。他十分关心时事,敢于独立思考,1955年就因研究斯大林的内外政策,被

批斗八个月。后更因对历次政治运动有不同看法,而倍受打击,惨遭厄运。1976年清明节后,他为了不连累一起议论过时政的难友,将自己多年来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盘托出,被改判无期徒刑。他的诗词可说全是史诗,为针砭时弊反映现实之作,有对“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的批判,有对杰出人物的赞颂或其不幸遭遇的同情,有对遇害友人的哀悼和对亲人、家乡的思念,以及对自己身世的感叹和期盼等等。扬善刺恶,褒贬分明。他熟读古籍,深谙诗律和典故,诗作厚重沉郁而又隽永开阔,格律严谨而又自然流畅。现摘录几首以见一斑。

他曾与友人合写过电影剧本《陆游》,《有感三绝》第一首,引用陆游和梁启超诗句:“死去犹能为鬼雄,中原未复恨难穷。千秋自有史臣笔,亘古男儿一放翁。”

《1958年反右有感》:“百花齐放百家鸣,纳善从流剧可亲。谁识翻云覆雨手,一时才俊尽沉沦。”

《1959年参观马桥乡亩产将达十八万斤粮田有感》:“信口雌黄夸短长,千斤棉与万斤梁。由来咳唾成珠玉,泥土也能自化粮。”(《后汉书赵壹传》:“势家多所宜,咳唾成珠玉。”)

《1959年庐山会议》:“地本倾斜水怎平,是非非是令人惊。英雄岂独始皇帝,自筑长城自毁城。”

《读汉武帝罪己诏有感》:“三面红旗白日昏,冤魂无日出愁城。武皇一诏真千古,宁为苍生不为名。”

诗人于1962年底被捕入狱,即作七律一首自勉:“星槎有路疑无路,苦海无边会有边。别样心情嫌蛱蝶,依然气骨傲榆钱。涧中恰有阴沉木,岩畔偏宜不见天。他日重温今日梦,定牢肠断唱催眠。”(原诗自注:李商隐诗:“莫讶韩愈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此句意谓对人民、国家忠贞不渝。阴沉木是珍贵木材,传说生长湿处或在水中浸泡多年而成。不见天是乌龙茶精品。)

《1966年红卫兵》:“借石他山玫瑰玉,兴兵红卫乱乾坤。洪杨内乱天朝败,刘邓清除中共昏。元祐党牌今复见,东林旧案岂重温。藩篱撤尽长城毁,日暮西风摧断魂。”

诗人1968年被押往西宁继续服刑。1980年

无罪释放，恰好十九个年头。《1980年返沪有感》：“恰似牧羊苏武日，也如重耳返家天。黑牢一刻人应老，怎信已禁十九年。”

这本凝结一代知识分子血泪的故事，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反思。1949年后，国家是何等兴旺气象，尤其八大通过了不搞阶级斗争，集中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路线，大家都受到鼓舞。可是随即反右派运动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了。直到“文革”十年浩劫。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到底错在何处，教训在哪里？经过近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终于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之后，我们已经懂得或似乎懂得一些根本问题了。可不可以简单地说几句：

什么叫社会主义？过去“不怕穷，只患不均”，“只怕富，富则修矣”。于是“穷则思变”，发明“三面红旗”，大搞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效法“五斗米道”；太平天国一套都出现了；从康有为的《大同书》中找到社会主义。

怎样进入社会主义？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完全不顾恩格斯晚年对《共产党宣言》的批判），要“大公无私，消灭私字一闪念”。如何实现这个理想？从马克思那里片面地取来四个字：“阶级斗争”。“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

（上接61页）怪，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从他们的手边擦过去，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他接见我们的时候，这次猛虎掏心已经得手，一下子消灭了蒋军的旅部和总队部，活捉了他们的旅长、副旅长和总队长。”她在这里记述的刘帅的兵法论释，提要钩玄，深入浅出，精彩夺人，可入人物史传，可入兵法军史，当然还要加以铺述。

沈容大姐的《红色记忆》具有一种特殊动人的明谧气息。它娓娓言来，毫无造作，朴素澄净，朗润自然。看来似不吃力，实际蕴藏着很强大的力量。因为它是以丰富、真切的亲身遭际和见闻组织起来的，是以敏锐的观察、细致的注意、平等清醒的心态和深沉的感受交相融注而熔铸出来的。行文中，有时还藏着一点幽默，使人更感亲切。

近年来，我们有幸读到几位文苑女高手提供

怎样领导呢？“无法无天”。这就要“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就从中国古代治国之道中汲取营养并加发展。不要讲什么“仁政”。要“法先王”，“以吏为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纲六纪”，“乾纲独断”到书记挂帅，到要点个人崇拜，“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知识分子算什么，不会杀猪，只会七嘴八舌；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个，我们几十万。于是“知识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西方的东西，那一套不能学。到“文化大革命”，就“四个第一”，“四个伟大”，“破四旧”，人类历史发展得到的文明全被踩到脚下了。

这二十多年来，国力得到很大加强，经济持续发展，但也不能说没走过弯路。根本问题我以为仍是政治改革未能同经济改革同步，民主滞后，法治难张，有宪法而无宪政，仍是人治为主，导致腐败丛生，难以遏制。政治文明就是要实施宪政，只有民主化和法治化，才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不断发展。

书中的故事含血带泪。我相信这些真实的记述，会帮助读者理解我们曾经走过的历史，从而知道社会进步的艰难，因而更加懂得珍惜已有的进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奋力去开创未来的坦途。

（责任编辑 李 晨）

的文学精品，杨绛是一位，章诒和是一位，现在又见到沈容大姐的佳作。她们都在记叙性散文的途径上，鼎足而立，开拓出一股新鲜的文风，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千古文章未尽才，谦挹虚怀的沈容大姐，尽管大半生都出入于文字因缘，却没有出过集子。《红色记忆》中的文章，原也没有打算出版，只是写给家人共赏，亦以自娱。恰好给友人看到了，惊知她原来还有这些个精金吉玉，大加怂恿促成。沈容大姐是个随和人，就同意出版了。她辞世前，幸好还看到了书的清样。她以前还表示过，曾经想到二十来个题目，以后还可以慢慢挤些时间着笔，谁知糊涂天却夺下了这支笔！她的老友高汾亲自送来挂在灵堂的挽联：“生花妙笔似君当年风采，欲雪寒天是我此刻心情。”

唉，永远的沈容大姐！永远的《红色记忆》！

（责任编辑 萧 徐）

沈容大姐和她的《红色记忆》

● 苏仲湘

沈容大姐匆匆离去了，留下了遗作《红色记忆》。纸墨犹馨，音容如在，牵引大家深深地怀念和痛惜。

文如其人，《红色记忆》以她特有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恬静笔墨，记述了她丰富鲜活的平生见闻，包括许多动人的红色掌故。它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惊喜瞩目。当我读后掩卷，龚定庵的诗句陡然撞上心头：“人难再得始为佳！”唉，像沈容大姐这样的人品，难再得了，像她这样的文品，难再得了。

沈容大姐是位老战士，去世时年已82岁。她有着十分丰富、乃至传奇式的阅历。她在抗战时期，在长沙参加地下党。当时是中学生，《毛选》一卷上载名的杜修经就是她的入党监誓人。后到重庆，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继入《新华日报》，与长她5岁的老新闻工作者李普同志结婚时，是周恩来为她的婚事拿过主意的。国共和谈期间，在北平军调处叶剑英手下做事。和谈破裂后，她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刘邓部队中“一位不会骑马的女兵”（后来学会了）。本职是新闻采访，曾和刘邓在一起“海阔天空什么都聊”。中共中央迁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期间，她在附近的东柏坡工作。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见过。建国后，她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过国庆活动。从新闻界转到电影界后，和江青直接打过交道。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又到中宣部恢复前的中宣口工作。进钓鱼台办公。她亲睹亲闻了多少次时代中的阴晴雷电，面遇过多少位叱咤风云的当代贤豪，安身穿越，结想联翩。丰富的第一手见闻奠定了《红色记忆》的基础，提供出一系列沧桑岁月的本色面目。

沈容大姐在写作《红色记忆》时，善于敏锐地捕捉细节，抓住侧面，勾勒出事态和人物的重要特征和本生面目。使人即小见大，妙悟真源。这是本

书的一大特点。

《红色记忆》中记下了她在刘邓部队前线司令部时的一个细节：

1947年，“有一天，一次战役已开始了。我看到邓小平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明白，作战的时候，作为指挥作战的政委在干什么。在我的想像中，他好像应该站在地图前看地图，或在电话机旁等电话。这些都是从小说中看来的。出于好奇，我就走到他房里去问他：‘邓政委，前方已打响了，作为政委，你干什么呢？’邓小平说：‘我现在做的是着急的工作。’后来我才明白，每打一仗，司令员和政委最忙的是考虑这一仗如何打，所谓‘运筹帷幄’，等作战方案决定了，命令发下去了，他们倒清闲了。这时着急的，是情况是否跟他们预想的相符合，这确实是他们‘着急’的工作。我向邓小平提那样的问题，正说明我是一个十足的新兵。”

书中还引述了当时任军区司令部军政处长，建国后任海军司令员的杨国宇写的一段日记：“在唐官屯，刘邓住在一座较大的房子里，院内有两棵石榴树。刘邓在石榴树旁的桌上，围着一张地图。时坐，时立，后信步走向村西，向南看，向东看，向西看。好似不知道地球向哪里转一样。”

沈容说：“正史里绝对看不到这种记载，然而，这不也是历史吗？”

《红色记忆》的笔调非常自然而安详，令人读来特别感到亲切。这是一种出于平常心的表述。沈容大姐不乏亲睹风云际会时刻的机缘，却总能以清醒而平等的角度来体会和观察。对于革命贤豪，特别是功高德重的贤豪前辈，人们常以敬仰乃至敬畏的心情来看待和应接，甚至于他们的伴侣也未能免。这本来是自然的，不过这种角度有时也会阻挡视线。古代文学史中有“刘桢平视”的典故，

因为刘祯觉得平视方能谛视对象的全部美丽,而仰视则不能。沈容大姐以二八华年入党,英锐之气历久犹存,从而长期以平等心看人看事,观察到事态和人物的无遮饰的本初神态,保存在自己的红色记忆中。这是本书的又一鲜明特点。

她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时候,李克农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是管家。“不很久,我发现大家都有点怕他……只要李克农一到,大家就不敢大声说笑了。有一天,吃罢午饭,各自回房。李克农也回到他的住房,我跟了进去。李克农问我:‘小鬼,有什么事?’我说:‘想给你提点意见可以吗……你是不是太凶了点?吃饭的时候本来大家有说有笑,一见你来就不敢出声了。’他哈哈大笑说:‘就是要这样。’接着他说:‘你做过地下工作,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的服务员、勤杂人员里面有多少他们的人,而我们的同志以为这里都是自己人,可以随便了,不加警惕。’李克农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沈容记下了一个小故事,她的同乡女同志胡小为,经地下党介绍去延安,路过北平,暂住执行部。她以为住在一起的都是同志,无拘无束。“有一天她遇到一个人,问她姓什么,叫什么,要到哪里去,什么人介绍她来的。她一一如实回答了。那人又问她:‘你知道我是什么人?’胡小为答:‘不知道。’那人说:‘我是国民党。’说完就走了。”这一下把胡小为吓坏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不知如何补救,饭也不吃,哭了一整天。隔壁女同志得知后,意识到此人就是李克农,向李克农报告了。李克农说:“这小姑娘真天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把什么都说了。太没警惕,我吓她一下。”沈容写道:“好家伙,这一吓差点要了胡小为的命。”

沈容大姐转到电影界后,1958年,曾率领摄制小组和苏联合作拍摄关于中国和苏联的纪录片。苏方的导演是瓦尔拉莫夫,五次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双方一起完成了在苏联的作业,进展顺利,关系不错。而双方一起来中国拍摄时,却发现瓦尔拉莫夫对中国的群众态度极坏。他要求他们这样做,那样做,群众不是职业演员,做不来,他就发火骂人。沈容对瓦尔拉莫夫提出了批评意见。他答应以后注意,但到现场依然如故。沈容向电影制片厂写了一封信,说明这种情况。以后,副厂长徐肖冰来,对她说:“不能给苏方提意见,和苏联的合

作一定要搞好关系。刘少奇同志专门有指示,在合作关系中,关系搞不好,你无理五十大板,有理也是五十大板。”沈容在书中写道:“我听了之后难过极了。为什么对苏联要这样的低声下气呢?于是我把这种情况又写了封信给对外文委。”“这封信起了作用,在我们回厂编片子的时候,瓦尔拉莫夫被调回去了。”沈容平平常常、风浪无惊地做了这回事。

在和沈容大姐交往时,无不强烈感受到她温雅、开明、谦婉的风度,甚至似乎看来有点纤弱。人们一时想不到,她有坚毅果敢的另一面。在搞地下工作时,曾经凸现出急智退敌、叱咤生威的场景。

她在四川江津白沙时,有一次,和领导她的老秦在学校附近接头,拿到了很多准备散发的党的宣传品,放在无锁的书包里。他们正在谈话,忽然走来两个穿黑色中山服的人,截住他们,分别查问。沈容写道:“我顿时觉得,这次是死定了。因为我书包里有那么多东西。”沈容“觉得难逃一劫,准备被捕时,反而非常镇静”。她不等他们问,抢先问他们:“你们是啥子人?为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玩儿?你们有什么权利挡住我们?简直岂有此理!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不讲道理的人。”把她拉开的人见她越骂越凶,只好说:“不瞒你说,我是搞特工的。最近,共产党在这里闹得厉害,我们不得不注意,不得不问问。”这边这个人没来得及问,那边查问老秦的人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就让他们离开了。书中写道:“事后,我多次想到,那个特务怎么那么笨,翻一翻我的书包,我们就都完了。”

又有一次,她到乡间找一个同志接头,未联系上,情况有些可疑。她离村折回,忽然进来三个不明不白的壮汉,厉声叫喊,叫她停步。她当时走在江边,“曾想过,实在追急了,我就往江里跳。”但她旋即“计上心来”,以四川袍哥式的口吻,拿出地道的四川腔,厉声向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是个搞起的?你们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就敢来叫我?”她的神态把来人镇住了,错愕不定。恰好江上驶来一只船,她就跳上船,有惊无险地离开了。沈容这样的险境和智斗经历,大可以融入电影场面。她后来转入电影界,这些轶闻可惜没派上用场。

在地下活动时期,沈容大姐回忆道:“我没有

认真读书，尽在忙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交朋友啦，贴宣传品啦，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把党的一份宣传品，贴在大标语牌上，此外，教室门口、饭堂、邮局等地都贴了。第二天又挤进人群去看。

十年浩劫时，沈容和李普在南方，备受折磨，后来有幸“解放”。1974年，他们从广东调回北京，在月坛北街五号新盖的宿舍楼安家。1976年10月7日，即“四人帮”就缚的第二天，李普奉命参加五人小组，进驻新华社总社。后来，沈容也参加中宣口工作，进钓鱼台办公。关于“四人帮”的兴衰过程，沈容在《红色记忆》中根据亲自见闻，不乏生动有趣的侧写。她还用闲笔记述了有幸相识的几位邻居的散忆等等。为免引述冗繁，这里只略引闲笔述及一些情况。

有一位邻居，新搬到他们上一层的五楼居住。原来这里是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家。这是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派秘书来看房选定的。住的是张玉凤的父母和其他家人。张玉凤也常到沈容家借打电话，彬彬有理。她的电话大体有两个内容：一是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二是要车来接她。看来她时常见缝插针式的回家省亲。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市民纷纷找邻近空地搭防震棚。当时就由部队为张家在邻近球场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帐篷，“真够气派”。不但床褥桌凳都搬了下来，煤气罐、炉子、橱柜全备不缺。另有一位女士，也常到沈容家借打电话。她和张玉凤神态不同，“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她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有乘红旗车上学并叫老师单独给她讲课的身价。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她匆匆出嫁，据悉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沈容曾躬逢其盛，亲眼看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取了铺盖卷扛下楼去。沈容不禁嗟叹道：“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这位女士，沈容没在书中指名明言。

周恩来总理逝世，万民悲痛。

《红色记忆》中记载说：“种种限制，使悲痛的群众很不满。张玉凤的小叔子经常来我家串门。这时，他来我家给张玉凤打电话。他说，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置灵堂悼念周总理，要求延长遗体告别时间，增加遗体告别的人数。张玉凤说，让她请示一下。我们都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不一会儿，张玉凤的回复使大家都失望。她说：‘请示过了，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办。’”与此同时，《毛泽东传》中所录的张玉凤的回忆说，她曾冒昧地请示毛泽东：“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这一问，毛泽东非常伤感，痛苦而又吃力地说：“我也是走不动了！”张玉凤两次请示的回应，都是事情的一个侧面。两个侧面合起来，就构成较完整的当时实态，构成了历史。《红色记忆》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历史注脚。

《红色记忆》中不乏相似的历史注脚。她记录的1946年11月，刘伯承将军向沈容和李普介绍在滑县战役中运用“猛虎掏心”打法，就是另一个佳例。

沈容写道：“后来我知道，他是常常用这种打法的。大凡作战，国民党军队进入战场，总有两支或几支部队摆在前面，指挥部总是摆在后面一些，或多或少呈一个倒‘品’字形。所谓猛虎掏心，就是监视它的先头部队，出其不意打掉他的指挥部……他微笑着说：‘我们的打法也（下转58页）’”



沈容于家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防空大演习

● 王作化

1934年，正当日本加快侵略步伐全面进逼华北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日浪潮和政府及军界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于11月21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防空大演习。参加演习的军兵种和政府各部门及民防组织人员之多、组织协调之复杂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绝无仅有的。

30年代初，日本侵华气焰甚嚣尘上，日军在1931年发动“9.18事变”鲸吞东北后，1932年又挑起了上海1.28事变，接着于1933年上半年又集中优势兵力侵占热河，向长城一线发起大规模进攻，把侵略矛头指向整个华北。在淞沪和长城抗战中，尽管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日军凭借优势装备尤其是强大的空中力量，使中国军民遭受惨重损失，包括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在内

的许多成建制部队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伤亡殆尽，牺牲极大。

而此时的蒋介石正集中精力忙于剿共，把有限的金钱都用来购买枪炮对付毫无空中力量的红军，哪有闲钱去买昂贵的飞机用于国土防空？到长城抗战结束时，中国的各型飞机不足300架，而日本仅作战飞机就有2700架。日军依仗空中优势在中国的天空耀武扬威，日本飞机可以成编队地在长城沿线和平津地区飞行，甚至可以家常便饭似的飞临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侦察。而中国的国土防空却是一片空白，许多重要城市和要点目标连最起码的防空设施如高射炮、高射机枪和防空洞都没有。日本军方头目甚至狂言：“战争如果全面爆发，仅靠轰炸就可使‘国民政府和支那军彻底丧失抵抗意志’”。

面对日本嚣张的侵略气焰和巨大的空中威胁，国民政府许多有识之士和广大爱国人士纷纷要求政府高层采取措施加强国土和城市防空。国民党军界智囊蒋百里将军和在德国学习防空回国的黄震球将军专门面谏和上书蒋介石，强调对日防空袭作战的重要性，急切要求政府迅速建立有效的国土防空体系。宋庆龄、何香凝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还纷纷捐款购买飞机保卫国家领空。一



中国军队在进行高射机枪训练

心剿共的蒋介石虽然对抗日持消极态度，但对日本频频加快的侵略步伐和巨大的空中威胁不得不予以重视，尤其是淞沪、长城战役中其嫡系精锐部队在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下遭受的严重伤亡使他对全面战争一旦爆发首都南京的安全十分担忧。在日本侵略和全国抗日呼声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把国土防空提到议事日程。鉴于当时国家防空力量异常薄弱，人才、经费、材料极度缺乏的实际，乃责成其军事部门直接在南京筹组防空建设事宜。1934年1月，南京军事委员会下令将高射炮教导队、防空研究班、



中国军队在进行高炮训练

防空军士队合并，在杭州笕桥成立防空学校，任命黄震球为该校校长，以培养防空专业人才。不久，蒋介石又接受了黄震球关于组织防空演习的报告建议，特命黄震球具体负责组织筹划“首都防空演习”。

黄震球，字剑灵，出生于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梅县）松源镇。13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先后毕业于湖北陆军预备官校、保定军官学校。早年加入同盟会，大革命时期参加过讨伐叛军陈炯明和北伐战争的诸多战役，曾任国民革命军师副官长、旅长、师长。1931年赴德国学习防空。后又随张发奎等人到欧洲考察防空事务。1934年回国后出任防空学校校长等职。抗战爆发后，先后任军委会防空副司令、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后方勤务总司令等职。

为加强这次演习的组织指挥和力量协调，蒋介石还特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钱大钧专门召集军委会有关部门和行政院、监察院等五院院长开会，专题研究防空演习事宜。黄震球在这次会上就防空演习计划和实施方案作了详细报告。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与会官员一改过去相互推诿扯皮的做法，很快就演习的组织实施达成共识，经过讨论研究做出以下决定：1、由防空学校召集驻南京地区的军、警、宪及各政府机关有关人员在杭州接受短期防空集训，熟悉演习预案和应办事

项；2、立即着手建立南京地区民众防护团和通信单位接受防空训练和统一指导；3、加强民防勤务训练，由防空学校负责派员来南京对基层单位民防人员进行训练；4、一切准备工作包括人、财、物、组织、技术、训练等，务必于演习之前筹备完成。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又征调了京沪杭铁路、公路沿线及江苏、浙江两省各电报、电话工作人员到防空学校接受防空情报训练，随即加以任务编组，并派遣当时仅有的高炮部队和高机分队先期开赴南京地区构筑阵地，开展对空射击训练。同时集中中央军校、步兵学校、教导总队、江宁要塞及南京各机关学校的防空工作人员进行先期训练，并成立有航空委员会和空军人员参加的演习协调小组，以加强陆空协调联系，实施统一指挥。

南京防空大演习采取统裁及派员方式进行裁判。统裁部由军委会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任统裁官，南京警备司令和警察厅长任副统裁官，下设包括全盘指导班、航空组、高射炮组、防空小炮（高射机枪）组、通信组、灯火管制组、交通管制组、警备组、警报组、烟雾组、消防组、救护组、防毒组、工务组等。各组评判官由南京市市长、内政部和交通部次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航空学校和防空学校、炮兵学校、警官高等学校校长、兵

工署和卫生署署长、津浦路管委会委员长及南京发电厂厂长等担任。演习根据不同内容,还将整个参演地域划分为防空监视地带、飞机战斗地带、听测地带、高射炮射击地带、警备区、灯火管制区等,并将设于南京鸡鸣寺的防空情报所作为此次防空大演习的总指挥部。

在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1934年11月21日—22日,防空大演习在南京地区正式举行。21日上午7时40分,设在鸡鸣寺和南京下关电厂主厂房顶部的日造立式防空警报器凄厉地响起,紧接着,演习指导班派出的广播车在南京各主要街道和居民区广播演习注意事项,敦促市民遵守演习规则。相关演习地段正在上班、街上行走及家中的市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紧急跑向防空掩体或安全地带进行隐蔽。南京各重要路口由全副武装的宪兵和警察实施戒严和交通管制,胸佩演习标志的工作人员,迅速指挥着来往车辆和人群进行疏散隐蔽。

不久,空袭紧急警报声再次响起,随后空军编队飞机飞临南京上空,剧烈的模拟爆炸声震得大地都在颤抖。轰炸声中,南京各要点的防空高炮、高射机枪响成一片。有几幢楼房被“敌机”击中,顷刻间黑烟滚滚,十多辆消防车鸣着刺耳的警笛赶到被炸现场开始灭火工作。烟雾弥漫之中,几辆救护车也赶赴现场抢救“伤员”。21日夜晚,当空袭警报声又一次响起时,实行灯火管制的整个南京及周围地区顿时一片漆黑,人们再次从家中跑出在臂扎白巾的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空袭隐蔽。演习区域上空飞机轰鸣,地面炮声隆隆,探照灯光柱四射,军警的警笛声和消防车、救护车的鸣叫声交织一片,整个南京地区笼罩在一派“战争”气氛之中,演习场面颇为真实壮观。

这次演习共分五次进行,第一次从21日上午7时40分开始,演习内容为民众防护和防空部队对空作战。第二次从当日下午2时开始,内容侧重于分区施放烟幕弹,扰乱敌机视线。第三和第四次为21日夜间,内容侧重灯火管制、高炮与探照灯协同动作及试放照明弹。第五次于22日上午8时开始,演习重点为消除空袭后果。参加演习的部队有防空飞行队、防空监视哨队、15高射炮营(附照测队)、高射机枪队、交通管制和灯火管制大队、消防和防毒、伪装、救护、工务大

队以及各警备、警报、通信部队等。这次演习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涉及地区广泛,包括南京、扬州以及江宁、江浦、仪征、六合、滁州、采石矶、芜湖、溧水等县以及京沪铁路、京杭公路沿线和长江下游沿线部分地区的重要政府机关、学校、厂矿及居民区都参加了演习。

这次防空大演习,引起全国各地的高度重视,有21个省、市派代表抵南京现场参观,各大报刊都给予重点报道,进行防空知识的宣传。同时它也引起了国外的极大关注,不仅美、英等西方国家派出军事观察员前往观察,而且蓄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也派出大批间谍其中包括南造云子、川岛芳子等高级特工乔装成新闻记者或假冒其他身份,或明或暗地前来侦察窥伺,收集相关情报。南造云子就是在此次演习后策反了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父子,为窃取国民政府核心机密埋下了伏笔。

在南京防空大演习的影响下,国民政府又于1935年11月28—30日举行了京杭镇联合防空演习,重点演练了监视哨所勤务、夜间灯火管制、空中及地面战斗、各防空协同动作以及警备勤务等。随后各省、市也相继举行了一些防空演习,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36年7月的长沙防空演习、1937年1月的武汉防空演习和5月开封、郑州、巩县、洛阳的防空联合大演习等。根据这几次防空演习的经验,国民政府还举办了防空巡回展览,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南京防空大演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土防空实地演习,也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大规模城市防空演练,它不仅增强了当时人们的国土防空意识和防空知识,而且为全面抗战后的城市防空奠定了基础。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机空袭南京达4个月、118次之多,但“死伤的数目并不大,政府也照常指挥全国作战,并不曾因空袭而受影响”。随后的战时首都重庆被日寇定为“航空进攻作战”的首要目标,但仍顽强抗击日机“战略轰炸”、“无区别轰炸”、“月光轰炸”、“地毯式轰炸”等狂轰滥炸长达5年半之久,在血与火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不被任何强敌所压倒的英雄气概。为了纪念这次南京防空大演习,1940年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将每年11月21日这天定为“防空节”。(责任编辑 李晨)

抗战劲旅税警总团

● 范国平

税警总团是宋子文在 1932 年任财政部长期间建立的私人武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但是在宋子文的苦心经营下,变成了一支连当时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

税警总团是拿每年摊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盐税剩余款项做给养的。一切编制、装备、人事全凭宋子文意愿行事,别人无权过问。蒋介石以为只是一支无足轻重的小部队,不以为意。蒋手下的特务机关虽然神通广大,但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搞不好要引火烧身。谁都知道蒋介石的婚姻是政治婚姻,蒋要借助宋氏家族与美国联系。宋子文历来不买老蒋的账,两人意见不和时,宋子文敢当面掀桌,蒋无可奈何。宋子文就乘机把一个微不足道的税警总团搞成一支精悍的武装。

税警总团建成时下属五个团,加总团直属部队,相当于六个团。团的编制相当庞大,每班有士兵十四人,每班配备轻机枪一挺,六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每连共计 252 人,相当于甲级正规军两个连。一营辖四连,另配六零炮两门。团统辖三营,另配特种兵连七个,每团战斗兵员共 5000 余人。总团部直辖特务营、高炮营、炮兵营、通讯营等七个营。整个总团拥有兵力三万余人。



宋子文

宋子文本想用税警总团作为自己的军事资本,可惜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用来争权夺利的私家军队,在后来变成了一支抗战劲旅,屡建功勋,并培养了一代虎将、有“中国隆美尔”之称的孙立人将军。这也算是身为政府大员的宋子文,为国家作的一点贡献。

1932 年,宋子文曾经与退居关内拥兵 30 余万的张学良和拥兵 10 万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联系,想把税警总团调到华北前线抗日。被蒋介石发觉,被迫去职,“出国考察”。

宋子文特别注意税警总团的人才的选拔,高级军官全部由他亲自网罗,亲手提拔。第一任、第四任总团长温应星、第二任总团长王庚,都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第三任总团长莫雄,北伐战争时在张发奎第四军中是一员勇将。还招揽了孙立人、赵君迈担任团长。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宋的妻兄张远南也跑到妹夫麾下担任了团长。高级军官非亲即故,其中很多人还是很有统驭之才的。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另外还有一个由八名德国军官组成的顾问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子文大力支持孙立人(清华大学、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毕业,任第四团团长)努力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千方百计训练部队。孙将军把中国传统

教育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自己部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办法,形成了一套与国军其它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被大家称为“孙氏操典”。所属部队按照“孙氏操典”进行严格训练,官兵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学科、术科水平,乃至专门的缉私技术都比较高。

税警总团武器装备均由财政部自行采购,精良程度非一般部队可比。博采欧美军事强国之长。开始主要采购美国武器,装备欧立根防空机炮、维克斯两栖战车,步枪主要是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枪或比利时的FN1924/30步骑枪。到后来,国民党政府允许税警总团拥有德国正规军的武器装备。步枪主要是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枪,轻机枪多是进口的捷克ZB26,重机枪则多为马克沁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手枪自然是名闻遐迩的7.63毫米毛瑟M1932,甚至还配备有“卡登·罗伊德”超轻型坦克。

经过宋子文和手下将领的锐意整顿,税警总团成为了一支绝对的“非正规军”的精锐部队,这为以后成为抗战劲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二八”事变前夕,税警总团大部分驻守在上海及浦东一带,第一团驻徐家汇,第二团驻南翔,第三团驻闸北,第四团驻清东,总部设在徐家汇。在日军突袭上海时,宋子文毅然把税警总团毫无保留地拉上了抗敌的第一线,并亲自颁布了作战命令。



孙立人



黄杰(左)

税警团没有用自己的番号参战,因为怕八国银行反对,停拨其余经费。2月中旬宋子文决定驻闸北的税警三团和驻在南翔的税警二团,统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参加抗战序列。后来,当第五军驰援上海抗战时,税警团的参战部队就又改为第五军第八十七师独立旅,以原税警团总团长王庚为旅长,同时接受第五军指挥。当时税警团参加了守卫龙华机场等战斗,许多官兵英勇无畏,奋勇杀敌。税警二团二营官兵在战斗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税警总团指挥官内部不团结,严重削弱了其战斗力。

尽管内讧如此,当时这支部队还是给侵沪日军以很大杀伤。

淞沪协定签订之后,税警总团调离上海,开赴苏北徐州以东两淮地区整训。莫雄在宋子文和德国顾问团的支持下,在海州郊区建立了一个军官队和军事总队,轮流抽调军官、士兵,加强射击训练。孙立人的第四团训练尤其勤奋。1933年税警总团调江西剿共。期间参加剿共的共48个单位举行射击比赛。孙立人税警第4团占了个人前十名的7位,并夺取团体第一名。刘勘83师在七琴吃紧,在税警第4团赶来增援前就转移了。孙以一个团接下一个师也不行的防地,打破红军的夜袭和粮食封锁,迫使红军放弃对七琴的争夺。税警总团的兵员和指挥官的素质可见一斑。

据莫雄将军讲,在淞沪协定之后,美国人曾答应给宋子文(宋说是给中国的)五百架飞机

(当时中国只有100多架战机),宋子文立刻叫下属在淮北云台山川西附近营建一个周围60里的大型飞机场。建筑材料先于飞机运到,有足够税警总团三个团驻扎的新型活动木营房,地毯、电话一应俱全。这些东西其他部队见都没见过。不久,宋子文又从法国、捷克等国不断购进大批包括装甲车在内的新型武器,进一步加强了税警总团的战斗力。

“一·二八”事变以中国方面的让步得以解决。此时

宋子文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日本的严重威胁。他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于不顾，要求抗日救亡，几度飞往北平与张学良、汤玉麟会谈，并在国际上大力宣传日本的侵略罪行。为应付华北突发事变，他与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秘密商妥，备足30多列车，集中于海州，把税警总团一下子全部运到郑州，准备开赴北平。此事被河南省主席刘峙发觉，打电话告知蒋介石。



“卡登·罗伊德”超轻型坦克

蒋大发雷霆，说叫税警总团开回原防，否则缴械。再次担任总团长的温应星不敢违抗，率部返回。宋子文的一系列活动和态度，加上他拒绝为蒋介石剿共增加军费，影响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蒋非常恼火，逼宋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出国考察”。他当然容不得非嫡系的强大军队的存在，1934年命令当时驻防徐州的第二师师长黄杰接任税警总团总团长。宋子文苦心经营的军队，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吞并了。然而，黄杰不久迷恋于蓝衣社活动，疏于本职，导致税警总团训练松弛，战斗力有所下降。但是第四团在孙立人将军的领导下，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原有的风格。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淞沪会战开始，税警总团配属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参加淞沪抗战，编为一、二两个支队，司令官分别为何绍周、王公亮，总司令黄杰。税警总团参加了蕴藻浜、苏州河以南防御等战斗，将士作战十分英勇，给日军重大杀伤，最后由于伤亡过大而撤退。孙立人的税警第4团在蕴藻浜和大场两处战役中脱颖而出，孙因作战有功而被提升为第二支队少将司令。

10月30日，日军向苏州河以南发动攻势，以税警总团所在的周家桥地区战斗最为激烈，税警总团接连击退日军七次强渡。但日军最终还是在猛烈炮火的弹幕射击掩护下渡过苏州河，黄杰亲赴第一线指挥，双方在刘家宅反复争夺，阵地几度易手，每楼每屋都是经过激战。周家桥地区

成为整个淞沪会战中日军死伤最重的战场之一，最终刘家宅和周家桥两村因守军税警总团死伤惨重而失守。孙立人率部防守苏州河周家桥一线，与日军血战两周，被日军迫击炮击成重伤，全身中弹片十三处，昏迷三天，被宋子文送到香港治疗。次日36师赶来增援，与税警总团联手反击，鏖战终日，仍未能夺回刘家宅。11月3日，日军继续猛攻税警总团阵地，第5团团团长丘之纪阵亡，全团官兵死伤过半。第4团随即投入战斗，以凌厉的反突击攻入刘家宅，但只夺回了南侧一半的民宅，日军据北侧民宅顽抗，双方在村内逐屋逐室争夺，战况极其惨烈。战至18时，税警总团终因伤亡太大而由36师接替周家桥一带的防务。

在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将士浴血奋战，奋勇杀敌，遭受严重伤亡。会战结束不久，黄杰被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拉拢，将税警总团余部编为四十师，而五千余伤员就不管了。孙立人伤未痊愈即赶往武汉，即以这五千人为基础，于1938年3月重建税警总团，招纳旧部。不久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到1941年底，所部第2、3、4团和直属队改编为陆军新38师。新38师编成后参加军政部战力校阅，名列第一，编入缅甸远征军，战绩辉煌。后编为新一军，成为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部队，最后在辽沈会战中被歼灭。

（责任编辑 李晨）

民主监督和监督民主

● 徐迅雷

民主监督？监督民主？这是一个问题。

据《瞭望》第50期的报道：继黑龙江原省长田凤山和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案之后，不久前，黑龙江省又有5位副省级和一批地市、厅局级干部纷纷落马，引发黑龙江省“政坛地震”。那么，一些“问题官员”为何都能在人大获得高票通过？接受采访的一些人大代表说，本来有些人可以在人大划票阶段被选下去，可是在韩桂芝等“问题官员”坐镇进行“权力监督”之下，“民主监督”也就形同虚设了。

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民主监督的重点是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也就是说，“民主监督”是监督“领导权力”的。然而，“民主监督”在实际操作中，位高权重的官员竟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其转化为“权力监督”。“民主监督权力”就变成了“权力监督民主”，“民”监督“官”转化成“官”监督“民”，“下”监督“上”颠倒成“上”监督“下”，这样的政治生态，无疑是可怕的。

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操作层面的“制度设计”就千奇百怪了。一位人大代表说，此次落马的一位副省级干部在当初人大对他进行投票选举时，划票方式发生了变化，即同意的不划任何标记，不同意的划“×”，弃权的划“○”。也就是说，只要你一动笔，就表明你不是不同意就是弃权。“代表们一个挨一个端坐选举会场，哪怕不是很大的动作，主席台上的人也会看得清清楚楚。会场两旁的过道到处是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不停地来回走动。”许多代表划票那天根本就没带笔，因为不需要带也不敢带，拿到选票后就直接扔进了票箱；有的代表为避免被怀疑和“党组织”不保持一致，进会场时干脆不穿外套以表明自己没有带笔！

可见，当权力监督民主，当贵而重的权力严厉地监督脆而弱的民主，“民”其实已经难“主”

了。“民主”之虚设，“官主”必兴旺。“官主”全方位全天候贯穿官场，腐败必肆虐。“用民主监督来预防高官腐败”，被称为“我国反腐的战略转变”，但落到实处实在不易。民主监督要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诉求，已经说了又说了，然而总是难以抵达终极目的。

黑龙江省高官腐败引发的“政坛地震”，让我们看到民主选人、民主用人的核心问题。都说“重大决策前要经过民主程序”，这当中有两方面问题是需要深究的：其一，“重大决策”是否包含“用人决策”？其二，“民主程序”是动真格还是动“假”格？近年来审计署的监督卓有成效，但我们要明白，审计监督的是“花钱”，而比“花钱”更重要的显然是“用人”。对“用人”怎么“审计”、如何监督？这里没有更好的制度设计，这里存在一个深邃的空白。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各地轻易能将“一元化领导”异化为“一人化领导”，“问题领导”提拔“问题官员”，“问题官员”保驾“问题领导”，竭力将民主选举纳入自己的封闭循环之圈，公共权力大片大片地遭遇大面积污染，就成了必然的趋势与后果；所谓监督，大抵成了事后、圈外的无力之举。

“监督”的制度设计，其本质应该是“制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监督是净化权力的表象，制衡是净化权力的实质。通常我们说“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人亡”，其实更本质的是“只有权力制衡才不会政息”。没有完善的权力制衡制度，其结果往往就是：“监督”几近形同虚设，“民主”几乎成为儿戏。

巴尔扎克曾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当每个人都可以攀登政权的桅杆摘彩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特权了。”想想吧，“每个人都可以”，那是多么伟大而激动人心的时刻！

（本文原载《改革内参》2005年第7期）

以诗词形式评说史实,臧否人物,阐释哲理,是我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在风波亭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父子,似乎已成定论。所以,西子湖畔岳飞墓对面,铸有秦桧、王氏夫妇跪地的铁人,任人唾骂。但后人在斥骂秦桧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疑问。秦桧虽为宰相,位高权重,但他能将一位声名显赫,官至太尉、少保兼黄河北诸路招讨使,在前线率兵作战的大将随意召回,并罗织罪名予以杀害吗?如果没有皇帝的授意,恐怕他不敢、也不能胆大妄为,杀害岳飞。

南宋词人张元干于岳飞被害当年,就在《贺新郎》词中写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的句子,暗示至高无上的皇帝,其内心深处的想法,一般是难以窥测的。叶绍翁在七律《题岳王墓》中也说:“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欲说还休,难以明言。只有改朝换代四百年以后,明代文征明才以一阕《满江红》,把风波亭冤案这层窗户纸戳破。

文征明的《满江红》为:“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这阕词矛头直指宋高宗赵构,把秦桧置于从属地位,确是一语中的,让人震惊。上半阕指出宋高宗赵构对岳飞先倚重、后残杀的事实。从出土的石碑上还可以看到当初赵构为岳飞题写的“精忠岳飞”四个字。既然当初倚靠岳家军大战金兵,为什么还要加害于他呢?难道真的是打败敌寇、取得胜利,就该死吗?岳飞入狱后,大理寺官员都认为岳飞无罪。韩世忠质问秦桧时,秦桧的回答是:“其事体莫须有。”不久,未经审理,岳飞父子即被暗杀于杭州附近的风波亭处。忠臣良将已然被杀害,再说什么话也难以挽回了。可恨、可悲的风波冤狱,面对当初御敕的“精忠岳飞”,更显出赵构的阴险虚伪。下半阕则分析,赵构为什么非要将已经取得节节胜利,直逼金军后退,不日即可渡过黄河、收复失地的岳飞,在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召回。后世曾有人说

一阕满江红 说破岳飞冤

● 李凯源

那十二道金牌是秦桧伪造的。秦桧敢假传圣旨,要前方停战,把统帅召回吗?其实都是赵构的主意。词中反诘,难道赵构的父亲宋徽宗赵佶、长兄宋钦宗赵恒被金人于靖康二年(1127年)俘往东北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后来徽、钦二帝均死于此地),赵构就毫无亲情,不知挂念和羞辱吗?就不想复兴北宋王国吗?“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这句话切中要害。徽宗被俘时45岁,钦宗仅27岁,如果真的打败金人,请回父、兄,那么谁当皇帝呢?还有自己的位子吗?其时,作为徽宗第九个儿子的赵构,以康王身份,从汴梁(开封)南逃至临安(杭州),继承皇位,称为高宗,在南宋小朝廷偏安享乐,哪里还顾得上亲父、兄。而岳飞一片愚忠,在《满江红》中赤诚表白:“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里的“天阙”指的是北宋王朝的皇帝钦宗赵恒。而赵构想的则是“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南辕北辙,岳飞想的是国仇帝恨,复国兴邦;而赵构却只想求和,保住半壁江山,当个儿皇帝,苟且偷生,极尽享乐,他能不把主战复国可能有损帝位皇权的岳飞除掉吗?至于后人把杀岳飞的一切罪过都归于秦桧,实为颠倒主次,重小轻大。他们或为维护皇权,为尊者讳;或媚上邀宠,求官进爵;或难得糊涂,巧于全身。“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一个小小的宰相秦桧,他能有杀害岳飞的能耐和权力吗?他只不过是揣摩透了高宗赵构的心理,投其所好,逢迎拍马,为他除掉了绊脚石岳飞,维护了他的利益,也为自己取宠升官铺上了红毯而已。秦桧卖国利己、奸诈狠毒,应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断送北宋、牺牲父兄,杀害忠良、苟且求荣的赵构,也应还其阴险狠毒、虚伪丑陋的本来面目,予后人以警示。

隔代修史,千古论人。四百年以后明代的画家、诗人文征明的一阕《满江红》,仅用93个字就真实、犀利、一针见血地说破岳飞风波亭冤案的事实真相,有情、有据、有理、有力,有侠肝义胆,有哲思禅悟,实乃论史之妙笔、千古之绝唱。(责任编辑 李晨)



深情怀念 毕列爵 老师

● 林 晰

印度洋海啸大灾难发生的前4天——2004年12月22日清晨,毕列爵老师在武汉与世长辞。他是湖北浠水县人,享年88岁。当天晚上,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胡征宇同志用电话传来这一噩耗,令我悲痛不已。

我同毕老师交往60多年,除“文革”的一段时间外,我们师生之间几乎未曾断过联系。那还是抗日战争的1943年,我就读于昆明五华中学高三班,他是我的班主任。当时,西南联大一些师生在这所学校任职或兼课,其中有大名鼎鼎的朱自清、潘光旦、吴征镒等教授,还有王瑶、汪篪、张澜庆、毕列爵等联大各科系的研究生,后来他们都成为国内著名的大学教授。毕先生是学生物学的,他讲课认真、有趣,往往把活的动植物标本(如蚯蚓、青蛙等)搬到课堂,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如果说,我现在还有些生物学方面的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他待人特别亲切,既是老师又是兄长,大家因此敬重他、喜欢他。五华中学那时有一个规定,学生每周要写一篇周记,把自己的生活情趣、学习心得、社会见闻以及个人的思想活动写在周记上。这是一个可以让学生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场所,也是锻炼写作能力的好机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毕老师在学生周记后面的批文,往往要写好几页纸,比学生的习作要长出许多,其中有鼓

励、有批评、有启示,互相切磋,使师生之间的思想感情交融在一起了。我的父亲每周都要看我的周记,当他发现毕老师的批文写得那么认真,那么热情洋溢,那么入情入理,真使他感动了,他为我有这么一位好老师而由衷地高兴。一天晚上,父亲专门来学校拜访毕老师,他们恳切地谈了好久好久,从此之后也成为几十年可以交心的挚友。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虽然在两地工作,但书信往来不断。他到北京参加学术性会议,总要打电话通知我去见见面,有时还到我家住一两天。我去武汉或河南采访,也总要找时间去看望他。每次见面,聆听他的教导,总会有收益。一般说,他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话题的范围很广,除了他的专业自然科学以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宗教、教育、文学、艺术、中外历史诸多方面,是一位十分博学而又健谈的人。他十分关注社会上的一些动态,对某些官员的不正之风深表不满,特别是痛恨那些贪官污吏;他还多次谈及中华民族当前最需要的是“忧患意识”,应当时刻恐惧自己在国际竞争中被甩下,那种陶醉于取得的成就是全然没有根据的,言谈间充分表露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操。

毕先生194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即西南联大)生物学系,终生从事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藻类学家。解放初期,中南军政

委员会农林部要调他去担任水产处处长职务,他拒绝了。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岗位是学校,是他所热爱的教育工作。他一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同志说,“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意义上的假期和周末,他的工作室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的足迹遍及我国西南、中南地区的山川和湖泊,对我国的动植物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写有大量的调查报告。1983年在《武汉植物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从19世纪到建国之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植物资源调查》一文,是他参阅了83种中外历史文献资料后写成的,这说明了他在做学问的严谨和刻苦。在他年近古稀之时,还坚持给湖北大学生物系的学生讲课,带领学生深入神农架和三峡地区做藻类作物的标本采集和研究。从1979年直到去世之前的25年间,是他从事藻类学研究工作最重要也最出成果的时期。这段时间,他主持或同饶钦止教授、黎尚豪院士合作编著了《中国淡水藻志》五个卷册。毕先生倾注全部心血和他自己的财力搜集和整理了中国藻类分类学和有关文献资料(现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这套资料是目前我国最为完整的一套藻类分类学文献资料。为此,朋友和学生称他为“藻大王”,这是一个多么亲切和适合他的称号呵!

我同毕老师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最近几年间,我有意把他写给我的信保存下来。他去世后,我清点了一下,竟有65封之多。一般说,他写给我的信都比较长,内容丰富,很多话充满着哲理,而我比较疏懒,信写得比较简短。我们之间还把自己欣赏的文章或书籍寄给对方,以分享在读书中的喜怒哀乐。2004年初,他把作者谢泳送给他的《思想操练》一书寄给我阅读。这是一本阐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书,涉及的问题有历史、教育、中国政治制度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等等。他在这本书的几乎每一页上,都批注着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可见他读书之用心和细心。他的这些批注都能给我以启示,往往也把我带入沉思,说明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2004年11月8日他写给我一封信,距离他去世仅仅一个半月的时间,这也是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摘抄其中的两段,可以说明他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诲人不倦”的大师,他是真正把教书和育人紧紧结合的教师楷模。

“多年来,我对你这种嫉恶如仇,对不合理的事总是深感忧愤的性格,一方面深感钦佩,一方面也颇有点担心。”

“我上次的信,只是想劝你要超脱一些,要站在更高一点的位置上去对待这些问题,更要冷静一些去分析这些问题,而不要动感情。这需要两个条件:一要高一点的理论修养,二要多懂一些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用前者可以将问题分析清楚,用后者可以较为正确地理解何以这些问题会发生在中国。——其实这些事绝大多数是中国历史的反复和重复。如此,则自己便多少会冷静地对待这些事绝大多数,而又不是无动于衷。”

与这封信寄出的同时,还附来他在2001年5月写的一篇《悼周基堃好友》的文章(注:周先生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生,解放后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2001年3月去世。此文曾刊于西南联大校友通讯上)。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周先生开始对一些官场不正之风,也是十分生气,但后来他能做到‘不动感情’,而会去冷静观察和分析。周先生曾说:‘按照中国的历史,那些欺压群众、贪污腐化的事,是一定要发生的,要躲也躲不掉。’并为我寄来很多材料,解释这些事情发生的缘由,所以他后来从不生气,我也就慢慢地不生气了。他之所以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是因为知道国内外的东西比我多得多,尤其是哲学和历史。”这些话,充满了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无限的关怀和爱护之情,信中的言辞,又是那般的诚挚和中肯。什么叫“诲人不倦”?我看这就是吧。

也就是这封最后的来信中,他第一次跟我谈到了他的病情:四五月间,发现口腔牙龈长了肿瘤,7月份做了手术,原以为无事,上个月被确诊为口腔牙龈癌,已转移到了左颈部(近距离)。信中说:“往下情况如何,我会及时告诉你,对老朋友们,不必故意保密,也不过分宣传,听其自然好了。人总有那么一天,能平淡对待,比背包袱要痛快些。”“将近90岁的人,再多活或少活几年,算不了什么大事。”“我的日常生活自我感觉,一切如常,没有多大变化,每天仍可工作几个小时。”多么安详的心态,多么敬业的精神!

这段时间,我心里老是惦记着他。12月初,我给他家里打通了电话,当时他正准备去住院治疗,可见病情恶化了。我只同他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想

不到半个月后,他就远行了。这次的通话竟成了最后的诀别。在我们以往的通信中,也曾多次谈及生与死的问题。记得他曾对我讲述了一则动人的故事:在一片森林中,有人来伐木,小树见了十分害怕,大树告诉它,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应该的。凡是树,都要为人们(世界)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虽死犹荣”啊。而森林永远不会被消灭的,它还会有下一代来接续下一代。小树想通了,等它长大时,以愉快的心情接受砍伐。显然,毕老师就是

以这种认识来接受死亡的挑战。在他看来,死亡就是生命的归属。这种在死亡面前具有安详的心态,也许就是他终生研究生命科学的结晶吧。

毕列爵老师对于“死”的看法和态度是那么的自然和平静,没有思想包袱,就像一片树叶落下来。我想,他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是痛苦的,但精神上却是安宁的。我祝福他的灵魂安息!

(2005年2月21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 李晨)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全套四册		67.20	8.00
之一 我的回忆	孙中山		
之二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之三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之四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林彪的这一生	少华游胡	28.00	5.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5.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锐	18.00	5.00
邓小平年谱	中央文献研究室	76.00	8.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洪	28.00	5.00
扛起地狱的闸门	丁群	21.00	5.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5.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们 祝东力	17.00	5.00
人民公社兴亡录	宋海庆	36.00	6.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野	29.80	5.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思	23.80	5.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	28.80	5.00
第二次宣言	王小平	28.00	5.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5.00
红色第一家族	马社香	30.00	5.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硕	36.00	6.00
断桅扬帆——蒙冤 25 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们 肖思科	28.00	5.00
25 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安	26.80	5.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涛	40.00	6.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波	40.00	6.00
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6.00
食无禁忌	(美)巴里·西尔斯 比尔·劳伦	19.00	5.00
党史札记(一集)	龚育之	28.00	5.00
党史札记(二集)	龚育之	35.00	6.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本书系大型政治性资料图书,如实反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 1600 余人的简历,为国内外读者了解建党八十多年来中共中央历任领导成员的有关情况提供翔实的资料。本书的编纂,注重严肃性和权威性,资料来源可靠,收录内容准确,编纂体例规范。

《陈独秀风雨人生》陈独秀离开人世已经 60 多年了。每到春天紫色的蚕豆花开放之际,人们自然会想起因误食此花而病发的陈独秀,想到了当年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老头子”的风雨人生。本书以 30 万字的篇幅,描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曲折人生道路,并追述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大背景。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在刚过去的 20 世纪,那些让人记忆的历史太多太多,但本丛书让亲历者来讲述,就多了一份真实和一份况味。在这里你可以与徐铸成、于光远、蔡元培、陈独秀、朱德、杨振宁、林语堂、蒋梦麟等名家相遇,体味历史,重温记忆。

《食无禁忌》本书的英文原名是《健康区》,讲的是如何搭配不同食物的比例,以达到激素平衡,从而进入“健康区”。美国斯坦福大学游泳队请本书作者制订菜谱,结果,1992 年一举夺得八枚奥运金牌。据作者说,他推荐的食谱以 1982 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防治心脏病和癌症大有益处。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黄宗羲民主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与启示

● 泰 栋

浙江省宁波不仅有推动先进生产力的、运用先进文化的、以善于经营乐善好施而闻名于世的宁波商帮,也有对国内和国际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先进文化的浙东学派,实际上这两者是经济和文化的反映与促进的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派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而其思想内涵则更丰富,仅就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原君》、《原法》等篇章来说,是他个人经历明清之际急剧变化,经过多年反思与探索,萌发了难能可贵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明清时代,他的思想成了民主主义的启蒙。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法》等篇章所包涵的思想要比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著作几乎要早一个世纪。

一、黄宗羲的《原君》、《原法》矛头直指罪恶的君主专制制度

黄宗羲生活的时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已经到了“天崩地解”的时刻,是民族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转折关头。1628年,他只身入京,为东林党父辈讼冤雪仇,大闹京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继之甲申事发,清军入京,明朝覆灭,1649年前后,他在浙东舟山一带抗清,十年几濒十死;最后,南明小王朝彻底完蛋,清政权已经稳定,黄宗羲直面

时代风云之变幻,著书讲学,进行历史的反思。他一生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方面潜心探索,撰著生涯长达65年之久,著作共计一百二十多种两千余万字,他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以及经文集长达四百八十卷,晚年自编《南雷文定》、《南雷文约》等等都是他自认为代表他思想的著作,而《明夷待访录》、《留书》等他认为他的“佐王之略”(前者只二卷,后者只一卷),但却在其中深刻的揭示和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黄宗羲应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民主主义思想先驱。

在《原君》篇中,黄宗羲首先提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这个天赋人权的命题,即每个人有求生存求幸福的权利,而这个人权却被君主剥夺了。那些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君主个人把天下当成了私产;将“天下(百姓)为主,君为客”,颠倒成“以君为主,天下为客”;他揭露了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的罪恶。从秦始皇到康乾盛世,只有黄宗羲才第一次这么深刻地揭露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罪恶,喊出了“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口号;第一次把皇帝当作“寇仇”、“独夫”!黄宗羲不仅猛烈抨击了封建君主制度,而且在《原法》中激烈地批判了君主个人“藏天下于筐篚”的封建法制,主张“以天下之法”



黄宗羲画像

取代“一家之法”，主张“先有治法，后有治人”，在法律面前无贵贱之分。在《置相》篇中，提出了虚君实相的君主立宪类似设想；在《学校》篇中，黄宗羲不仅提出：学校除了传播文化、培养人才外，更应该“公其是非”成为监督辅佐朝政、指导舆论的类似代议机构的场所。尤为可贵的是，他主张学校中也要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开创了我国近代学校重视自然科学学科之先河。

二、产生黄宗羲民主主义思想的经济和文化基础

明清之际，也就是黄宗羲生活的1610年（出生）—1695年（去世）前后，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在我国东南半壁破土萌发。江浙一带，特别是杭

嘉湖、绍兴、宁波一带工商业繁荣，手工业工场兴起。据乾隆三十五至四十五年间记载，杭州市内外有织机3000部，燃丝车1300部，宁波有织机850部，绍兴有织机1600部，湖州有织机4000部，绸业劳动者2000人。宁波口岸贸易也重新开始活跃，康熙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和外国通商。在新兴繁荣的东南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以及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的冲击下，黄宗羲才会首先摆脱“工商为末”的传统偏见而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

如果说黄宗羲和张苍水开始是为了忠于明皇朝而反清，张苍水以身殉节，慷慨赴死，名垂千古；那么黄宗羲在反清复明无望，在四明山读书几十年，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探索，最后觉悟到无论是明朝的皇帝或者是清朝的皇帝都是“为天下之大害”，都是“寇仇”，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的独夫。

没有明朝昏君和宦官对忠臣的滥杀无辜（包括对他自己

的父亲），黄宗羲也就不可能切身体会到封建专制制度之罪恶，那些皇帝“独夫”，以“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顾盼”，“深刻罗网，反害天下”，黄宗羲也不会喊出在法律面前朝野贵贱一律平等的口号。

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占有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没有土地或者很少土地，而中国的封建地主剥削下的农民，虽然名分上是一个自由人，但是仍旧是准奴隶。清康熙时的土地占有情况已出现了“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的现象；乾隆时则形成“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抵十之五六，旧日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乾隆之宠臣和珅就占有地亩8000余顷。封建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依靠政治和经济特权，通过地租、高利贷、劳役，甚至私设公堂，酷刑拷打，使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封建君主又“重农（重地主剥削）抑商”，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滞留的原因。在黄宗羲之后二百多年的马克思就指出东方这种生产方式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其特点是农民是准奴隶，没有自由，没有生产积极性。而黄宗羲则揭示了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之所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在于封建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鲜明地提出要推翻这种罪恶的制度，“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向使无君，人各得自

私也，人各得自利也！”这就是说，只有推翻了封建皇帝，每个人才有争得生存、幸福的权利。

三、黄宗羲民主主义思想的启示

黄宗羲的民主主义思想自然是为封建皇帝所绝对不容而被扼杀的。所谓史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经历了134年，也就是黄宗羲生活的那个时代，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就达100多起，乾隆朝则为文字狱的“盛世”，因一字一句获罪，被杀的数百千计，被监禁流放的则不计其数。封建君主对思想的镇压与扼杀不仅对于生者甚至祸及死者。曾经为乾隆讲过学的沈德潜，仅仅因为一首咏黑牡丹遗诗中，有“夺朱非本色，异种也称王”一句，被乾隆定为是恶毒攻击，开棺戮尸；湖南学政胡中藻诗中仅仅有“一把心肠论浊清”，这个“浊”字加在“清”字头上，被认为是诬蔑清朝，斩而弃市。封建君主大兴文字狱，其目的不仅扼杀民族意识，也在于扼杀民主意识，至于黄宗羲矛头直指君主之说，更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事，所以黄宗羲只能把《原君》、《原法》等篇定名为《明夷待访录》，借六十四卦一卦，暗示地下之火，待来日有人寻访。后来，黄宗羲被推为浙东学派之代表人物，主要也是指黄的经、史之学，而《明夷待访录》则是一百多年之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梁启超、谭嗣同

特别推崇《明夷待访录》，秘密印发了数万本，四明先哲，今犹在矣！君主专制之祸害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一个世纪还要多。所谓康乾盛世，南征北战，收复台湾，拓宽疆土，中国的综合国力占到世界的四分之一强（28.7%），比之印度、法兰西和大英帝国三者之和（26.5%）还多。那个十全武功的乾隆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自大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之货物以通有无。”而西方国家从十七世纪开始的产业革命，形成了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三个共和国。至于日本，虽然仍旧保持着天皇君主制度，但经过明治维新，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只有以天朝自居的我国清皇朝，固守封建专制的极权统治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凭着老牛破车和一些手工业作坊，拖到1840年鸦片战争，大英帝国终于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一个以小生产为基础的中国封建农业社会当然不能与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英国相匹敌，所以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时很中肯地说：“一个人口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指清皇朝），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注定要打垮。”

黄宗羲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主张一直到了辛亥年间，才由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来实践，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朝终于被推翻了。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在经济上改变了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而且发展了工业化。但是中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始终是一个个人独裁、专制和愚昧盲目、迷信盛行的国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滥用权力、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新中国。有形的辫子剪去了，可是无形的辫子还在。1980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经典性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三百多年前的黄宗羲所反对过的天下大害君主专制制度和提倡过的“先有治法，后有治人”等先进思想仍旧有着现实的意义。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还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小平同志对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表示深恶痛绝。

我们应当为宁波曾产生过黄宗羲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化巨人而感到骄傲，浙东学派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将永远发出光芒。

（责任编辑 李 晨）

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

● 张友鸾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只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蛮更过于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便显得突出了。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为乾隆年间之事。乾隆口口声声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这本档案,却血雨腥风,透过纸背。

文字狱,字面明白,是为了文字吃官司。

文字总是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当然是知识分子了。在封建统治下,文字狱十分残酷,出乎常情,不受任何约束,不同于一般狱讼,所以,可以说文字狱乃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

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好像有好大的“敌我矛盾”。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护身符,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由于罗织而成的。

一般狱讼,总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据以判处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文字狱往往是先有

特定的对象,而又无法(不能或者有所未便)定他的罪名,于是就从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证据。明代诗人高启,做了一首《题宫女图》,中间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静有谁来”这样的句子,皇帝被讽刺帷薄不修,很受不了,又不愿意张扬其事,这就借着他代友人魏观作《上梁文》,处刑腰斩。《上梁文》有什么毛病呢?是因为屋基是吴王宫殿旧址,硬说他有造反的企图。清代皇帝雍正,猜忌年羹尧,因为他的功劳大,难下毒手,这就指责他在奏折里,把“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是“大不敬”,有该死的罪。清代皇帝乾隆,自称“古稀皇帝”,有个不识相的大官名叫尹嘉铨,也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认为他狂妄,又不好治罪,于是造了一个“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这个文字狱,把他绞杀。

这明明指出:文字本来无罪的,只是“有罪者”的文字才“有罪”。统治者今天看这个人顺眼,这个人的文字就没有问题;明天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这个人的文字中就有问题一大堆。清代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正是这样。乾隆对于此案,发了一顿牢骚,说是:“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指雍正)之诛查嗣庭矣。”当时关于文字狱案



雍正

件,总是雷厉风行,急如星火的,怎么这个案子却等待数年之久呢?只因胡中藻是鄂尔泰门生,鄂尔泰原是乾隆重臣,后来失宠身死。所以胡中藻的文字,在鄂尔泰得意时没有问题,在鄂尔泰失宠身死时,问题就来了。

文字狱是无限上纲、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清代初年,如庄廷钺的《明史稿》案,吕留良、曾静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是出名的大案,动辄牵连几百人,杀了无数的知名之士。后来这种大案虽然少见,但以文字获罪的条件却大大放宽了。乾隆时期,阎大镛《侯侯集》案,问官指出“不避庙讳”,“御笔”朱批:“如此可恶,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矣。”吴英“拦舆献策”,建议了五件事,不能答应就不答应吧,不是这样做,偏挑他写了两个“弘”字是“迭犯御名”(乾隆名叫弘历),碎剐凌迟。还有一个“明”字,一个“清”字,都不能随便使用,因此而遭杀身之祸的也大有人在。例如:李骥《虬峰集》里有“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之句,徐述夔《一柱楼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这些都是死罪。事例太多,无从列举了。

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是一切文字狱案件中必然采取的。为什么那些受害者罔知忌讳,自贻伊戚呢?殊不知,“鸡蛋里面挑骨头”,总归要硬派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不管多么小心谨慎,真是“由你奸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要想规避幸免,简直不可能。传说清代雍正时期,有人在文字中写了“维民所止”,这原是句成语,不料雍正勃然大怒,说“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了头。所以吕留良留下一部《维止录》,尽管是在此以前的事,凭这个书名就非得把他剐尸不可了。胡中藻做学政,考试出了一个《乾三爻不象龙说》的题目,乾隆说:“乾封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定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这两个例子,一个是象形,一个是谐音,谁会想到会犯罪呢?还有一个名叫龙凤祥的人,喜欢刻图章,印了一部《麝香山印存》,“并无悖逆不法字句”,却也犯了罪,从云南再次充军到



乾隆

伊犁。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不该姓“龙”,姓龙罢了,为什么还取名“凤祥”?占了皇家的吉利口彩,能不有罪吗?

从上面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只要是笔头下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大则几十本的专门著作,文集诗集;小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书信;甚或一二句诗的断句,一二句写下来的言语。自己作的,传抄别人的,以至传抄古人的,一经挑剔,决不容你摆脱。发展到后来,戏曲、音乐、绘画,以至于刻图章等等,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也都列入文字狱的罗网了。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总是被逮捕,被抄家,坐监牢,受审讯。审讯的时候,常用酷刑;审讯的结果,总归重判。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边疆,充军为奴;大多是杀头处绞,碎剐凌迟。如果人已经死了,还免不得从坟墓里刨取棺木,拖出尸身,剐碎焚烧。而且一人得祸,株连极广,往往一杀一大片。所有近亲家属,不管知情不知情,识字不识字,一概得“从坐”。清代并没有惩治文字犯罪的法律,但有“大逆”犯罪的案例。遇到文字狱,援引“与大逆无异”定罪。按照“大逆”的处理:“凌迟处死,正犯之子、孙、兄弟,及兄弟之

子,年十六岁以上皆斩。男子十五岁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均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文字狱一构成,就意味着血淋淋的一场杀家的惨祸。所以一人被捕,常常举家自杀,以免受辱而终难逃一死。

从社会关系上讲,文字狱的株连性也是惊人的。每一案件,莫不张大其词,涉及多人,拖累甚广。如果被认为是要案,常常罪犯百十成群,攀牵数省。一本书,中间“出现问题”了,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乃至题签的人都有罪。这还不说。还要追查何人出篆刻印,何人雕刻,何人印刷,书印多少,何人贩卖,何人购买,赠送何人。核对详实,扫数上缴,缺一本也不行。书板要解京劈毁,决不能少一片。所有有关的人,全都有罪。即或你虽有书,却没有看过,事实证明是如此,那也不行,谁让你不看、不检举呢?当地该管官吏,有牵连的罪更大,没有牵连而事先失察,也同样有罪。古时有所谓“瓜蔓抄”,按藤摸瓜找罪人;文字狱这根“瓜蔓”枝条歧出,是长之又长的。

不要以为文字狱硬栽罪名在受害者身上,可以不费心机随便说说就完了。其实不然。那些案子,莫不经过精工细作、炮制而成的。为了遮掩天下人耳目,要说一些强词夺理的话,用以表明给戴的帽子是合乎尺寸的。论手法主要耍的也不过几种,只是花样翻新,愈出愈奇罢了。常用的手法首先是牵强附会,肆意歪曲。你说是活的,他偏说你指的是死的;你说着东边,他偏说你影射着西边。尽管理论上不符合逻辑,他却能振振有词。其次剪头去尾,断章取义。或者挑一段,或者挑二三句,不管上下文如何,只给你加上些“虽然”“但是”的字眼,就正面变成反面,反面变成正面,意义全非了。再其次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经过了嫁接的文字,和原来当然不一样了,他说这是你的手笔,这却是无可辩论的。在这些手法之外,更有制造伪证,肆为谰言的,那样故入人罪,越发的可恶了。

统治者的意图,爪牙们总是心领神会的。当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时候,爪牙们就都争取搞几个以立功,用无辜臣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这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搞不出,是无能。别人抢先揭发了,你还不知道,一旦被认为“失察事小,隐讳事大”,不但会丢官,而且也有抄家弃市的

可能。这样的例子岂止一二个。有时下面检举揭发,因为不是统治者要整的对象,来个“谕旨”,“所奏殊为过当”,“传旨申饬”。不要以为挨了骂了,其实“简在帝心”,将来自有重用之日。这些都成为做官的诀窍。办理文字狱,宁枉毋纵,宁重毋轻,是必然的趋势。至于爪牙彼此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讦,这样构成的文字狱,也是有的,那就不在话下了。

对于社会的影响,文字狱是恶劣而深远的。那些想向上爬而没有阶梯的,钻头觅缝在别人的文字中找毛病,检举揭发,作为自己猎官的敲门砖。有仇恨嫌隙的,利用文字狱陷人于死地,以伸其报复心愿。也还有敲诈勒索、强求不遂的,其初是只拉弓不放箭,后来却终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把文字狱构成了。再还有那朋友投赠,书信往来,“忝在知交”,无所不谈,偶或一二字句有失检点,受者怕被牵连,岂敢知情不举?变生肘腋之间,有些人就这样糊里糊涂被出卖了。有个名叫梁诗正的,本是协办大学士,告老还乡。乾隆怀疑他不是本意,“谅有怨言”,就叫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去做他的特务工作。混得熟了,梁只说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富把这话打报告,并且说梁“举止语言,无不缜密。即有怨怀,不敢遽为吐露”。乾隆见到奏折,加上朱批说:“如此,则是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这事正好反映了当时情况:不敢留字迹,不敢说话,整个社会都死了,真正到了“万马齐喑”的地步。

作者张友鸾(1904-1990),安徽怀宁人,20世纪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曾任《京报》之《文学周报》主编、《世界日报》总编辑、《国民晚报》社长,还参加了《民生报》、《新民报》、《南京人报》等的创刊工作。他是新中国第一部整理出版的古典名著《水浒》的注释校订者,对古典白话小说加注释作了开创性的探索。张博学多闻,文笔酣畅,撰写了大量杂文、随笔、古典文学研究专论,出版的作品有《白门秋柳记》、《秦淮粉墨图》、《胭脂井》、《汤显祖及其牡丹亭》等。本文选自作者之子张钰选编的《张友鸾随笔选——胡子的灾难历程》。

(责任编辑 赵友慈)

“礼”的延续

——精神现象零拾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我们喜欢夸赞自己是“礼义之邦”，但对什么是“礼”，却大体是想当然的，我也如是。及至翻一下旧籍，才知道原来是那样繁复的一套体制和规矩。官制是由礼制定的，服饰是由礼规范的，行为是由礼约束的，言语也是由礼节制的，一句话，从出生到死亡，不同等级的人，视听言动，都有礼的规范。这也就难怪儒学要称为“礼教”，而孔老夫子要说，在上的如果“好礼”，在下的就“易使”了。

比如服饰，穿什么衣服，都有等级的规定。在唐朝，二品以上服紫，四五品以上服绯，六品服绿，八九品以上服青。这是“服”。“饰”呢，也有规定，亲王和三品以上饰玉，五品以上饰金，七品以上饰银，其间虽然不时会有些小改动，但

等级的严格是不可乱的。车马也有严格的等级。一般说来，庶民通常只是步行，只有士大夫和当官的才有资格乘车骑马。至于坐轿子，规定就更加严格了，唐宋时贵戚大臣没有特殊的恩宠也是不能乘坐的。据说王安石在金陵时，有人送他轿子，惹得王先生发了脾气，说：“奈何以人代畜。”这倒未必是他的“人本主义”或今人爱说的“人文关怀”，实在是“礼”之所限，不能僭越的。当然，各个朝代对于骑马坐轿的规定并不相同，但一定要有等级差别的体现则是一样的。

读陆放翁诗：“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当初只是欣赏这意境，觉得骑驴比骑马要诗意得多。考之于礼，才知道只有不准骑马的人才用驴代步。就像先前没有资格坐“红旗”的可以坐“上海”，没有资格坐“上海”的可以乘吉普，没有资格坐汽车的才用自行车代步一样。如果有资格骑马而没有马骑，那么不但自己要发牢骚，上峰也会认为不成体统，需要纠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市井，当初也是不准骑马的阶级。但是一当上皇帝，对于这种“别贵贱、明等威”的礼制同样一丝不准马虎。明初，官员到任多无马，不是借人家的骑就是用驴替代。朱皇帝认为这样甚乖治体，命令备马，州县各给若干，以供骑乘。

服饰是衣，车马是行，住房和饮食也同样有着严格的等差。先秦时期，天子食太牢，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豚，士食鱼炙，庶人食菜。冯谖弹铗长歌“食无鱼”，因为他属士的阶层。一般庶人，除了老耄之人有点优待，大概只能歌“食无菜”的。因此一说“肉食者”，便知道是指卿大夫一类人物了。至于居住方面，不但住房的

大小、间数、式样、装饰也都各有定制，一点错乱不得。

这些，都还只是生活方面的，政治上、思想上、法律上的等级礼法，就更加严格了。这样一套“礼”，思虑之严密，实在令人惊叹。它要人时时处处都想到自己的地位，不能僭妄。人人谨守本分，在上的永远在上，在下的永远在下，在统治阶级看来，自然天下太平了。

我们的民主革命，该说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经济领域我们做得很彻底，但若从制度、思想的层面上考究，我个人以为还未跳出“礼”的樊笼。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我印象里，穿呢制服的，都是相当级别的官员，一般干部穿的都是布衣。六十年代初，生活困难，补助肉食、黄豆，也是等级有差。住房和乘骑，直到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和近来议论颇多的公车改革，其思路依然是按官阶高低定等的。

这样一种等级制，同样反映到政治思想范畴。听吴江先生讲过这样一件事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正是“文革”结束之后，《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标题上用了“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字样。为此，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那位中央领导批评说：“为什么你们刊登小平同志的讲话用‘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标题？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不是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后来《人民日报》在制作标题时便等级有差了。华国锋的讲话称“极其精辟地阐述”，叶剑英的讲话就只能称“指示我们”，而邓小平的讲话则标为“讲话强调指出”。这事听起来有点怪，好像对讲话内容的判断，不是依其真理性，而是依其地位官阶的高低。其实一点也不怪，因为在某些人的脑袋里，以等级为特征的“礼”，根深蒂固，就是在人去世之后，在表达惋惜之情时，也要依次分为“特大

损失”、“重大损失”、“一大损失”和“一个损失”等不同等级。至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在森严的礼教等级下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现在很有些对传统礼教的过分吹嘘，甚至有要按照《周官》行改革的奇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听起来当然很吓人，但按照那一套是改不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的。即便余风未尽的一些延续，也不是今天前进的助力。诗曰：

继天立极久曾夸，上下尊卑严等差。

任尔生花多妙笔，依然一领旧袈裟。



2005 年第 5 期目录

阅读视点	蓦然回首：废除科举百年祭	周宁
书林折枝	文明薄膜下的恐惧 ——读《人类酷刑史》	陈璧生
	断头女王 玛丽·斯图亚特 ——读《为爱疯狂 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传》	吴蓉晖
	“神仙”并不让人羡慕 ——读《游戏的城市》	于香玲
	马克斯·韦伯读什么书 ——读《马克斯·韦伯传》	段炼
围炉夜话	舆论溯源 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	石天河 达然
史海钩沉	二战锤子剪刀布	林子明
人物春秋	胡适为何屡救陈独秀 李鸿章的“排场” 当红袁世凯 陈寅恪三悼王国维	赵映林 贾庆军 魏得胜 王永
教育论坛	美国教育的精神 德国的大学——从格丁根说起	张国骥 戴问天
法制经纬	法律：一种激励机制	陈彩虹
说长论短	东林悲歌	陈椿年
艺术长廊	说幽默	方成
编读往来	知其一也要知其二 梁章钜并非绍兴人	范泓 郭华荣
来稿摘登	永远的巴金	李夫泽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 5.00 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563097 传真：0731-5790197